

刊叢記傳人召界世

寧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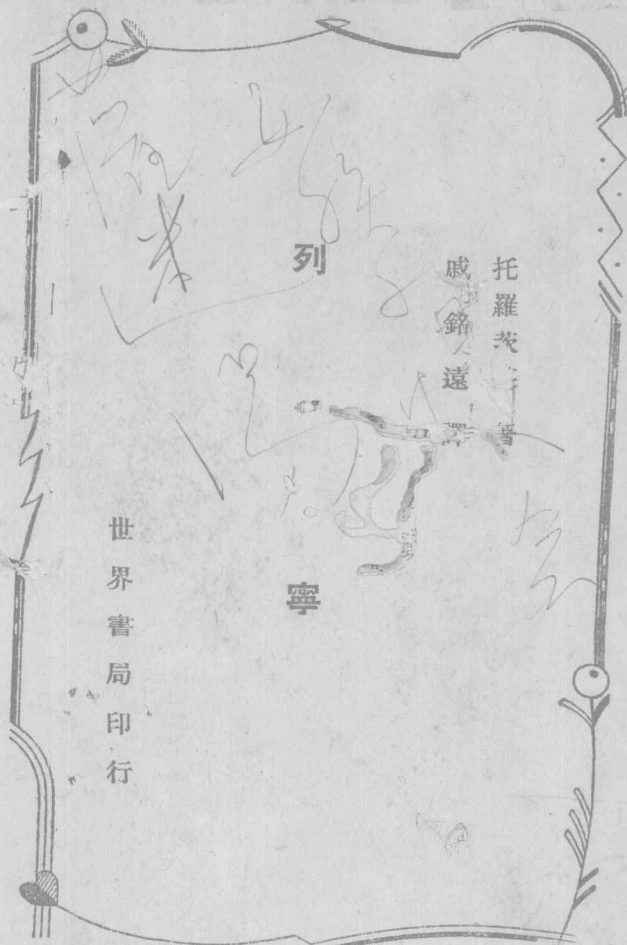
若基茨羅
譚遠銘



行印局書界世

92
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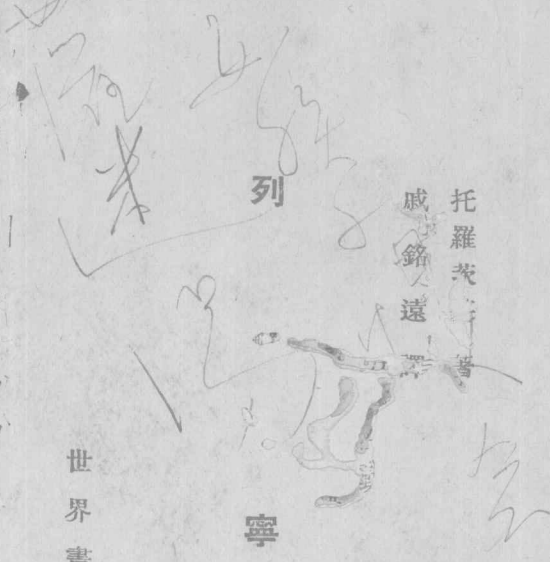
列

托羅茂
威銘遠

寧

世界書局印行

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列寧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托羅茨基

譯者 戚銘遠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旨趣

陸高誼

70074

教育方法，不外兩種：一方面啓發青年之個性得自由發展；一方面指導青年之學習有正當途徑。閱讀名人傳記之好處，卽能收此兩種教育方法之功效。蓋傳記所記，皆以事實爲根據，非如小說家言，信筆所之，儘多空中樓閣；其能成爲名人者，殆又皆人類中之傑出英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莫不足以啓發激勵，而爲後人楷模也。

或曰：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姑不具論；而熟讀某人傳記，充其量亦不過成爲某人第二而已，有何足貴？余曰：果能成爲某人第二，亦屬佳事，蓋所謂某人者，當必爲有用之人，以前祇有某人一人，而今能有某人若干人，豈不快哉！況人類進步，端賴歷代經驗之積聚。初民之日常生活，無一不出於「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吾人今日之日常生活，仰承先人之經驗，幾可無所用心，於是每日所省之「嘗試與錯誤」時間，皆可移用於其他工作，人類乃日見進步。閱讀名人傳記之益，亦正相同，前人經數十年所得之經驗，吾人能於旦夕間得之。青年人能具有成功人之經驗，基礙

既高，則將來之成功自必更高，又豈僅如某人第二，與之並駕齊驅而已哉！

至就文學方面言之，傳記文學在西洋文學中頗佔地位，而中國素不注意於此。雖有史漢及諸史之列傳，備此一格，但苟非以文勝質，或即語焉不詳；此外如年譜之類，更無非個人之「流水帳」，索然無味；偶有一二所謂大人先生之言行錄，則又非「官書式」，即「超人化」，一若其人非今世所能有者；等而下之，千篇一律之哀啓與宗傳，及視作應酬之墓誌銘，或竟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或即滿紙套語，毫無實際；凡此種種，比諸西洋傳記，瞠乎遠矣。

余少時，嘗從西人閱讀西洋名人傳記多種，嘉言懿行，倍受感化。其後忝爲人師，辦理學校，亦每以閱讀名人傳記，勸學士，潛移默化之功，誠有足多者。今負責本局，以地位言，本局爲國內三大出版家之一；以責任言，應輔助教育，發揚文化；以此深覺名人傳記之出版，實屬急不容緩。茲特先就世界各國名人傳記中，如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實業家，其一生經過，足以激勵青年，發揚志氣者，精選若干種，以生動之筆，彙譯介紹，名曰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以爲青年修養之助；次則擬進而試編中國名人傳記，以爲倡導。刊行伊始，用布區區，幸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前言

本書作者——托羅茨基——以共產主義的領袖和化身，列寧為中心，把俄國革命前後的種種活動、論爭、騷擾和奮鬥等實情，坦直明晰地暴露了出來，予讀者們以一個『概括的』清楚的印象，使吾人彷彿置身於其時的環境之中，不自覺地與當時的革命領袖們日夕相處，共同行動一般。此種『實情』之記述，正足以表示作者之『真』。吾人讀本書中作者力誦紳士們的虛偽與矜持一章——庸俗之人與革命黨員——便可明知而無疑了。

一種腐敗的專斷的政治，自有傾覆和革新的必要，而指導並實施此種傾覆和革新的工作，則必需具有偉大的人格，深刻的感覺，與堅強的自信的領袖；否則，便不易推動一致的行動，發生一致的力量，而趨於一致的目標。俄國十月革命——傾覆沙皇統治，產生工農大眾的共產政府——之所以成功，正為最明顯之例證。吾人當不能否認一般的革命領袖們和無產階級共同奮鬥之力量，然列寧之適當的、斷然的、勇敢的指導，實為俄國革命史——不，世界革命史——上永不能磨滅的最有價值的事實。蓋列寧不僅為俄國革命的最偉大的領袖，且為世界革命的領袖的模範。他領導俄國的工農大眾，作革命的鬪爭，而終於犧牲其個人的生命，同時，他喚醒世界上工農大眾，察覺到他們自身利益之被剝削、被壓榨，因而毅然奮起，分別

與帝國主義者作戰。『如果我們不願做奴隸，我們就得發令，實際去攻擊我們的敵人。』他這樣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

他深信那種不能制勝的力量，產生於堅強的團結的精神，因而他力促工、農大眾團結一致，『爲無數的民衆而準備黨，爲黨而準備無數的民衆。』他深信『凡是對的，必定永遠是對的，』因此，他始終是他，他始終爲工、農大眾而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努力到最後，他不怕反對者的強蠻的勢力，他不怕反對者的無理的嘲笑。『他們反對麼？打倒他們！』『誰最後笑，誰最會笑。』

至於他那堅強的意志，審慎的態度和斷然的自信，在後面所引的幾句話裏，已很明顯地表示着，似毋須再作贅言了。

列寧不斷地緊拉弓弦，達於極度，但同時又小心地用手搯來試驗它是否有鬆弛的地方，或者是否有折斷之虞。

『你不能像那樣地緊拉弓弦；那是會折斷的，』人們從各方喚他注意。

『那是不會折斷的，』主人答覆道，『我們的弓是用不能折斷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材料做成的，我們必要更用勁地緊拉黨的弦，因爲這支粗大的箭，須射得很遠的呀！』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譯者於『孤島。』

英譯序

這部俄國革命運動祕史係托羅茨基所著。其主旨在於將此運動中的大事與人物間的相互關係，明顯地暴露給美國的讀者們。關於這種祕史，能作廣博的貢獻者，比較的僅有少數人，而此少數人之一，即係托羅茨基。此實為值得注意者。從頌覆沙皇政府以前的騷擾時期和陰謀時期，至其從布爾雪維克勝利之自然過程中，祕密工作實為非常重要之事，對於領導者的整個計劃，僅有少數內部工作人員知之。

當著作家、演說家、陰謀家必須自衛的時候，行動畏縮，彷彿在濃霧中蠕動，除鏟除帝制的一般目的外，更須向渺茫的目標前進。他們的姓名，非他人所知，或知者極少，有時或化名以混瞞沙皇治下的暗探。

在此陰晦的背景中，使列寧與托羅茨基聯合一致而含有極重大意義者是什麼呢？作者在本書中，開始追述他們第一次的晤談，意在表彰列寧的性格，但輕淡地顯示了個人的目的與方法。他倆初本各不相識，且出身和早年環境，亦迥然不同。因同一內心的激動，在同一路線上出發，至一九〇二年始趨於一途。托羅茨基在一八七七年生於刻松（Klerson），係一名勃郎斯德的猶太製藥者之子。據云：因襲瀆偶像，被學校開除，且早年即具激烈的思想，年二十一，在俄得薩（Odessa）參加革命工作，被放逐至西伯利亞。但因不堪利那（Lena）冰區寒冷的磨折，乃於三年終，憤而脫逃。

當其放逐時，貪讀祕密發行的『火花』(Искра)，均在倫敦和日內瓦發行。脫逃以後，在俄國作短時期的工作。行動祕密，以閃避密佈的法網。組織團體，以助『火花』的革命宣傳。在一九〇二年的秋季，至倫敦。經該報社的神祕的領袖一度考詢後，遂在該報社編輯部獲得一渴慕的地位。

其時托羅茨基在革命工作中，僅一熱忱的雛兒，對於早已寫成『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且居領導地位的列寧，表示相當的敬畏。列寧的教育和社會背景較爲完善。其父係其故鄉西姆俾斯克的一個學校管理員，且有國會的資產階級的尊稱。其子教養於希臘教會，後肄業於卡桑及聖彼得堡大學，以備日後充任律師。但其激烈的傾向，使其遠離律師事業。其兄以謀暗殺亞力山大第三，在一八八七年被處死刑。

一八九五年，列寧以組織『工人階級自由大同盟』被放逐至西伯利亞。期滿後，赴國外，忍苦堅決，許身以領導革命。自該時起，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後一月，幾無返居俄國的時日。長期困頓漂泊，迨其志願實現後，始回俄國。

當托羅茨基加入時，『火花』編輯部幾呈分裂之象，和列寧合作不及一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已備論戰，遂趨於一九〇三年的分裂。在瑞士舉行黨員大會那年，明顯地分成布爾雪維克和門雪維克兩派，而托羅茨基初不左袒任何一派，繼則取執中之道，自成一小組，致與列寧分離，因列寧以其行動係

投機的。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復使彼等結合一起，但爲時至短。當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前騷動時，列寧在聖彼得堡編輯一種激烈的報紙，而托羅茨基則在同處任工人會議主席，遂被終身放逐。六閱月乃逃亡。且改勃郎斯德的名爲托羅茨基，以資蒙混。當其逍遙國外時，乃在法國、瑞士、奧地利及德國，從事煽動工作，且常爲激烈的報紙撰文。

列寧與托羅茨基撒手後，努力於自己所確定的路線。對於使其目的易於實現的一種顛復，爲期已近，深信不疑。且堅信他的方法，對於他所懷疑的懦弱者，則表示不信任，因他認這種人爲有害於革命事業者。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時，列寧正在加利西亞。是爲其適於煽動俄國革命的根據地。後被捕，旋即釋放，遂至瑞士活動，直至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四年在柏林主編猶太新聞的托羅茨基，以「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義，被德政府驅逐出境。初避難於維也納，繼則至祖利克及巴黎。其後，被法政府驅逐出境，拘留於西班牙。乃決意放洋赴美。在紐約，根據他原定主張，開始一新事業，卽爲猶太及俄國報紙撰文，且在激烈派會議中演講。托羅茨基屢陷於困窮的境地。當其與妻及兩子居於勃郎斯克時，尤感窘迫，藉其友人的濟助，始得維持其全家的生活。

令人震驚的一九一七年的變化，終於來到。此勃郎斯克的窮困的逃亡者，不停地熱烈地撰文，作反對

戰爭的宣傳。於是未及兩年，被任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的議訂者。俄國因得免於戰。居美國一年，乃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自紐約乘輪出發，中途曾被英國扣留於海利法克斯，嗣因克倫斯基政府的代求釋放，終得回抵俄境。

其時，列寧得德國參謀本部的許可，亦匆匆自瑞士經德境返國，以冀完成他的志願。且在彼得格勒得再與其『火花』同志（指托羅茨基）會面。因此爲他倆鼓吹革命作最烈的處所，且意見亦趨一致。數年來所懷抱的大志，在隱避期望努力中，竟以實現。再次，在倫敦時的生活，他倆係共同研究者，但今則均注重於實際的工作，而不徒尙空論了。

一若命定者然，他倆數年來所冀望的果實，均得嘗其苦澀與甜味。一社會革命黨黨員名杜拉·卡伯萊者，受布爾雪維克非常手段的激怒，竟暗殺列寧，且使列寧在政權殆危時，陷於痛苦和軟弱的深淵中；雖旋即痊愈，然因此打擊，他的身體逐漸衰弱，缺乏抵抗力，時常爲奪其生命的病魔所侵擾。在他熱望的共產主義試驗的高潮中，被迫承認其『走得太快』並提出其『經濟讓步』的口號，藉救荒與復興實業的名義，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讓步。

列寧逝世後，被公認爲共產主義的領袖與化身，備極哀榮。但他所奮鬥的目標——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使俄國臻於繁榮之境，並像世界革命的領袖之一般行動——則尙遠離實現之期。

破壞舊制，反抗『布爾喬亞』社會勢力的第二人，蘇俄的總司令，及實施理論政治者的托羅茨基尚留人間。列寧個人的悲劇豈僅爲列寧之事？其熱烈活潑的同志（指托羅茨基）將獨享勝利呢？還是共產黨凱歌中對逝世的列寧表示的感恩，也將續向活着的托羅茨基表示呢？

列寧逝世後數月，極有權力足以驅使千萬武裝同志的托羅茨基，即覺政局轉變後，問題複雜，糾紛傾軋，難於應付；致損他昔日的令譽，終至軍事委員會的職權，因以解除。那時他僅有的武器，用以攻擊敵人者，只有筆桿罷了！

若僅以個人的幸運而論，不多涉及歷史，則托羅茨基的寫作，或謂過多。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明顯地表示在共產黨爲改造俄國而鬪爭的最有意義的過程中，他倆的聯合，實爲改造文明世界的組合，且均熱烈夢想着無限的希望。

以老『火花』撰稿者的關係，開始合作，托羅茨基對於機敏的、謹慎的、有思想的列寧，即作具體的描述：待人和藹，時露滑稽之態，意志堅決，爲欲達其目的，寧作任何犧牲，即流血亦所不惜。倫敦支部之一員維拉·依凡諾夫娜·莎素里契曾謂列寧曰：『喬治乃一獵犬，他向敵人狂吠，終至輕易放過。而你則爲一哈叭狗能噬人致命。』列寧頗以此說爲然。他表示『在任何環境中，安定目標，堅決不移，且不爲俗例所阻，實爲列寧成爲領袖的特性。』列寧係『火花』的『政治指導。』據托羅茨基所著述，列寧『在思想上，常向

明白前進，而在倫敦的同志間，則「獨自代表未來之日。」

正年青的列寧，其特性，其知識程度，已明顯露示。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嚴重時期及其後，在彼得格勒詳述其特性的發展。列寧欲奪取政權，毫無疑義。「神經過敏的猜疑」實爲他最「憎惡」之事。然他對於急切不穩的步伐，亦不能忍，且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戰術，亦多謬誤之處。

他曾和數同志的意見相左，而托羅茨基竟毫不猶豫，予以記述，此實爲解除其總司令職權的主因。托羅茨基認爲列寧「估計敵人的明敏和決心，甚於實際。」最後他們握政權時，列寧乃轉向世界革命行動，常與現有制度奮鬪。

托羅茨基所作對於列寧的回憶和印象，乃以特別熱情的語調。計分四時期：第一，革命準備時期，其時俄國因受日俄戰爭及世界大戰的影響，不滿政府的分子，日益增多，漸至遍及全國；第二，布爾雪維克主義者決定並實行奪取政權的計劃時期；第三，布爾雪維克主義者專權時期，揭示對於未來事件推測的錯誤，而以對於世界革命評價的錯誤爲尤甚；第四，列寧逝世時期，以其委員長職的地位觀察他的任務。

托羅茨基所述，或有失實之處；其結論或亦難免受人的攻擊；但當初期沙皇統治的壓迫勢力，從奇異的政治組織中（即一九一七年三月前所稱爲俄羅斯帝國者）被移去時，對於支配俄國的人物所有行動的證明，自有其價值存在。此實爲毫無疑義之事。

作者序

本書之不完全，其故有二。其要者，我們不可視本書爲列寧的傳記，或其性格的研究，或其行動的立場或方法的完全暴露。本書僅爲他人日後著述時，供給他的行狀斷片梗概罷了，或作者藉本書另成一書，亦屬可能。同時此『概寫的』方法，乃不能免與必須的。除一般傳記的性格研究外，實有一更詳細和精確的著述的必要，使列寧生活中的特殊事件與狀態，及其人格，歷歷如在吾人眼前。本書的最要部分，係包括作者在十五年中對於兩時代的回憶：從老『火花』的最後半年，至發生十月革命的決戰那年，即自一九一七年之夏至一九一八年之秋。

但本書之不完全，尚有一較簡單的原因：我希望環境將許我對於本書能繼續寫作，即改善與更正，並增加插詞與篇幅，使其更精確，更完全。疾病和暫時的休息，使我有重行回憶的機會，此在本書中曾經述及。當我閱讀首部斷片時，每使我回憶復生，且引起新的插詞。其意義極大，蓋皆涉及列寧的生活，或與其相關者。但這種著述方法，亦有其弊，即其效果，永不能完成。因爲這個原故，我決意在某一時期，機械地刪除原稿；同時並保留——像我曾經述及——對於本書的續寫權。凡對於那時的事實與插詞有關的人們，如能以指正或補充，我將深致感激之忱。

另一方面，我故意省略若干瑣事，卽和今日的事件仍極有關係者，今先行述及，似非贅言。

本書分兩大部，均以回憶的方式所寫成，復加論文、演講，或講詞的斷片，意在表現列寧的特性。

在此回憶錄中，我竭力避免有關當時事實的材料。此似爲上策，因我不欲呈列列寧一生歷史的素描，僅欲供獻其原有的材料，則作者惟有憑藉一己的記憶耳。

本書大致草成後，我讀列寧全集第十四卷，及奧夫斯傑尼考夫所著關於勃萊斯脫·列托夫斯克和平的小冊，乃復加以補充，然補充之處極少。

里昂·托羅茨基

再者：我復閱本書時，發覺我稱列寧格勒爲彼得格勒，或彼得斯堡，而其他同志則稱舊日的彼得格勒爲列寧格勒。我以爲此實謬誤者。例如吾人敢說列寧被拘於列寧格勒麼？列寧決不致被拘於列寧格勒，實爲明顯之事，吾人亦不敢說：彼得第一建立列寧格勒，或在數十年後，此都市的新名——以一般固有名稱而論，將失去其實際的歷史上之意義。但如今吾人極明確覺得彼得格勒之被稱爲列寧格勒，當自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前，決不應如此稱呼。故在列寧格勒的回憶中，我仍沿用所述事件時，人所習知的名稱。

目次

前言

英譯序

作者序

列寧與老『火花』

十月革命前

十月革命

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

解散國民會議

組織政府

捷克·斯拉伐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

列寧在講臺上

庸俗之人與革命黨員

一

四三

五九

六八

八一

九〇

一〇五

一一三

一二一

列寧的民族主義.....一三三

列寧遇刺.....一三八

列寧病中.....一四五

列寧逝世.....一五一

列寧與老『火花』

『一九〇三年的分裂，可謂意料中的事件……』

——一九一〇年列寧演講詞中的話。

老『火花』時期（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對於將來列寧傳的作者，將有例外的心理學上的裨益。但同時將使他們感到很多困難，實無疑義。蓋正在此數年中，列寧即爲列寧，並非說列寧無所長進，實則他在『十月革命』前後，同樣地長進。——且比數極大！但此係較有機的長進，其偉大處乃在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自發難至握政權時的激進；可是，此僅係一人外表的物質的激進，他已盡其所能衡量的了。但第二次大會分裂前的長進，則爲內心的激進，雖非吾人肉眼所能見到，然的確較爲切實。

這種回憶，供給將來的傳記作者關於列寧思想發展中的特別值得注意與意義重大時期的材料。從那時到今日作本書時，相隔已有二十餘年，則對於一人的記憶力，當極有影響。令人慮及其所敘述者與過去事實究能如何吻合，我自認亦難免有這種過慮，且將無多時日寫作本書；更是不正確的回憶與證據，又何其多！我作本書時，既無公牘、備忘錄之類的東西，復乏其他材料。然我認此爲有利者，蓋我須全憑一己的記憶，並希望在這種情形下的寫作，使我不自覺地追溯到殊難忘懷的往事。將來的研究者，在獲得關於其

時的公牘及他種材料後，如復得本書，必然會覺到他的事工，較易着手。

其時的談話及討論，此間亦以對話的方式錄入。自然時隔二十餘年，誰能重述當時的對話而無誤呢？但我信我所錄入者，皆屬正確，其印象特深的談話，幾逐字無誤。

關於列寧傳記的材料，實成問題，且極爲重要。故對於我記憶力的特性，有不能已於言者。我的記憶力極弱，凡城市，甚至房屋的方向，輒易忘懷。例如：在倫敦時，列寧的居所與我所居者，相隔不遠，可是我迷途已不止一次，曾有一長時期，與相識者遇，亦不能認清其面貌；但對於此點，現已大有進步了。惟觀念聯想，以及關於思想的談話，我則素能牢記不忘，即今亦然。我敢證明此語非主觀的，他人和我同聞某種談話，每不能重述像我那樣的正確，且以我的矯正爲然。况我來倫敦時，直一年青的鄉人耳。極欲於短時內了解一切事物，故與列寧或其他『火花』編輯部職員的談話，自易留極深的印象。是皆本作者在預謂回憶之可信方面，所不能忽視之點。

一九〇二年之秋，我到倫敦，大抵在十月間，且在清晨。我所雇用的二輪馬車，載我到預先填在紙上的目的地，即列寧之家。事先，余已學知如何扣門的方法。據我所記憶，爲我開門者，乃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列寧妻名）我能想像他因扣門聲，被我從床上催起。因那時正是清晨，凡知趣而諳普通習俗者，必在車站多候一二小時，決不致在清晨往非素識者之家扣門，但我完全像從凡爾科倫斯克脫逃時的急促

情形，一切在所不顧。同樣，我在祖利克曾驚擾過亞格斯洛特之家。祇不是在黎明，而是在午夜。

列寧尚未起床，驚異地向我致敬。即在此種情形下，開始我倆第一次之晤談。列寧及其夫人因克萊爾的介紹函，早已知道我。當克萊爾在薩馬拉正式介紹我至『火花』社時，係用『彭』的名稱，故我受歡迎如此：『哈囉「彭」來了……』

我料他們在廚房中爲我備茶，同時列寧整衣起床，我遂告以逃亡之事，並對『火花』前線組織之惡劣情形，表示不滿。它在一社會革命的文法學校教員的手中，該教員因一次激烈的論辯，對於『火花』同志不表示偉大的同情。又走私者無情地向我剝削，且課余以各種捐稅。

余將一束簡單的通信錄及新聞紙，交與列寧夫人。更正確說，即關於數種廢置的出版物必須結束的材料。對於薩麻拉集團，我依次訪問喀爾格夫、帕爾塔瓦，及凱夫，並在各處作不健全的聯絡。

我不復能憶起：那晨還是次日，我和列寧在倫敦散步甚久，他示我以『韋斯特朗斯忒』僧院，及其他開名的建築物。我已忘卻他怎樣表達其意，但大意爲『他們的著名韋斯特朗斯忒』自然『他們的』之意，非指英人而實指敵人。每當列寧談及任何文明或新征服的價值時，無論其爲大不列顛博物院的薰陶，或泰晤士報豐富的消息，或談及若干年後德國的礮兵或法國的航空時，毫無着重的意態，祇是官能的隨腔露示。則其含意，自極明顯。『他們』知，或『他們』有，『他們』已完成——但恆視爲敵人在其心目中，

社會統治階級的不可見的黑影，彷彿止於人類各種文化上，且此黑影一如日光的明顯。

就我所能記憶，當時我對倫敦的建築物極少注意。最初我從佛爾科倫出國，對於維也納、巴黎及倫敦的認識至淺，若韋斯特明斯忒的詳細情形，皆非我所經心。列寧之所以約我散步者，當不是這個原因；其目的乃在認識並探詢我。真的，散步時他向我探詢備至。我因告以放逐至利那及其內部團結的詳情。當時所談的主題，則為對於實地的政治鬭爭，中央組織及恐怖的態度。

『可是對於伯因斯坦的政策無異見麼？』列寧問。

我告以在莫斯科監獄及放逐時，已閱讀伯因斯坦及考茨基的著作。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無一人贊同伯因斯坦，一若以考茨基為然者。但我們對於國際間的理論鬭爭，和已有組織的政治議論，毫無劃清界線之意，且亦未嘗想及最低限度，在利那閱讀初期『火花』及列寧的小冊『該作的是什麼』之前，決不如此。我更告以我們閱讀波格達諾夫（Bogdanov）的小冊極感興趣。且我尚能清楚憶起列寧的評話大意：從歷史方面默察自然，這本小冊的價值至鉅，在他亦如此，但伯里契諾夫（Blechanov）未能同意於此，且聲明此非唯物主義的。其時列寧對此問題，毫無意見，僅將伯里契諾夫的意見，予以重述，表示重視其思想的權威，但亦示不安的意思。其時我對伯里契諾夫的意見，則至深驚異。

列寧復以經濟學向我考詢，我告以在莫斯科獄中，我們怎樣共同研究其『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放逐時則研究『資本論』，但止於第二卷。我且提及『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巨量之統計學上的材料。

「在莫斯科獄中我們常驚異地談及此巨著。」

「是的，這不是急促寫成的，」列寧答道。

年青同志對其極重要的經濟學，細心研讀，實爲令其快慰之事。

於是我們談及密契里斯基之容貌，及放逐時他給予我們的印象，我告以密契里斯基的第一期寄至利那後，我們所得的印象至深。一若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嚴峻批評，且亦似考茨基與伯因斯坦辯論所引起的思想。第二期中，密契里斯基從馬克斯主義者的生產定則中「揭去假面具」，而認爲由勞動階級的自覺對利益均需之理論的調整。我們因此空論，心殊憤慨。最後我們獲得第三期。其積極的計劃書中示經濟學的餘產與生產革命主義有關一節，則使我們發生完全破產之感。

在此次談話時，對我將來的工作，僅略略涉及。我欲先認識當時的文學，復提議非法的回俄國去，遂決定我須先「周視」一番。

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爲我找得寓所，與莎素里契·麻爾托夫，及勃婁門·蕃爾特隣近。勃氏即係日後發行「火花」者。該處有一空房，使我寓居。是屋係普通英國式的建築，非平闊的，乃係直層者。屋主居樓下，房客則分居於二三層。內有一大房間，即伯里契·諾夫初次往訪時，稱爲「魔窟」者，尙無人居。因莎素里

契的不負責，而麻爾托夫亦不相助，致此房間雜亂異常。我們在此飲咖啡作長談，吸紙煙等，因有『魔窟』的名稱。

這樣開始我短期的倫敦生活。我饑餓地貪讀後期『火花』及小冊『黎明』。其時我亦開始爲『火花』寫稿。

當什律塞爾堡砲台二百週年紀念節，我著一短文。我信這是我爲『火花』第一次寫稿。此文以荷馬的話作結，更正確地說，係荷馬的譯者聶迭契的話。我引用『無敵之人』以示沙皇統治下，必有革命。列寧甚悅此文。但他對『無敵之人』似有疑點，遂以溫和的笑謔的態度，向我說明。我聲辯道：『但此係荷馬的詩句呀。』可是樂意承認此古典的引用，實非必要。此文可見於『火花』，但已無『無敵之人』的字句了。

於是我隨帶第一次的報告至懷特查培爾，與老契珂夫斯基（彼已年老之人）及無政府主義者契爾克沙夫（彼亦非年青者）走訪各地，最後，此倆著名的白髮的亡命者，竟發言非常荒謬，使我深覺驚異。……倫敦一『老公民』亞萊山夫，係與懷特查培爾的周旋者，並係與『火花』有關的亡命者及馬克斯主義者。他引我過英國人的生活，且爲我一切知識的泉源。我記得在和他一同往返懷特查培爾的途中，作詳談後，曾以其兩種意見告訴列寧。其一關於俄國政制的崩潰，其二則爲考茨基的最後論著。據亞萊山夫說：『因專制政治的 *Crudity*，其崩潰必突然會發生，決不是逐漸臨到的。』我對 *Crudity*（指殘暴苛

酷頑固之意）一字，注意特甚。

列寧聽我說完，就說：『嗯，也許他是不錯的。』

亞萊山夫的第二種意見，就是關於考茨基的論著：『社會革命後的時日。』我和列寧對此小冊，極感興趣。據他自己說，他已閱讀兩次，且正在第三次閱讀中。我也相信俄譯本係他所主編。因列寧的授意，我也細讀了這本書。亞萊山夫認此為機會主義者的著作。

列寧突然說『笨伯』，且憤然撇着脣。這是他感到不滿時的一種表情。

亞萊山夫本人對於列寧異常敬重：『對於革命，我相信列寧比伯里契諾夫來得重要。』關於這點，我自然沒有對列寧說什麼，但我把這話告訴了麻爾托夫，麻爾托夫則默然不答。

『火花』和『黎明』編輯部共計六人：三個老年人，伯里契諾夫、莎素里契、亞格斯洛特，及三個青年：列寧、麻爾托夫、波契莎夫。伯里契諾夫和亞格斯洛特住在瑞士，莎素里契和這些青年住在倫敦。波契莎夫則住於大陸某地。因居處遠離，難免有各種不便。可是並不使列寧感到困難，且恰相反。當我還沒有去大陸旅行以前，他曾細心地示我以編輯部內部組織的關係，並且說伯里契諾夫竭力主張編輯部遷往瑞士，而列寧以為對於工作反多困難，加以反對。於是我第一次知道，但仍不十分清楚。編輯部之所以留在倫敦，不僅由於警例問題，且亦與組織的人員問題有關。

在這政治工作的組織方面，列寧要盡可能地與那些老年人脫離而獨立，而尤以和伯里契諾夫脫離爲最。因列寧曾和他發生過激烈的衝突，特別是爲了修正該黨計劃書問題。沙素里契和麻爾托夫便是他們的居間人。沙素里契是伯里契諾夫的擁護者，而麻爾托夫則爲列寧的擁護者。這兩個居間人，氣量寬大，且彼此非常友善。列寧和伯里契諾夫在計劃書的理論方面所發生的激烈衝突，我才逐漸了解。我記得列寧曾問我對於才出版的第二十五期「火花」上的計劃書有什麼意見，可是我過注意這計劃書的全部，以致不能答覆列寧感到興趣的內部問題。他倆對於政策的意見，絕對不同之處，在於區別資本主義的趨勢，生產的集中，中間階級的崩潰，以及階級的對峙等問題。這熟知的計劃書，僅拘泥於「多少」兩字：那是爲了伯里契諾夫的關係。就我所記得的，麻爾托夫和沙素里契的報告，即列寧的原稿與伯里契諾夫的對比後，受到伯里契諾夫的極甚的批評，且用喬治·佛倫丁諾維契（即伯里契諾夫）的傲慢的、俏皮的語調說的。但列寧並不因此而畏懼，也不沮喪。這爭辯的情形，極像演劇的神氣。

當列寧夫人談到這件事時，對列寧說：「喬治乃一獵犬，牠向敵人狂吠，終至輕易放過，而你則爲一哈叭狗，能噬人致命。」

我確切記得這句話，及沙素里契的最後評語：「那使他（列寧）非常歡喜。他高興地重說道：「噬人致命。」列寧夫人就溫和地仿做了這問句的腔調。

當我居留倫敦的時候，伯里契諾夫來和我作一次短談。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見面。他也曾到過我們的公共宿舍，就是『魔窟』。但我不在家。

列寧夫人對我說：『喬治已經來了，他要見你，到他那裏去。』

『喬治是什麼人？』我驚異地問。因我以爲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名人。

『伯里契諾夫……我們稱呼他爲喬治。』

那天晚上，我去見他。在那間小房間裏除了伯里契諾夫以外，還有很開名的德國作家，社會民主黨黨員白爾（Bar）及英人亞斯鳩（Askew）。因爲沒有空椅子了，我不知該坐在什麼地方。伯里契諾夫就提議——不，無猶豫地——我坐在床上。我覺得這是十分自然的，且對於像伯里契諾夫這樣一個完全的歐洲人，僅在非常必要的時候，才用這樣一個破例的辦法，沒有一點意見。他們用德語談話，但因伯里契諾夫懂得極少，所以他只能略說一二。白爾先談到英國的資產階級懂得怎樣欺騙前進工人的情形，然後又談到法國唯物主義的英國先驅者。不久白爾和亞斯鳩就走了。喬治以時間過遲，以及談話有擾於房東主婦的緣故，希望我跟他們一起走。而我的意見恰相反，以爲那時纔正可開始談話。

『白爾說了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說。

『是的，他所說關於英國政治的話，是有趣的，但他所說關於哲學的話，則毫無意義。』伯里契諾夫答

道。

當他覺得我不預備走，他就提議我們到隣近去喝啤酒。他問我幾個不重要的問題，態度是很親切的。但親切的後面，隱藏着不耐煩的神色。我覺得他心不在焉，大概是爲了他白天工作疲倦了的緣故，可是我懷着不滿意的憤怒的情緒離開的。

在倫敦的時期，像後來在日內瓦一樣，我和列寧會晤的機會不及與莎素里契和麻爾托夫會晤的機會那樣多；在倫敦，我和他們同住一間屋子，在日內瓦我們常同在一個館子裏吃飯。所以每天我與麻爾托夫和莎素里契總得會見幾次；至於列寧，老是住在家裏的，除了正式會議外，每次和他見面，總是有些小事情。

莎素里契是個古怪的人，而且是個古怪地引人注意的人。她寫作很慢，對於創作，她却實際地受過磨練。列寧夫人那時曾對我說過：『莎素里契並不是寫作，她將精細的東西放在一起。』事實上，她將每個句子分開地寫下，曳着拖鞋，在房內緩慢地徘徊着，且常吸着紙煙，將抽了一半的煙頭，隨意扔在靠窗的桌椅上，煙灰就亂撒在她的衣服上、手上、稿紙上，有時也許會撒在她客人的身上。她直到最後，還是個激烈的知識分子，命定是個馬克斯主義的繼續者。莎素里契的作品，明示她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採用極多，可是直到她逝世時，她對於俄國激烈派七十人的道德的政治建設，始終沒有受到影響。和她密談的時候，她自

認是嘲罵認識論的方法和馬克斯主義的演繹法的。她對「革命黨」的概念，除了階級意味外，還有一個獨立的意義，我記得曾和她談到「革命黨人產自一個中間階級」的問題。我用了「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黨人」的辭句，她就令人憎厭地，或說是令人惱怒地打斷我的話道：「但是，並不是布爾喬亞的，也不是普洛列塔利亞的，簡單地，就是革命黨人。」她接着說：「自然你可以說：小布爾喬亞的革命黨人，如果你將一切無可推諉的事都歸給小布爾喬亞的話……」

其次，我們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的趨向，我們對於他們修正派與正統派的鬭爭，深切加以注意。但莎素里契並不如此，她甚至說：「那是一樣的，他們也會和修正一同完結，會恢復馬克斯主義，得到民衆，結果必像凱撒（大戰前的德皇）一樣壽終正寢。」

「莎素里契，你說的「他們」是指誰？」

「德國社會民主黨員。」

在那時看來，關於這一個意見，莎素里契並不怎樣錯。即使一切改變了路線，並且不是爲了像她所想到的理由……莎素里契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土地均分政策。她並不將這點置諸不談，只是以溫和的態度來嘲笑這點罷了。我記得關於這點的一個插話。在大會開會前不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契·鮑爾（Constantin Constantinovich Bauer）來到日內瓦，他是一個老馬克斯主義者，但卻是一個非常糊塗

而易變的人，他初與史特羅夫（Struve）友善了一些時光，後來躊躇不決於『火花』派與自由派之間。在日內瓦他開始轉向『火花』派，但他不承認土地均分。他去見列寧，他在過去顯然認識他的，他並不會被說服就走了。無疑地，列寧因為早已知道他那種哈姆雷脫（Hamlet）的天性，不耐煩和他多說，使他信服。我和鮑爾在流亡時，就認識的。關於這個不幸的土地均分的問題，作過一次長談。我把六個月中和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一切反對『火花』派的土地均分政策者論辯時所搜集的種種論證都敘述出來。恰巧就在那晚麻爾托夫告訴我，在一個我曾出席的編輯會議席上，鮑爾來到他那裏，而且終於宣布了他加入『火花』為同志。托羅茨基已解釋了他所有的疑點……

『關於土地均分的疑點，也解釋了嗎？』莎素里契驚疑地問。

『是的，特別是那點。』

『可……憐……的傢伙。』莎素里契帶着一種極難模仿的神情叫喊着，致使我們都友善地笑起來了。

『在莎素里契是多以倫理及感情為根據，』列寧曾對我說過，並且告訴我她和麻爾托夫因維而納（Vienna）縣長華爾（Wal）鞭打作示威運動的工人一事，怎樣傾向於個人的恐嚇。那時我們所稱呼的這種一時的『傾向』的證據在某一期『火花』裏，可以看得出來。在我，這事的情形是如此：麻爾托夫和

沙素里契因爲列寧那時在大陸，所以沒有問他，就把那期『火花』出版了。在維而納鞭打工人的消息，由一個電訊社傳到了倫敦。沙素里契竟促醒了一個英雄的激進派，她就因政治犯的受鞭笞，鎗殺了特萊帕夫，麻爾托夫幫助着她。當列寧收到了這一期的『火花』的時候，大爲激奮：那是對社會革命黨主義投降的第一步。同時還接到了伯里契諾夫寄來的一封信，這事件發生於我抵倫敦之前，所以我所敘述的，或有不正確之處，但我對於這事件的實情，還很清楚地記得。沙素里契在某次談話時對我說：『當然，這不是一個恐嚇的問題，乃是制度的問題。我相信用恐嚇，可以免絕鞭笞工人的事……』

沙素里契不能作真正的討論，她更少懂得怎樣公開地討論。凡對方的論證，她從不直接答辯，只是靜地作縝密的思考，直到最後便發揮一大串的言語，並不是對發問的人說，卻是對她認爲懂得她的人說的。凡有主席的正式辯論，沙素里契從不列爲辯論員之一。如果要說什麼話，她就滔滔不絕地說出。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完全不知有正式辯論員，絕對對他們失敬，時常打斷講員及主席的言論，直到說完了她所要說的一切話。你要了解她，非緊跟着她那一串思想不可。而她的思想——不管是錯誤的，或是對的——老是使她自己感到興趣。這不難想像沙素里契，她不定的激烈主義，她的主觀，以及她的錯亂，較之列寧成怎樣一個對比。不僅他倆沒有同情之點，就是他倆的感情生來也就截然不同。可是像沙素里契這樣一個聰明的心理學家，當然覺得列寧的力量，怕也不會沒有嫉妒之意的。這在她所說的『噬人致命』這句話，也

就可以證明了。

我逐漸知道了編輯部同人中的複雜關係，但並不是沒有困難的。像我曾經說過，我來到倫敦的時候，是一個道地的鄉佬，這在各方面說都是確實的，那時我不僅沒有到過國外，而且也沒有去過彼得斯堡。在莫斯科及克府，我也只是因政治犯坐過牢罷了。就是馬克斯主義的政論者，我讀了他們的著作才知道，在西伯利亞我曾讀過幾期『火花』及列寧的『該做的是什麼？』在莫斯科監牢裏，我約略聽到『資本主義的發展』的作者伊林，是社會民主黨的後起之秀。（我記得是梵諾夫斯基告訴我的）關於麻爾托夫，我稍微知道一些，波特萊沙夫則一些也不知道。在倫敦，我熱心地閱讀『火花』和『黎明』，尤其注意國外所發生的事情；因此，在某一期『黎明』上，我偶然發見一篇優美的文章，目的在抨擊北羅普古維契的『採礦公司聯合會的任務和意義』。

『這馬爾塔夫是誰？』我問麻爾托夫道。

『派爾佛斯』。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派爾佛斯』，我整個地傾心於『火花』，而且在這幾個月之中，我沒有一點願望，實則，我看到了『火花』或編輯部有什麼弱點及惡影響之類時，連一點嫌惡之感也沒有。

我記得我注意到在『火花』上有許多社論和批評，只有代名詞『我』，而沒有署名，『在某某期上，

我曾說過，『我曾寫過此類之事』等等。我就問這些文章是誰寫的，後來知道都是出自列寧的手筆。和他談話時，我提及在不署名的文章上用代名詞『我』，我認爲是不對的。『爲什麼是不對？』他感興趣地問，以爲我所說的不是偶然的，而且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

『因爲是……』我含糊地答道，因爲關於這點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我不這樣想』列寧含糊地笑着說。

那時人們或已看到在這種文學的慣例上，有一種『自大』的氣息，可是在事實上，他的未經署名的文章所表示出來的卓越之才，給他的政策一個強固的地位，因爲他對於他最親切的同志們的堅定政策，表示疑惑之態。這裏我們已約略看到列寧之所以成爲領袖，其特性在對於目標之堅持、固執和坦白，他能利用任何環境，而不拘泥於形式。

列寧係『火花』的政治指導，但就政論家而言，則『火花』的領袖，當推麻爾托夫，他能容易地、不停地寫文章，恰和他說話一般。列寧則常在不列顛博物院的圖書館裏忙於理論的研讀。我記得列寧在圖書館裏曾寫過一篇反對南傑斯契丁（Nadjeschdin）的文章。那時南傑斯契丁在瑞士出版一本小冊，恰巧猶疑於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之間。但是在早一天晚上（他常在晚上工作的）麻爾托夫已經寫了一篇關於南傑斯契丁的長文，且已給了列寧。

「你會讀過裘里安的文章嗎？」列寧在博物院裏問我。

「是的，我會讀過的。」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不錯。」

「是的，很不錯；但不十分明確，且缺乏結論。這裏我已寫了一點東西，但我還不知道該怎樣處置；或者加在裘里安的文章後面，作為補充。」

他用鉛筆仔細寫的一小張紙交給我，而在下一期的「火花」上就發見了附有列寧的評註的麻爾托夫的文章。我不知道這附註是否收集在列寧全集裏，但我可證明那是他寫的。

幾月後，在大會開幕前的幾星期中，列寧與麻爾托夫突然發生了意見上的新衝突，那是關於遊行示威運動的策略問題。更正確地說，就是關於和警察武裝爭鬥問題。列寧說，我們必須組織武裝小團體，並且指導工人慣於和警察爭鬥。麻爾托夫表示反對，罷工遂及於「火花」編輯部。

「會釀成團體恐嚇這樣的事嗎？」關於列寧的提議我說：（我記得那時和社會民主黨的恐怖主義者作策略上的爭鬥，佔了我們的工作重要部分）麻爾托夫就提出討論，並發揮他的意見道：我們必須指導，對於羣衆示威運動加以保護，使不被警察橫加干涉。但不必訓練個別的團體，和警察爭鬥。其他同志和

我所期望的伯里契諾夫爲避免答復，就建議請麻爾托夫把意見寫成文章，使我們手頭有了主文，對於論辯之點，就可以加以考慮。可是這事爲了關於大會的事件，就無形結束了。

不僅在會議中，而且在私人談話時，我很少有機會看到列寧和麻爾托夫一致。對於冗長的討論，不拘形式的談話，（常因這種談話而轉到放逐者底閒談和爭辯）麻爾托夫總是很感興趣，列寧則絕對不予注意。這個最有力量的操縱革命者，不僅在政策上而且在他的理論上，在他哲學的和語言學的研究上，始終不易地被一個觀念——目標所統制。也許他是從歷史的實驗室裏所產生出來的最尖端功利主義者。但是他的功利主義是屬於最廣闊的歷史範圍。因此，他的人格不是平凡的，或拙劣的，卻是非常發展和充實，正似他的生活經驗和活動範圍生長一樣……

與列寧相並的麻爾托夫，那時是爭鬪中與列寧最接近的戰友，他覺得很不舒服。他們雖然仍以親暱的『您』相稱呼，但是在他們的關係上，已可看出一種冷淡的態度了。麻爾托夫很注意今日，且關心於時行的文學作品，政論家的著作，爭論術，消息及談話。而列寧呢，把今日擱在後頭，督促他的思想前進於明日。麻爾托夫有無數的，而且常是優美的聯想、假設和提議，但他自己很快地就忘掉了。而列寧見到什麼是他所需要的，與何時他需要它。麻爾托夫的輕進的、脆弱的思想常使列寧驚異地搖着他的頭。他們對於政見的任何異點還沒有固定，而且也還沒有明白表示，祇是後來藉暗示才能發覺出來。

後來在第二次大會分裂時，『火花』同人分成了『硬性的』和『軟性的』兩派。在初時，這種指名當然是很有用的，並且在派別沒有明顯的區分的時候，足以明示其異點在於理解、決心，以及趨赴目標底準備上。我們再看列寧和麻爾托夫的關係，可說在分裂前和大會前，列寧是『硬性的』，麻爾托夫是『軟性的』，而他倆也都知道的。列寧以批評的、懷疑的態度觀察他素極重視的麻爾托夫，麻爾托夫深知這點，覺得受到精神上的壓迫，常神經質地聳着他瘦弱的肩，當他們見面談話的時候，明顯地可以看出缺乏親密的語調，並且不講一句笑話，至少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列寧說話時，不直視麻爾托夫，在他一方面，麻爾托夫的眼睛，則從永不措擦的、下垂的眼鏡裏嚴正地瞧着。就是列寧和我談到麻爾托夫的時候，他的聲調有一種特別的味兒：『那是裘里安說的嗎？好極，甚至值得注意的，但是太弱一點，』他把名字特別說得響些，略示着重，同時表示警告之意。無疑的，麻爾托夫也受到伯里契諾夫的影響。伯里契諾夫迫他遠離列寧，確實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當然這完全是普通心理上的特性描寫，而不是事實材料。並且這種特性描寫是在二十一年以後。從那時起，我的記憶力較弱，對於種種個人關係上的動機之呈現，因時間相隔太遠，錯誤與改變實易於混雜不清。這裏的回憶是什麼？又有什麼不經心的補充的修改？可是我深信我的記憶力使我回想到那時的實情，而且正就是事實。

當我在懷特查培爾作了『試驗性的』演講以後，亞萊山夫報告編輯部，我將正式被派往大陸——

到布魯塞爾、列日、和巴黎去演講，講題是：『什麼是歷史上底唯物論及社會革命黨的解答。』對於這個題目，列寧很感興趣。我把附有引句等等的原稿交給他看，他勸我把它寫成一篇文章，給下一期的『黎明』發表，可是我不敢嘗試。

在巴黎不久，倫敦就來電催我回去。他們正考慮着要派我潛回俄國。列寧的意見是關於團體的破裂與人才的缺乏，俄國有不平的消息傳來。而且我相信克萊爾（Clairie）要我回去，可是在我還未到倫敦的時候，這計劃已打消了。那時住在倫敦的杜茨契（L. G. Deutsch）和我很好。後來他告訴我，他怎樣擁護我，指出這個『青年』——他從不用其他名字稱我的——該在國外多生活，多研讀一些時候。經過幾次討論以後，列寧就同情於他。在俄國『火花』的組織裏工作，該是很有趣味的事，可是我樂於仍在國外多住上一些時光。

一個星期日，我和列寧及南德慈達到倫敦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教堂去，那裏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並且敬畏上帝的歌唱——革命詩歌。我記得演講者是一個從澳洲回來的印刷工人。列寧給我們低聲地翻譯。聞之似覺頗含革命之意義的，至少是在那個時期。於是人人站起來唱道：『全能的主呀，請你滅絕列王和豪富……』或類似的詞句，當我們離開教堂的時候，列寧說：『在英國無產階級裏有許多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分子，可是都與保守主義、宗教，及戒見纏夾着，所以不能露頭角而爲大衆所有……』這並

不是沒有意義的事。這裏提及莎素里契和麻爾托夫與英國活動是十分隔絕的，而且完全專心於『火花』及有關『火花』的事工，而列寧則有時自主的參加英國工人活動。

還該說到列寧和他的夫人、母親的生活尚稱簡單。我們從社會民主黨的教堂回來後，就在他們兩個房間的寓所裏的小廚房裏，一同進食。烤肉是用蒸鍋分遞的，我記得很清楚，宛如昨日的事。然後我們喝茶，照常笑着我是否能獨自找着路回家，對於我，在街道上找路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因為我心好分類的緣故，我稱這種特點爲『地形學上的癡病』。大會期近了，最後決定把『火花』總部搬到瑞士，到日內瓦；住在那裏生活程度較低，和俄國接洽也較易。列寧雖感憎嫌，也表示同意。我被派往巴黎，以便和麻爾托夫同到日內瓦。關於大會的準備事工進行得非常有生氣。

不久以後，列寧也來到巴黎。在巴黎有一所被俄國各大學驅逐的教授們所組織的俄國高等學校，列寧給這個學校作了三次關於土地均分問題的演講，自鐵契諾夫來到這個學校後，馬克斯主義派的學生們就主張請列寧演講，教授們頗爲驚異，就請求他如果可能的話，不要冒險作論辯，但列寧沒有明顯答應。作第一次演講時，就這樣開始說：『馬克斯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它的本質上，是一種爭鬪的理論，但這種爭鬪的性質決不是與它的科學的性質衝突的。』我記得列寧在演講前非常興奮，可是登講臺後，他突然抑制自己，以示鎮靜，至少是表面的。特來聽他演講的葛姆鮑洛夫教授對杜茨基表示他的印象。

說「一個名不虛傳的教授」這個有趣的人兒，以爲這樣是非常地稱頌列寧。

雖然一再發生論辯——抨擊納羅尼基及與列寧匹敵的社會的土地均分的改革者大衛——言論卻關經濟理論的體系，而不涉及當時政治爭鬪，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策，及社會革命黨的問題。因講席必須具專門資格的原故，講師均受限制，但在第三次演講結束時，列寧對於土地均分問題，作了一個政治的報告。我記得這次演講是在 Rue Choisy 110 號舉行的，由巴黎「火花」同志辦理，而不復是高等學校負責的了。會場擁擠不堪，高等學校的全體學生都來聽這次理論的演講的實際結果。這次演講是關於當時「火花」的土地均分問題，尤其是關於土地均分的補償問題。誰起來反辯，我不再記得，但我確實記得列寧的結語是精妙絕倫的，一個巴黎的「火花」同志離會場時對我說：「今天列寧超越了他自己。」

後來「火花」同志和列寧到咖啡館去，全體都非常喜悅，列寧本人也表示快樂。「火花」會計員告訴我們這次演講會的門票收入，給「火花」增益了七十五到一百法郎。——是一個不可渺視的數目。這都是在一九〇三年之初所發生的事。一時我不能更正確地說出時日，但我想這不是難於做到的，如果日子未曾被記下的話。

當列寧這次來到巴黎的機會，我們決定請他去看一回歌劇。「火花」編輯部之一員，撒徒華 (N. I. Sedovaja) 被派辦理這事。列寧來到戲院——那是康密克歌劇院——及離開戲院時，老是帶着那張在

高等學校開始演講時用的圖表。這歌劇是『羅意斯』由 Massenet 飾。（此處托羅茨基以 Massenet 誤爲 Charpentier——英譯註）題旨是非常民主化的。我們團坐在樓座裏，除了列寧、撒徒華和我之外，麻爾托夫也在座，其他的人，則我不能記憶了。關於這次歌劇院之行，尚有一些頗不雅聽的瑣事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列寧在巴黎買了一雙長靴，因爲太窄，他受了幾小時的罪，直到他決定把它們脫去，恰巧我的皮鞋已壞了，我就接受了這雙長靴。剛穿上時，我很高興，因爲我覺得非常合適，我穿上了歌劇院去，一路覺得很愉快，可是在戲院裏，我覺得有些不對。大概這就是使我不能憶起歌劇給予我們的印象的理由了。我只知道他站起來打趣着笑着。在歸途中，我大受痛苦，而列寧則盡情地、不仁地揶揄我。可是在他的笑謔裏，有着真實的友情，因爲我剛才說過的，他穿這雙長靴時，自己也受了幾小時的罪。

我前曾提及列寧在巴黎演講前如何興奮，我必須細述之。這種興奮，後來也時常流露出來，且形式較強，而『他的』聽衆則較少，開會的時間則較正式。在外形上，列寧演講時，常是說服地、激烈地、急速地，每使速記員感到異常的痛苦。但當他不覺得得意時，他的聲調就變成興奮的，且溫和地令人信服。按講臺上演說的真義時，他發覺這些聽衆需要他該說的話，他的聲調就變成興奮的，且溫和地令人信服。按講臺上演說的真義來說，不像『演說的』，而是談話式的腔調，這不是修辭學的藝術，乃是較演說術更高遠的東西。你當然能說每個演說家在『他自己的』聽衆之前演講得最好。以一般情形而論，那自然是對的，但問題是在演說

家覺得在何種情形之下，何種聽衆才是他的。歐洲的演說家，像范恩特爾佛之輩，是受過議會型的訓練的。其動人處在需要合式的環境與正當的時機。在紀念會中及祝祭時日，他們覺得正得其所，但這種會議對於列寧，乃是一些些私人的不幸。對於論辯，他最得意，而且常是最使人悅服。他的公開演講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十月革命前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演講。

在巴黎演講以前，我只聽過一次列寧的演講。我想是在倫敦，大約是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底的時候。說來是很奇怪的，我一點回憶都沒有，不是爲了他的丰采，也不是爲了題旨，我幾乎懷疑是否確是他的演講。可是顯然是這樣：處在倫敦的環境之下，一個盛大的俄人集會的節日，列寧也到會的；如果不請他作演講的話，他是少有出席的。表示我記憶力之弱，我如此說：他的演講的主旨大概是與『火花』上發表過的相似。我已讀過列寧的文章，所以他的演講，我一點也不感到新奇。講後並沒有討論；軟弱的倫敦反對派沒有站起來與列寧抗辯的勇氣。一部分聽衆是工團主義派，一部分是無政府主義派。沒有一個是令人滿意的。——必然的，那是個訓練問題。我只知道將散會的時候，皮氏夫婦（前係彼得堡工人思想派 [Rabotachaja Mysl] 曾有一時居於倫敦）來到我面前來請我說：『請於除夕到我們這裏來。』（這就是我記得開會是在十二月底的緣故）

「有什麼事？」我以粗蠻的、僵狹的口吻問道。

『和同志們團聚消遣。猶列雅諾夫和克羅巴斯加也都來的。』

我記得她說猶列雅諾夫，而不說列寧，我一時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是誰。沙素里契和麻爾托夫也在被請之列。次日，我們在『魔窟』裏談到這事，就問列寧去否。我記得沒有一個人去的。可憐呀，看到列寧、沙素里契，和麻爾托夫，這種度除夕的情景該是個特別的機會哩！

我在離開巴黎到日內瓦去之前，和沙素里契及麻爾托夫一同被請到伯里契諾夫家裏去。我記得列寧也在那裏。但是對於那晚的情形，我只有一點非常模糊的印象。無論如何，那是不含政治性的，僅是『應酬性的』。如果不是布爾喬亞性的話，我記得無聊地悶悶地坐着。如果主人或主婦不表示特別注意的話，我簡直不知道該怎樣才好。伯里契諾夫的女兒送遞茶點。在我們之間呈現着一種緊張的空氣，顯然地，感覺不安的，不僅是我一個人，也許是爲了我年輕的緣故，我覺得比別人更冷肅些。這次拜訪是我生平第一次，也可說是最後一次。對於它的印象，爲時至暫，或許完全是偶然的，正像我每與伯里契諾夫會晤時所有的印象一樣。俄國馬克斯主義之大師的赫奕的形貌，在別處我已簡單地作過描寫了。這裏我僅述及我對於沒有機會參加的初期會議的斷片印象罷了。在這類事上，大感痛苦的沙素里契曾對我說：『我知道喬治是難堪的，但是實際上他是一隻至可愛的獸。』（她的一種愛好的讚語）

這裏，我得提及在亞格斯洛特家的情形就不同了。老是有着一種質樸誠懇的友樣的同情。我還記得，當

我在沮利克時，也常受到他的殷勤款待。據他的家裏人告訴我，列寧也常去打擾的。他覺得住在他們家裏很自在。可是我沒有在他家裏碰見過列寧。

說到莎素里契，她對於青年同志的爽直和仁慈，是絕無僅有的。你，如果照字的真義，不能說她怎樣優待來客，這是因為她本人需要人家的款待，甚於她所能對人表示的緣故。她的膳宿和服裝，像樸素的學生一般。她所最嗜好的東西是煙草和芥辣。這兩種東西，她一樣大量地消耗。當她把很多芥辣放在一片極薄的火腿上時，我們老是說：『莎素里契是奢侈的……』

『勞工解放團』的第四個會員，杜茨基對於青年同志，是非常和愛與關心的。可是，我不記得，他身為『火花』主管人，曾否以顧問的資格參加過編輯部會議。杜茨基時常與伯里契諾夫來往。他對於革命策略，有很溫和的意見。他曾使我大為驚異的說：『老兄，將來決不會有一個武裝暴動的，而且也不是必要的。在監獄中，我們有許多好戰的領袖，他們僅僅爲了細故，煽動鬪爭，終於因而被毀滅了。相反地，我常抱這樣的主張：不要屈服，只要讓政府知道將來會發生一個大暴動，而不使事態竟至於此。我因此獲得政府的尊視，並且——政制的革新。我們必須用同樣的策略，對付沙皇政治；否則，必會發生鬪爭，而毀滅了我們。這樣，對於我們的目的，反沒有一些些的裨益。』

我很驚異於這種策略的言論，就依次地告訴麻爾托夫、莎素里契和列寧。麻爾托夫的反感怎樣，我已

不再記得了。沙素里契則這樣說：『猶琪尼（杜茨基的老綽號）常是如此以個人來說，是一個特別勇敢的人，但就政治而論，卻是極端謹慎和拘束的。』當列寧聽到杜氏的話時，他好像這樣說：『嗯，嗯……是……是……』於是我們倆笑着，而不再作任何批評了。

在日內瓦第二次大會的第一批代表到了，就不斷地和他們開會。對於這種預備工作，不成問題地，列寧是處於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老是明顯的。『火花』編輯部會議哩，『火花』組織問題會議哩，各別的代表會議哩，分組的和全體的，輪流舉行着。有些代表就發生懷疑，或起非難，或作固定分組的要求。預備工作，確乎費了許多時光，出席大會的工人，共有三個。列寧明確地和他們一一談話，把他們都說服了。一個是從彼得堡來的斯革特門。他還很年輕，但是審慎而周慮的。我記得他，和列寧談話後怎樣回來，（我們是住在同一個寓所的）而且不斷地重復說：『他的雙目，炯炯有神，直透視到一個人的心……』從尼古拉伊夫來的代表是卡拉法德。關於他，列寧曾仔細地問過我，——在尼古拉伊夫時，我認識他的，——而且又狡猾地笑着，接着說：『他說他已知道你是托爾斯泰派一流的人。』

『那真是胡說！』我幾乎憤怒地說。

『什麼事？』列寧半慰我，半惹我的說，『你那時大約是十八歲，一個人當然不會生下來就是馬克斯主義者的。』

「也許是的，」我說，「可是我和托爾斯泰主義毫無類似之點。」

所以談論中的主要點是法規。在組織法和討論上，中央機關報與中央執行委員會間的相互關係，成了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到國外來，就有一點意見，即中央機關報必須「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那也是多數俄國「火花」同人的意見——當然不是很強與斷然的。

「那是不行的，」列寧答道：「那是與關係的強弱相反的。他們怎能從俄國指揮我們呢？那是不行的，……我們是固定的中心，要由我們這裏來指揮。」

草案中有這樣一條：中央機關報須負責發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論著。

「那些也是反對中央機關報的嗎？」列寧問。
「當然。」

「那是爲了什麼結果必歸失敗？中央機關報的兩個同人間的爭論，在某種情形之下，或許有用的。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俄國委員，反對中央機關報的爭論，那是不可容許的。」

「那是指中央機關報完全獨裁的意見嗎？」我問。

「關於這點，有什麼壞處呢？」列寧答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決不能不如此的。」

關於所謂擴張權力的問題，那時也發生過許多衝突。在某一次大會時，我們——青年同志——使討

論趨於積極的擴張，與消極的擴張。

『是的，消極的擴張；俄文的意思就是「排斥」。』次日早晨，列寧笑着對我說，『沒有那樣簡單的事！只要在「火花」編輯部裏試行一次消極的擴張——哈哈，哈哈。』

對於列寧，最重要的問題是將來中央機關報的組織問題。實際上，中央機關報同時，須負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任務。列寧以為再容留六個委員的舊制，是不可能的。對於任何爭論問題，莎素里契和麻爾托夫幾乎老是袒護伯里契諾夫的。所以用最坦白的話來說，就是指三個對三個。兩個三人組都不能裁去任何一個的。於是就有相反的進程：擴大委員會。列寧要介紹我為第七個委員。爲了要與七人委員會以及擴大的編輯部，分開的緣故，另有一個幹部組織，包括列寧、伯里契諾夫和麻爾托夫。列寧把這個絕對沒有提及過的計劃漸漸地告訴了我，就是：他已提議我為編輯部的第七個委員，而且這個動議，除伯里契諾夫堅決反對外，業經全體通過，在伯里契諾夫眼中看來，第七個的加入，就是指「勞工自由」派佔了多數：四個「青年」對三個「老年人」。

我相信這個計劃是伯里契諾夫對我極度恨惡的主因。不幸地，在代表前，我們之間，也公然發生過小衝突。我記得這是因大衆報紙的問題而開始的。有些代表深覺有和「火花」同時發行一種大衆紙報的必要，如果可在俄國發行的話，這特別是「南部工人」團體的意見。列寧是個堅決的反對者。他的顧慮是

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理由，是怕黨內的優秀分子在未會安置妥當以前，根據社會民主黨的『大眾』簡單化的思想，形成一種特殊的團體。伯里契諾夫堅決贊成產生一種大眾機關報，公開地反對列寧，而且請求當地代表的擁護。我則贊助列寧。在某次會議中，我發揮一種意見——無論對與不對，現在對我都是無關緊要的。——就是：我們並不需要一種大眾機關報，但要種種宣傳員應用的小冊和傳單，以助前進的工人達到閱讀『火花』的程度，而且一種大眾機關報會減縮『火花』的效用。當它降低到經濟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員的標準的時候，更會使黨的政治狀況模糊的。

伯里契諾夫表示異議道：『你說『模糊』是什麼意思？當然囉，我們不能把一切都登載在大眾機關報上。我們要發表挑戰的與解答的文字，但並不是以我們的策略問題來估篇幅。我們對工人說，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作戰，但是我們當然不要與他理論『怎樣』。』

我這樣辯論：『可是經濟主義者與社會革命黨員說，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作戰。其差別就在於這點：『怎樣』來進行這種鬭爭。如果我們不把這個問題在大眾機關報上作解答，那就是把我們與社會革命黨員之間的異點擱置不談了……』

關於這點的辯答很佔勝利，於是伯里契諾夫有些窘迫。這件事沒有改善他和我的關係。此後不久，又發生了第二次的衝突。在一次幹部會議時，確乎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一俟大會對於編輯部之組織決定

後，即准我加入該部會議。伯里契諾夫則絕對反對，可是莎素里契對他說：『但是我要帶他來參加。』果然，她『帶』我參加會議。關於這事的內幕，我知道得很遲，就毫無疑懼地去出席會議。伯里契諾夫以他極擅長的、特殊的冷淡態度來恭維我。不幸的，就在這次會議中，幹部須討論杜茨基與前會述及的勃羅門梵爾特之間的爭論事件。杜茨基是『火花』的主管者，勃羅門梵爾特負責印刷事務。基於這點，就發生了一個權限問題。勃羅門梵爾特因杜茨基干涉他的印刷所事務，表示不滿。伯里契諾夫因舊交的關係，袒護杜茨基，提議勃羅門梵爾特祇負印刷技術之責。我表示異議，以為管理印刷所，祇限於印刷技術方面，那是不能的，因為還須處置組織上的與行政上的事件。所以對於這些問題，勃羅門梵爾特必須獨立的。我記得伯里契諾夫的答辯是：『如果托羅茨基同志是對的，就是說，行政上的及他種多方面的上層機構，都由技術所發展，正如唯物史論的學說所明示的那麼……』等話。

然而列寧與麻爾托夫是慎重地贊助我的，而且照着所需要的，把決議通過，這是最後的一擊。在這兩個場合，列寧是同情於我的。同時他驚訝地看出我和伯里契諾夫的關係，一天壞似一天，因而他的改組編輯部的計劃，有被破壞的恐慌。在與新到代表舉行的第二次大會的某一次會議時，列寧把我拉到一邊說：『關於大眾報紙的問題，你還是讓麻爾托夫去答辯伯里契諾夫好些。麻爾托夫將會「黏接」你所「破碎」的。最好讓他去「黏接它。」』這『破碎』和『黏接』的字眼，我還正確地記得。

在「蘭達爾咖啡館」裏舉行的某一次編輯部會議以後，我相信就在我剛才提到的同一會議以後，莎素里契用她所特有的那種怯弱的感人的聲音開始發言，怪我們攻擊自由黨員「太甚」，那就是她最痛心之點。

「看你們自己是怎樣過分努力，」她說着而不望一望列寧，雖然她心目中最注意列寧。「在末一期的復興報裏，史特羅夫以茹萊斯（法國社會主義者）爲我們的自由黨員的模範，並且說，俄國自由黨員不可脫離社會主義。不然的話，將有陷於德國自由主義派的可悲的命運之虞。但當取法於法國激進的社會主義者。」

列寧站在桌子旁邊，把他的軟帽往後推簷，直到高高地擱在額上，已散會了，他正預備走。

「我們必須還要攻擊他們，」他滿足地笑着說，似乎是在打趣莎素里契。

「但是注意，」她十分失望地高聲說：「他們來迎合我們，而我們去攻擊他們！」

「是的，當然囉，史特羅夫對他的自由黨員說：「你們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決不可用粗蠻的德國方法，但要應用較善的法國方法；你們一定要照左派法國激進主義者茹萊斯的樣式，賣弄風情、引誘、欺騙，而且腐化。」

自然，我不能把這些重要的詞句，逐字記下來；可是其意義與要領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了。此刻

我手頭沒有可作證明的東西，但這不是困難的事。你只要去查看一九〇三年的初期『復興報』關於史特羅夫所著自由黨員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一般關係及與茹萊斯主義的特別關係之論文。因着在上述事件時莎素里契所說的話，我才記得這篇文章。如果你問清這期『復興報』發行的日子，再加寄到日內瓦，到莎素里契的手中，給她閱讀所需的時日，就是說，三天或四天，你就能很切近地決定在『蘭達爾咖啡館』裏發生這次爭論的日子了。我憶起那時是春天——也許已是初夏了——太陽是光明地照着，列寧的深沉的笑容，也是光明的。我清晰地記得他那幽默的、確信的和『剛毅的』風采。我提到這點，是故意的，雖則他那時比較晚年來得瘦弱。莎素里契照着他的常態，很迅速地從這個望到那個。可是我相信：當我們離開時所發生的爭論，無一人置喙，而且爲時不久。

我和她一同回家，莎素里契悶悶不樂，她覺得史特羅夫的計劃已告失敗；我不能給她一點安慰。雖然如此，那時沒有一個人猜想得到在『蘭達爾咖啡館』門邊的幾句閒談，已把俄國自由主義者的計劃抨擊到怎樣的程度。

我現在見到我前面所記的史實，完全不適當：是太暗淡了。可是我在着手著述的時候，已把我記憶中所保留的一切甚至不很重要的事，都仔細地搜集了。因爲能述說那時的詳情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尙留在

人間。伯里契諾夫死了，莎素里契死了，麻爾托夫死了，列寧也死了，他們當中大概沒有一個人會留下備忘錄的。也許莎素里契是有的，但一些也沒有聽到。『火花』舊編輯部同人中，祇有亞格斯洛特和伯特萊沙夫兩人還活着。其他理由，且不多述，他倆只擔任小部分的編輯工作，而且也少出席編輯部會議的。杜茨基能敘述一些，可是他是在那個時期結束前不久，才來到國外的，比我只早一些時光，而且又不即時加入編輯工作。我們希望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能夠，並且會給我們以無價之消息。她那時是整個組織工作的中心。招待外來的同志，指導及遣送那些將離開的，辦理通訊，指導方法，寫作書信，記譯暗號等事，都由她負責。在她的房間裏，幾乎常常可以聞到焦紙的氣味。她常溫而而有力地埋怨同志們：如寫信太少，或弄錯暗號，或用化學墨水所寫的字很不清晰等。更重要的，就是她每日與列寧在一起從事組織工作，所以能注意到列寧的生活以及關於他的一切事情。同樣地，我希望當我在的時候，這些記錄不會是多餘的，因為至少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娜也是很少出編輯部會議的。可是尤其重要的，是以後的人不會時時注意到目擊者所不復見之事。無論如何，我是把盡我所能的說出了，現在我要把在『火花』時期列寧的政治的自我意識，自我估價，何以會發生斷然的轉變的意見，就是說，這個轉變爲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須的意見，概括地寫出來。

列寧到國外去的時候是一個三十歲的成年。在俄國，在學生聯合會中，在最初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團

體中，在放逐者的隊伍中，他均佔着最高的地位。他不能不感覺到他的力量已是無匹的了，因為凡與他接觸的同工的人都認識這點。他到國外去的時候，帶着大批理論的行李，一個重要的政治的經驗，而且完全被決定他的思想的一個確定的目標去工作的意旨所困住。在國外，等着他在『勞工解放團』擔任共同研究者的工作，特別是與深湛卓絕的馬克斯主義評註者。整個世代的大師、理論家、政治家、政論家，名震歐洲和關於歐洲問題的演說家，伯里契諾夫合作，伯里契諾夫左右，有兩個最大的權威者：沙素里契和亞格斯洛特，不僅是因為她那過去的英雄事蹟，使沙素里契達到最令人注目的地步，不實由於她對於廣博的歷史學識的徹底了解，和罕有的心理上的直覺所致。在伯里契諾夫那時，『勞工解放團』與老恩琪爾派（Engels）也有聯繫。和畢竟與羅馬社會主義有關的伯里契諾夫和沙素里契相對峙的，有亞格斯洛特。他在這『團體』中代表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經驗。這種『影響的範圍』之不同，也可從他們所居的地方來明示。伯里契諾夫和沙素里契常住在日內瓦，而亞格斯洛特則住在沮利克，亞格斯洛特專注意於策略問題。他從來沒有寫過一本關於理論的或歷史的書，這是誰都知道的。他著述很少，凡他所著的幾乎老是關於社會主義的策略問題。在這方面，亞格斯洛特顯示出他的獨立性與銳敏感。因和他作過無數次的談話，——有一時我和他及沙素里契很友善——我得到一個清晰的印象，就是伯里契諾夫所寫關於策略的問題，大都是蒐集工作的成績，至於亞格斯洛特所寫的，則比較那些我們祇能證諸印刷文件

的東西，重要得多。亞格斯洛特一再對這個「團體」（一九〇三年分裂前）的無疑的與可愛的領袖伯里契諾夫說：「喬治，你有一個長鼻子，你從各處取得你所需要的東西。」

就我們所熟知的，亞格斯洛特給列寧從俄國寄來的文稿「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工作」寫了一篇序文。因這個事由「團體」承認了這個天才青年為俄國的黨同志。但同時，使人知道列寧是被認為一個學生了。爲了這個聲名，列寧和其他兩個學生因而來到了國外。「火花」的計劃是在初期的師生會議中議定的。但我沒有參加。尤有進者，在上述半年中的，尤其是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時的觀察，使我們容易明瞭這個衝突絕度尖銳化的理由（除了剛才述及的原理問題外）是在於老同志對於列寧的發展與重要評價失當。

在第二次大會期間，以及就在大會閉幕以後，亞格斯洛特和編輯部其他人員，因對列寧的行徑表示不快，都感到驚異：「他怎樣辦這事呢？」當列寧與伯里契諾夫分裂以後，不久即參加代表會議，繼續作同樣的抗爭的時候。這種驚異，愈形增強。亞格斯洛特和其他幾人的心境，用下面的句子來形容，怕是最確當的了：「那一種蠅子刺傷了他？」

「他祇是在不很久以前來到國外的，」這老人說，「他來時不過是個學生，而他的行徑是在意料之中的。（亞格斯洛特在初期「火花」上的記述裏，尤其着重這點）何以會有這突然的自信心的呢？他怎

樣辦這事呢？」等等的話。

結論是如此：他在俄國預先已打下了基礎。與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通信不是徒然的；還有俄國同志反對「勞工解放團」的工作，進行得很快。莎素里契的憤怒的，確不下於其他幾人，可是也許她比他們懂得多些。早在分裂事件發生以前，她對列寧所說的話，不是徒然的。就是她在把列寧和伯里契諾夫對比之下，說列寧能「噬人致命」。誰知道這些話對列寧有着怎樣的影響？不管列寧是否一再自言自語着：「是的，那是對的；若不是莎素里契，誰能了解伯里契諾夫呢？他一再震動他的敵人，而終於把敵人放走了，然而我們的工作需要十分不同的東西……這裏需要能噬人致命。」

關於俄國同志的準備「工作」這句話，到何種程度，及作什麼意義講，才是對的，南德慈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最能說得明白。但就字的廣義來說，我們不用再考據事實，就能說曾有這麼一次準備。當列寧安定了，而且改進了今日的事情以後，老是準備着明日的的事情。他那創造的心智永不僵硬，他的警醒永不困倦。當革命迫近的時候，列寧作了這樣一個結論：「勞工解放團」並不站在即刻指導無產階級先鋒作戰的組織的地位。他自己則發揮了一切實際的推論。老年同志錯誤了；而且不僅是老年同志；這不啻是個澈底地認識他的目標的領袖了。照我的意見，他與老年同志、老師們一同工作後，而且自信他比較他們更有魄力更爲需要的時

候，他已覺得他是命中注定作領袖的了。據麻爾托夫所說，他在俄國時，確已是同輩中的翹楚了。可是到底僅是一個第一次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問題。俄國的標準仍帶着地方觀念的色彩。當時俄國的拉賽勒人和白勒爾人何其多呀！『勞工解放團』又是另一個問題。伯里契諾夫、亞格斯洛特及沙素里契是與考茨基、拉法爾格、圭斯特及白勒爾（真正的德國的白勒爾）同等級的。當列寧把自己在工作上的力量，和他們較量時，同時，他已用偉大的歐洲標準來較量自己，尤其是在編輯部分成兩派，他和伯里契諾夫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的自我意識，必然已忍受到艱苦。否則，後來他就不能成其為列寧了。

和老年同志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並不是因為對於革命運動有兩種不同的觀念。不，這還不是當時的情形，乃是由於進行政治的事件的方法，組織，尤其是把握實際的問題，以及趨向革命的態度，根本不同的緣故。黨內的老年同志們，曾有二十年放逐的歷史。『火花』與『黎明』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種文字事業，較諸其他一切為尤要。列寧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認為這兩種雜誌，是革命活動的一時的工具。至於伯里契諾夫對於革命的懷疑，早已深植於他的心中。在以後幾年（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中，就已證明出來。而更慘悲的，是在與帝國主義者作戰的時候，他以傲然的態度，來看列寧趨赴目標的直率行動。不過是用一種惡意的、自卑的、談諧的言詞來批評這點罷了。亞格斯洛特，像我已說過的，比較注意於策略問題，但是他的思想，頑固地不涉及那些為準備而準備的問題。亞格斯洛特把各派革命知識分子的傾向與

色彩，很精細地加以分析。他是一個革命前期政治的輕劑治療家。他的治法和手段，有似藥舖和實驗室那樣的性質。他診治時所用的分量，總是極少的；而他所須診治的社會，他能以最精細的尺度來衡量。杜茨基以爲亞格斯特像斯賓諾，不是沒有理由的。斯賓諾是個金鋼石匠，他那種需要放大鏡的工作，不是徒勞無益的。列寧則相反，他對於事實和情形是整個的看法，而且懂得怎樣把握他那關於社會的複雜思想，所以他對於革命敢保證其日在迫近中，至於伯里契諾夫及亞格斯特，則以爲革命是突然發生的事。

在老年同志中，也許以莎素里契爲最覺得革命之迫近。她性格堅強，一憑歷史的直覺，不拘泥於一切迂腐的學識，所以能使她看清這點，可是她覺得革命像一個老急進黨員，在她的內心的深處，她信革命的一切要素，已存在於我們中間，尤其是「實際的」自信的自由主義將站在領導的地位，而我們馬克斯主義者只以粗淺的批評和攻擊來威嚇自由黨員，因此，就根本作了革命的任務。當然，莎素里契沒有把這些意見發表在刊物上，就是私人談話的時候，她也沒有把這些意見完全流露出來。同樣地，這也是她的深的駁論，因而她和她所認爲理論家的亞格斯特處於對峙之勢。其實，在策略的輕量治療法範圍之內，亞格斯特無條件地着重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統治權。當他們加入運動的時候，他只是不肯把這種意見從集團和聯合的語法改爲階級的語法。他和列寧之間的裂痕，也就因此而露示了。

列寧到國外去的時候，不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斯主義者，不是作一般的政論家的革命工作，也不僅是

繼續二十年來「勞工解放團」的工作。不，他出國時，已是一個強有力的領袖，而不是一個普通的領袖，乃是一個正在長進，且顯而易見的革命之領袖。他去，是要在最短時期內爲革命創造意識形態的工具和組織的器械，我說到列寧爲目標而奮鬥的、激烈的、同時又熟練的特性，並不是指他僅想幫助「最後目的」底勝利之意。不，那是太廣泛、太膚淺了。乃是指具體的、直接的、急切的之意，就是說，他妥定了一個實際的目標，來促進革命之發動，並保證革命之勝利。當列寧與伯里契諾夫並肩工作，以及德國人所謂「距離的哀感」消失的時候，這個「學生」在實體上，必然很明瞭：他不僅不能從老師那裏再學得關於他所認爲基本的問題，並且那感謝他的權威的懷疑的多批評的老師有阻礙他的救助工作，並有把他和青年同志遠離之勢，這就是列寧對於編輯部組織的遠見的焦慮之根本緣由。因此而有「七委員與三委員」之組合，因此而有從「勞工解放團」把伯里契諾夫分開，而形成一個三人的領導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裏，列寧常可與伯里契諾夫論辯革命的原理，與麻爾托夫論辯革命的政策。他個人的化合是改變了；但是他那種「先見」在他最後成爲血肉和骸骨時，則仍然不變。

在第二次大會時，列寧說服了伯里契諾夫。可是他是一個不可靠的聯合者。同時他失去了麻爾托夫，而且是永遠地失去了他。伯里契諾夫在第二次大會時，已顯然地注意到一些事情；至少他那時曾對那個因爲他與列寧聯合而劇烈地驚異地譴責他的亞格斯特這樣說：「從這個麵粉團會產生像羅伯斯比

爾 (Robespierres) 一類的人。』不知道這句重要的話會否登載在刊物上，是否黨內的同志普遍地知道；可是我敢說：這話是正確無誤的。『從這個麵粉團會產生像羅伯斯比爾一類的人呢！而且還有比較重大得多的東西。喬治·梵倫丁諾維契！』歷史這樣回答着。但顯然地，這個歷史的啓示，在伯里契諾夫的意識裏，是隱約不清的。他與列寧破裂，轉向到懷疑主義和銳利的諷刺。但這種諷刺，因時光之逝流，已失去了銳利性了。

但是預料的『破裂』，不僅是伯里契諾夫及黨內老年同志們的問題。在第二次大會時，某個準備時期的開始階級已告結束。『火花組織』出乎意料地，幾乎竟分裂為兩個部分的這種情形，足以證明在這個開始階段已發生了許多不曾預料的事情。階級的政黨，剛衝破了知識分子的激烈主義之外殼。知識階級趨向馬克斯主義的潮流，沒有涸竭。學生運動及其左翼，傾向於『火花』。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特別是在國外，有無數贊助『火花』的團體。全都年少而無經驗，且大都是猶疑的。屬於『火花』的女生們提出像這樣的問題來請教主席：『一個『火花』同志能嫁一個海軍軍官嗎？』在第二次大會時只有三個工人，是由艱困中磨練而成的。『火花』集合並訓練職業的革命黨員，並且吸引年青的與意氣壯烈的工人們站在他們的旗幟之下。在另一方面，重要的知識分子集團，經過『火花』以後，就立即轉向於那些與『復興』報有關係的人們。『火花』是成功的，不僅因為它是正在形成的普羅政黨的機關報，並且因為它是

本身不被威嚇的極端左傾的善戰的政論家。知識階級中較激烈的分子熱心準備着在『火花』的旗幟下爲自由而作戰。關於這點，還有對於早已在經濟學上表示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發生教育學的不信仰。而如今已經，並且很公開地在『火花』的維護之下，完成其色彩的改換，而不變其本質。因爲『火花』的光榮的勝利，到底較其實際的收穫大得多。這裏我不評斷列寧在第二次大會前已怎樣清楚地完全地辨明這點，但無論如何，總比任何人更清楚更完全。那些集於『火花』旗幟下的雜色的思潮，在編輯部本身上已反映出來了。列寧獨自是未來的各種困難的問題可怕的衝突及無數的犧牲的象徵，此所以他有遠見和爭鬪之懷疑，此所以他審慎地處置組織問題，就是在黨綱第一條上關於黨員之資格有明顯的解釋。（註）

（註）列寧的規定是：『黨員是參加黨的組織者。』麻爾托夫則如此說：『黨員是在黨的支配下的工作者。』

當第二次大會從事摧殘『火花』的意識形態的勝利之成績時，列寧開始一種新的整理，一種新的較誇張、較有力的選擇，那是極自然的事。當大會的半數，及編輯部其他人員成爲他的公然的堅決的敵人的時候，他決心走這一步。僅有伯里契諾夫是他的不可靠的局部的同盟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一種新的選擇下決心，他必須要有堅強的信仰，不僅是在事件的本身，並且對他自己的權力。這種信仰之產生，是由於他的自尊心。那是因與『老師們』共同工作，及因在分裂前激烈的衝突而發生的。列寧完全地、有力

地直趨目標，不得不走這一步，而使其完成。列寧不斷地緊拉弓弦，至於極度，但同時又小心地用手指來試驗它是否有鬆弛的地方，或者是否有折斷的危險。

「你不能像那樣地緊拉弓弦；那是會折斷的。」人們從各方喚他注意。

「那是不會折斷的，」主人答覆道：「我們的弓是用不能折斷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材料做成的，我們必要更用勁地緊拉黨的弦，因為這支粗大的箭，須射得很遠的呀！」

十月革命前

列寧抵彼得堡及出席工人反戰與反臨時政府會議的消息，我是在加拿大集中營地安赫斯特時從美國新聞報上讀到的。那些被扣留的德國水兵，對列寧突然感到興趣。列寧的名字，他們才第一次在快報上看到，他們不耐煩地等待戰事的結束，因為那時他們可以被釋出獄。他們非常留神地注意到一切反戰的呼聲。到此時為止，他們僅僅知道雷勃納契（Karl Liebknecht）（註）可是他們時常聽說雷勃納契已被協約國所收買了。如今他們知道了列寧。我告訴他們關於席墨爾瓦特和康恩賽爾的事。列寧的外觀，比雷勃納契強得多。

（註）雷勃納契係德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因反對歐戰被捕，著有『軍閥主義與反軍閥主義』及『馬克斯主義文藝論』等書。

當我旅行經過芬蘭的時候，我第一次接到新出版的俄國報紙，即載有齊利脫來斯可白里夫及其他『社會主義者』加入臨時政府的電訊。由此可知情勢已是十分明顯的了。我抵彼得堡後兩三日，就熟知了列寧的四月間的論文。那正是革命所必需的東西。只再遲幾日，我就讀到『真理』報上的列寧的論著：『第一次革命的第一個階級。』那是他從瑞士寄出的。吾人雖能而且該極注意地用政治眼光來讀極不

準時的革命的初期『真理』報。與其背景相反的，列寧的『一封陌生客的信』顯示了他的整個的集團力量。語氣和平，理論明晰，這篇論文正像一個堅固的鋼鐵的螺旋形物，外纏堅韌的皮帶，將來它會開展、擴張，並且理論地包含革命的整個意義。

在我到達後的某一天，我和卡門耶夫同志約好去參觀『真理』編輯部。第一次的會晤，一定是在五月五日，或六日。我告訴列寧沒有什麼東西能使我與他的四月間的論文隔開，也沒有什麼東西能使我與我到達後黨所決定的整個路線隔開。我是面向着兩者之一的選擇問題，或者立即『個人』參加黨的組織，或者試引我與『勞工聯合會』的最優良的分子接近。該會在彼得堡的組織，幾乎有三千工友，還有許多有價值的、有勢力的革命分子：猶利茨基、倫納卡爾斯基、傑飛、佛拉狄米勒夫、曼紐爾斯基、卡勒凱、裘倫耶夫、波塞爾、列脫庚士，和其他人物。安陽諾夫·阿夫斯揚珂已經加入了黨；我想蘇可涅可夫也加入了。列寧則還未明白表示他參加這個或那個。比其他一切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我必須使我熟悉當時的情勢與人物。列寧以爲與麻爾托夫合作，特別是與剛從國外回來的一部分門雪維克國際主義者合作，是不無問題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國際主義者』本身與其事工的關係。因爲我暗中同意列寧，我就我一方面而論，不力促事件之自然發展。我們對於政治上的策略是相同的。在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中，我從到達的第一天起就這樣說：『我們布爾雪維克與國際主義者。』因爲這個聯繫詞『與』字，在我演說時一再重述的。

緣故，我就立刻改爲這樣的說法：『我們布爾雪維克國際主義者。』這樣，政略的集團就成了組織的集團之前型。

在七月前最緊急的時候，我到過『真理』編輯部兩三次。在最初幾次會議中，以及七月後的會議中，列寧在『平凡的』單純與鎮靜的假面具之下，予人以極度專心與非常沉着印象。在那些時日，克倫斯基派（Kerenskiad）似乎最有勢力。布爾雪維克主義者僅是『一個可憐的小隊。』黨本身還沒有認識他將來的力量。可是當時列寧則堅決地領導着黨趨於非常的工作。

他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中的演講，引起了大多數的社會革命的門雪維克派的不安與仇視。他們模糊地覺得列寧的目標很遠，但是他們沒有看清這個目標的本身。因此，那些革命的小百姓，就自己問道：他是誰？他是怎樣的人？他只是個瘋子麼？或者是一個尙不知範圍的歷史的推進者麼？

列寧出席蘇維埃會議，說到有監禁資本家五十人之必要，怕不是修辭學的『成功。』但是關係卻異常地重要。當他現着似乎沒有說完，尤其似乎沒有說到他所要說的神氣，離開講臺的時候，只有比較少數的布爾雪維克黨人的一陣喝采……當時屋內充塞了一種非常的空氣，暗示着將發生什麼事件似的，以致一時都覺得他們着迷似的隨從着這個極平凡極難解的人。

他是誰？他是怎樣的人？伯里契諾夫沒有在報紙上把列寧在革命的策源地彼得堡的第一次演講稱

爲熱病者的夢囈麼？民衆所推選的代表沒有一般地加入社會革命黨與門雪維克黨麼？列寧在布爾雪維克黨人中的地位沒有先引起他們自己的劇烈的不滿麼？

一方面，列寧絕對要求分裂，不僅是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分裂，而且要與一切自衛主義者（註）分裂。他在自己的黨中，發動了反對「老布爾雪維克」的鬪爭。照列寧所寫，在我們的黨史上，「老布爾雪維克」已一再扮演着悲哀的角色，因爲他們不加思索地重覆着習例，而不研究新近事實的實性。因此在表面上看來，他不啻削弱了他自己的黨的力量。另一方面，列寧同時在蘇維埃會議席上聲言：「說到現在沒有一個黨準備着奪取政權，那是不確實的。確有這麼一個黨，那正是我們的黨。」在一個遠離其他一切的「宣傳團體」的地位，與這個關於奪取廣大領土的政權，搖撼它的基礎的公開宣言之間，不發生絕大的矛盾麼？蘇維埃大會絲毫不明瞭這個怪人所要的是什麼，他所希望的是什麼，這個曾在小報上寫過短文的冷酷的盲信者。在蘇維埃大會席上，列寧曾極簡單地直率地說：「我們的黨準備着接收全部的政權。」於是鬨堂大笑，「盡你們的笑就是。」列寧說。他知道：「誰最後笑，便是最會笑。」列寧愛這句格言，因爲他斷然決意最後笑。他仍然鎮靜地表示，第一着，他們該監禁五十個或一百個最重要的豪富，並且對人民宣布我們視資本家如強盜，塔里斯欽珂（Tereschenko）並不比密留克夫（Miliukof）好，只是呆直些罷了。可怕的、破壞的、致死的、簡單的意見呀！大會中時時謹慎地對他喝采的一小部分的代表，對大會全體

說：「你們怕權力麼？我們正準備來奪取它。」自然都報以大笑，當時幾乎是謙遜，但是稍現一些不安的神情。

（註）對德國作革命的自衛戰之附和者。

對於他的第二次的演講，列寧又從某一個農民的信裏引用了幾句可怕的話：『我們必須更斷然地攫捕資產階級，使他們所有的接痕裂開。那麼，戰事就會結束；但如果我們不如此攫捕資產階級，那麼，我們就麻煩了。』這些簡單質朴的引句，就是整個的計劃麼？怎能不令人驚異呢？又是一陣大笑，謙遜與不安的表示。實際上，『攫捕資產階級』這幾個字，好像宣傳隊的一種抽象的標語，不發生多大的力量；可是那些驚訝的人們，不知道列寧已準確地注意到歷史上對於資產階級的攻擊逐漸增多，資產階級決不能避免『裂開所有的接痕』。列寧在五日間，對市民瑪克拉珂夫所說的話，不是落空的。他說：『左傾的工人與貧農比契爾諾夫派與席雷特萊派（註）多一千倍，比我們多一百倍。』

（註）契爾諾夫（Tchernof）與席雷特萊（Zeretel's）皆係所謂社會主義者。前者任第二次臨時政府的農務部長。後者任郵電部長。

這裏便是列寧的策略的主源，他從新的卻已困難叢集的德謨克拉西的表面，透視到『工人與貧農的態度』。這是作大革命的準備，可是全國尚未知道怎樣在政治上來證明它的準備。假借工人與農民的

名義的各黨派欺騙了他們。無數的工人與農民簡直不知道我們的黨，還沒有認識我們的黨是爲他們努力的作戰者。在當時，我們的黨的本身也還未理會它整個的潛伏着的勢力，因而右傾比工人與農民『多一百倍。』我們必須力促他們團結一致。我們必須爲無數的民衆而準備黨，爲黨而準備無數的民衆。不要匆急地前進得太遠，但也不可落後，要仔細地耐心地解釋清楚。即使是極簡單的事情，也必須要解釋清楚。『打倒十個資本主義的部長！』門雪維克派不贊同麼？打倒門雪維克派！他們笑麼？一切事情遲早會來到的，誰最後笑，誰最會笑。

我記得我提議請蘇維埃大會先商討正在準備中的向德國正面進攻的問題。列寧同意這點，但明顯地他要和其他中央執行委員討論這個問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卡門耶夫同志帶來布爾雪維克黨的關於攻擊的宣言稿，那時列寧急促地寫成的。我不知道此稿是否還是存在。他的原文既不合參加大會的布爾雪維克黨人的意思，又不爲國際主義者所贊同，我不復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我們所希望代表我們去促它通過的波生，也表示反對。我另起了一個宣言稿，居然通過了。如果我不記錯的話，把這個宣言稿提出討論之權，是操在斯佛爾特羅夫（註）的手中。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中，他當布爾雪維克黨員的主席的時候。

（註）斯佛爾特羅夫（Sverdlov）係著名的布爾雪維克黨員，曾任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斯佛爾特羅夫的身材雖然瘦小，顯示不健康的樣子，可是他的態度，卻予人以重要的與從容有力的印象。他當主席的時候，態度鎮靜，有條不紊，準確無誤，像是一個發動機。其祕訣當然不在當主席的藝術本身上；但實際上，是因他對於大會各個代表的情形有優越的了解，並且確切地知道他所要成就的事件。每次會議前，先與代表舉行分組會議，到處加以審查和警告。總之，他在舉行會議之前，已有一個進行路線的概念；但即使沒有預備會議，他也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這個或那個工人對於當前的問題將有怎樣的反應。以我們的黨的標準來計算，那時黨同志的數目，是非常大的。可是他對於他們的政治的知識程度，有着清楚的見解。他是個天生的組織者與結合者。凡擺在他面前的政治問題，只是超於其他一切的具體的、可組織的問題，只是各級人民與黨組織內的集體間相互關係的問題，只是整個組織與民衆間相互關係的問題。對於關係重大的數目，他能立刻像代數公式似的，而且幾乎機械地抓住。因此，就革命行動的問題而論，他供給了一個極重要的政治程式的證據。

徒勞無益之六月十日的示威運動以後，當第一次蘇維埃大會空氣緊張，及席雷特萊脅迫工人解除武裝的時候，我和卡門耶夫同志到『真理』編輯部去，在那裏，因列寧的提議，經過一度的磋商，就用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寫了一個給大會常務委員的請願稿。

在這次會議中，列寧說了幾句關於席雷特萊的話，涉及他六月十一日的最後的演講：『他曾經是一

個革命者。他已度了幾多年的牢獄生活呀！而現在卻把過去的一切盡行毀棄了。」

這些話並不含有政治的意味，也不是爲政見而發的，但祇是對這個昔日的大革命家的可悲的命運之一種急遽的反感罷了。在他口吻裏，有着一種惋惜悲歎的意味，但是說得簡單地平淡地。因爲在列寧沒有什麼東西像對於感情上的些微疑懼與心理上的弱點那樣的厭惡。

在七月四日或五日，我記得在泰列特宮中，遇見列寧（及辛諾維埃夫？）我們的進攻已被擊退。統治階級中之有勢力者對布爾雪維克黨員抗辯之烈，可謂已達於極點。

列寧說：『現在他們要打倒我們了。現在是他們既定的時機。』他的基本的意見，就是開始退卻，而在覺得必要的時候，則非法前進。列寧的戰略少有如此利害的轉變的，但這是如常地由於對於情勢的急遽的推測而然。嗣後當共產黨國際主義者第三次大會的時候，列寧突然說道：『在七月間，我們所鑄下的大錯，不在少數。』因此，他存着我們該作急遽的武裝暴動的心意。以全國而論，過多的各種示威運動，不能作我們的勢力的準繩。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在七月四、五日，他以鎮靜的決斷，不僅估計了革命黨方面的情勢，而且也估計了對方的情勢，進而作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他們』現在正是向我們進攻的時機。僥倖地，我們的敵人在論理上既不一致，意志又不堅決。否則，他們——官吏的徒黨——如果在七月暴動後最初幾天內拘捕了列寧的話，就會恰像德國官吏的徒黨在一年或半年後對付雷勃勒契與羅莎·盧森堡（註）

的手段來對付他的，那是非常可能的事。

（註）一九一九年一月雷勃勒契與羅莎·盧森堡在德國發動騷擾事件，事敗，卒同被暗殺。

隱避或非法行動這種爽快的辦法，在上述會議時沒有決定。高爾尼洛夫事件是一個繼續的變動。我個人就多住上兩三天，而在某些黨派及組織會議中提出了這個題目：『該做的是什麼？』對布爾雪維克黨人的暴風雨似的打擊，似乎是難制勝的。門雪維克黨人處處想利用這種還未展開到完全與他們無關的情勢。我記得我被迫在泰列特宮的圖書館裏出席探礦公司聯合會的代表會議演講。到會的一共祇有幾十個聯合會的領袖們，門雪維克派佔多數。我講到探礦公司對於布爾雪維克派勾結德國軍閥主義者所加給他們的罪名，實有提出抗議之必要。關於這次會議的經過，我現在僅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但是我確實記得有兩三個面露惡意的人在那裏對我們作嗤嗤聲。（表示侮蔑的意思——譯者）

在當時，恐嚇已成爲固定的手段。監禁簡直是日常例行的事務。我在列寧同志家裏躲避了幾天，以後我又出來，出現於泰列特宮中。不久就被捕入獄。當發生高爾尼洛夫事件及布爾雪維克黨人繼起反攻的幾天內，我就被釋放了。在那時，我們把『勞工聯合會』拉攏到布爾雪維克黨裏來。斯佛爾特洛夫向我建議，要我去見仍在躲避中的列寧。我不再記得誰領我到工人集議處所。（不是雷契亞麼？）在那兒我見到了列寧。那裏我也遇見了卡林寧。當着我的面，列寧進一步問他關於工人的情形態度；他們是否仍在

作戰，他們是否會支持到最後，我們是否能奪取政權等等。

那時列寧的心境怎樣呢？如果有人要用幾個字來說明的話，他必定說是一種抑制着的不耐與深深的焦慮的心境。他清楚地見到時機迫近的當兒，一切都到了危急關頭，同時他認為——不是沒有理由的——黨的領袖並不會推斷一切必然的結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態度，在他覺得是太被動、太遲緩了。列寧不覺得已有公開地恢復工作的可能，因為他怕他被捕入獄後，黨的領袖或許會更加遲緩；這種遲緩，無可避免的，會使他們不注意到非常的情勢。所以在這些時日中，列寧的驚覺與性急，在躊躇不定的形迹上，在等待與逡巡的暗示上，實已達到了極點。他要求我們須實行一種真正的共同的計劃，突然襲擊敵人，並奪取政權——然後我們要留神，在一切事情上，我們的意見必須更加一致。

列寧的傳記作者必須非常留心地來記述列寧回抵俄國的事實，及其對於民衆的態度。列寧在國外已有十五年之久，只有在一九〇五年間，曾有一短時期的中斷。那時，他對真實之感覺，對活着的勞動的人類之天性，不但沒有減少，卻因作理論的思維與創造的想像之故，反而加強與有力。藉着個別的偶然的晤談與觀察，他抓住了而且改作了整個的圖畫。可是在使他終於發展到能擔負將來歷史上的重任的那個時期，他仍然是住在國外。他以完全革命的觀點來到彼得堡，那正是他一生全部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經驗之梗概。這裏，他先就俄國醒覺的勞動大眾的活的經驗，再用他所搜集的思考過的，作了試驗。結果作

成了他自己的試驗。

公式經得住試驗，而且在俄國。在彼得堡，他們充滿着通常的堅決的團結的精神，因而有着不能制勝的力量。舉出個別的而且多少是偶然的例子，來呈示整個的配景的圖畫，現在還沒有到時候。整個的圖畫會帶着一切革命的呼聲自己表現出來的。這裏，列寧證明了——也許他自己第一次完全地整個地覺得——他對於那些醒覺大衆的仍然混亂的呼聲，已有着能怎樣聽聞的能力。他看到二月間俄國主要黨派的不足道的爭論，各報競載的所謂有力的輿論，以及見識淺小，妄自尊大，喋喋多言等情形，有着怎樣深刻的官能的蔑視。——總之，官場習氣的二月的俄國。

這幕活劇後面，又點綴着德謨克拉西的事件，他聽到十分不同的事件的轟轟聲；當懷疑派向他指出關於動員資產階級及小百姓的輿論的許多困難的時候，他咬緊了牙床，而他的顴骨也比平常高聳些。意思就是他抑制着自己，不將他所見到的爽快地向地告訴懷疑派。他見到並懂得障礙重重，正不下於其他人們，可是他清晰地顯着地物理地看出歷年來所積聚的巨大的力量，現已逐漸地表現出來了。把所有的障礙都毀掉了。尤要的，他看到聽到而且察覺到俄國工人的數目愈形增多，未曾忘了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在他們背後有着幻想的戰爭試場，和自衛主義的謬說與欺騙，而現在他們正準備作偉大的犧牲與空前的奮鬥。他察覺到：士兵已被三年來『無意義無目的』的惡魔似的戰爭所迷惑，直到革命的霹靂來把

他們促醒，於是準備對一切無意義的犧牲、恥辱，以及因莫名其妙的憤恨而激發的打擊，償還所有的代價。他聽見農民仍然拖曳着幾百年來奴隸制度的鐵鍊，而現在被戰爭所激醒，才初次見到與壓迫者、蓄奴隸者，主人兇狠地不客氣地結算總帳的可能。農民在契爾諾夫的妙語與自己的「手段」——土地均分的大暴動——之間，無助地笨拙地躊躇着。士兵在愛國主義與不可抑制的逃亡的兩途之間逡巡着。雖然工人們已經發生懷疑，而且含有一些敵意，但是他們仍然聽信了席雷特萊最後之長篇演講。克倫斯基裝甲巡洋艦的汽鍋裏的蒸汽，已不耐煩地沸騰了。水兵，混合了工人的鋼一般銳利的仇恨，與農民的像笨熊那樣的忿怒，並且見到可怖的戰爭已到了白熱點，早已把一切認為與現行官僚政治和武力的壓迫有關的東西，都拋入海中。二月革命站在一個深淵的前面。仁慈的結合已收集了、展開了，並且縫合了沙皇政治的合法的碎片，又把它裝成一個德謨克拉西的合法的薄弱的表面。可是在這個薄層之下，一切逐漸沸騰了，哄鬧了。過去一切的錯誤，都在找出路。對警察、地方檢查員、警長、戶籍吏、廠主、那些靠薪俸度生者、擁有財產者的憎恨，對寄生者、手皮白嫩者、罵罵者，及毆打人者的憎恨，準備作歷史上空前的革命的毀滅。這就是列寧所見到的、所聽到的，這就是列寧在久離之後，再與這被革命的激變所打擊過的國土接觸的時候，在實質上，所明白無誤地絕對確信地覺得的。

「你們笨貨饒舌者！傻瓜！你們相信歷史是在招待會（指巴黎上流婦人所習行的）裏造成的麼？

們相信在那裏，出身高貴的民主黨人與有頭銜的自由黨人親善麼？你們相信在那裏，昨天還是可憐的粗俗的律師，很快地就學會了吻那些白皙的纖手麼？笨貨！饒舌者！傻瓜！歷史是在戰壕裏造成的，在那裏，在愚笨的瘋狂戰爭的壓迫之下，兵士拔出鎗上的刺刀，刺入官長的胸膛，乃逃回家鄉，放火燒毀貴族的房屋。這種殘暴的行爲，不使你們快樂嗎？不要興奮，歷史會答覆你們：把興奮完全止息。這些僅僅是早已過去的一切的結果罷了。你們想像歷史是在你們所接觸的代辦職務上造成的嗎？胡說！饒舌！做夢！發癡！歷史——也許是那樣的——此時已擇定了契辛斯卡耶皇宮，連舞女，與昔日沙皇之昔日太太，作它的準備試驗室。從那裏，從這個象徵舊俄的建築裏，她準備把整個彼得堡沙皇政治下的官僚，貴公子的墮落與無恥，來一個清算。這裏，這舊日帝國歌舞少女之官，將有工廠的代表與來自戰壕的灰白色的、有傷痕的、不潔的使者，成羣地進來，而新的預言將從這裏傳遍各地。」

這班在革命時不幸的官吏，舉行會議，想設法把皇宮復歸給其合法的主人。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的及門雪維克派的報紙，忿怒地磨着他們的牙齒，因為列寧在契辛斯卡耶皇宮的露臺上向羣衆喊出了社會革命的口號。但這種緩慢的努力是無用的，或者增加列寧對舊俄的仇恨，或者增加其對舊俄算帳的決心，兩者卻已達到了極度。在契辛斯卡耶皇宮的露臺上站着列寧，就是兩個月後躲在茅棚裏，再幾個星期後，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中任主席的同一個人。

但同時列寧見到在黨的本身裏有着一種保守性的反對——初次心理上的，不是政治性的——對那還待促成的大變動。列寧焦慮地注意着一部分黨領袖與無數工人間的態度漸趨不同。他一時很不滿意，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採用了武裝暴動的公式。他知道把理論變為事實的種種困難，他任意用種種的力量與方法，努力來制服黨，使及於民衆，制服中央執行委員會，使及於各級黨同志。他把單獨的同志召集到他的藏匿之所來，採訪新聞，統制，處置對審事件，而且在各方面，他用間接的方法，把標語送交黨內大衆，使黨的領袖們感到實有迅速行動，且趨於極度之必要。

要作那時列寧的行爲的正確的圖畫，我們必須確知一事，就是：他對於民衆要而且能完成革命這點，有着無限的信仰，但對於黨的幹部，則無同樣的確信。此時，他逐漸清楚地認識，一分鐘也不可輕易放過一個革命的情勢，是不能任意地維持的，除非等到黨已準備利用它的時候。不久以前，我們在德國會有過這種經驗。

甚至在短期間之前，我們曾聽到過這樣的意見：如果在十月間，我們還沒有奪得政權的話，那末，就要遲到兩三個月以後，多麼大的一個錯誤呀！如果在十月間，我們還沒有奪得政權的話，我們簡直就不會奪得了。十月前我們的力量，是由於民衆不斷的傾注，他們相信本黨要做其他黨派所未曾做的事。如果此時他們看到了我們方面言行間的任何躊躇、拖延、失當；那末，在這兩三個月的當兒，他們就會離開我們，像他

們從前脫離社會革命黨及門雪維克派一樣。資產階級就會有透一口氣的機會，而且會利用它來談和平勢力的比例，就會澈底的改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必致於延擱到無限的將來。列寧之所以決定去行者，正因爲此。由此突現出他的不安，他的焦慮，他的懷疑，和他的不間斷的忽急，終於救度了革命。

黨內意見紛歧，在十月間就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裂口。其實，在革命的某幾個階段裏，早已有有意義地顯露出來了。第一次衝突，關於列寧論文中的原則與理論，在列寧到達後，就立刻發生的。第二次無結果的衝突，是關於四月二十日的武裝示威運動。第三次則因爲企圖在六月十日發動示威運動的原故，「穩健派」認爲列寧要騙他們作一次武裝示威運動，暗中則懷着作一次暴動的目的。再一次的衝突，較爲利害，是因七月事件而發生的。報紙上充滿着不同的意見。

內部衝突之發展的另一個階段，是因預備國會的問題而轉入的。此時兩個集團公開地激烈地起而相鬪。在這次會議中通過一件議案麼？被保存着麼？我不知道。但是所有的論辯，無疑地是異常有趣味的。兩種趨勢是極明白地給解釋了：一種是奪取政權，另一種是在國民會議中作反對的工作。主張與預備國會經濟絕交者，僅佔少數，可是多數的不同的意見，並不怎樣有力。列寧從他的藏匿處所，對於爭論提出反駁，並寫信給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示其決心。列寧在這封信中，對於與克倫斯基——席雷特萊的勃利金國會（註）經濟絕交者，寫着非常有力的言詞。我沒有在他的『全集』第十四卷的下半部裏找到這信。這異常

有價值的文件被保存了麼？意見之紛歧，在十月革命的階段前，達到了最緊張的關頭。那時是當暴動時和決定暴動日期時的一個停止匯兌的問題。最後，就在十月二十五日大革命以後，對於與其他社會主義的黨派聯盟的問題，其意見之不同，實異常地尖銳。

(註)一九〇五年勃利金 (Bulygin) 被沙皇委任實施選舉法，以組織俄國國會。

四月二十日事件、六月十日事件、及七月事件發生前夕，列寧的重任之具體改變，是非常有趣味的事。後來列寧在私人談話間，以及——就我所知道的——在大會時和德國代表談及一九二一年德國三月事件時，曾這樣說：『七月間，我們做了笨拙的事情。』什麼是『笨拙的事情』呢？是有力的或太有力的攻擊的方法，與活潑的或太活潑的探訪消息的行動麼？不如此時探訪消息，我們或許不會接近民衆。在另一方面，如大家所熟知的，各處實地的偵察，不覺變爲正式的戰爭。七月間事件，幾乎就是那樣。然而正在適當的時機，下了退卻的信號，而我們的敵人，在那些時日裏，也沒有趨於極端的勇氣。這時當然不是時機。就其整個的情形而論，克倫斯基派只有一半的力量，且膽怯的克倫斯基派瘋痺了卡爾尼洛夫派到自己害怕自己的程度。

十月革命

『民主黨代表大會』行將閉幕的時候，因我們的堅決主張，規定十月二十五日爲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日期。在曾經敘述過的不僅在工人區內而且在軍營裏時刻緊張的情勢中，我們覺得最實際的是在這天集中注意力於彼得堡的衛戍軍，因爲這是蘇維埃大會該決定政權問題的一天；而已準備妥當的工人與軍隊，必須幫助大會。我們的戰略是取攻勢的。我們正開始爲政權而進攻，但我們的激動手段，則是說敵人，要破壞蘇維埃大會，因而我們必須用最殘忍的反抗來對付他們。這整個計劃是基於革命潮勢的力量，這種革命潮勢各地正在高漲着，使敵人既不能閒散，又不得平安。如果我們慘敗的話，後衛團可以保守他們的中立。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對彼得格勒蘇維埃所施的不足取的措置，立刻可以保證我們的斷然的優勢，同時列寧怕敵人或許會調動一小部分堅決地反革命的軍隊，用令人驚駭的武器先來攻擊我們。如果敵人突然地把黨與蘇維埃抓在他的權力之下，並且佔領了彼得堡的領導中心，那末，他就可以因此而壓止革命運動，漸漸地就得平安無事了。

『我們不敢等待，我們不敢延擱，』列寧屢屢地反復地說。

在九月底或十月初這種情形之下，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在蘇凱諾夫家裏舉行了。那著名的夜會，列寧來到這裏，斷然地決心此時要毫無懷疑、猶豫、展期、容忍、延擱地通過一個決議。可是，在他攻擊那些反對武裝暴動者以前，他已向那些使武裝暴動與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發生關係的人們大發雷霆。有人已把我的演講告訴了他：『我們已確定在十月二十五日暴動。』我確曾經幾次對那些在預備國會及臨時政府中『有力的』布爾雪維克反對黨中找尋革命之路的同志們說過這句話。我說：『如果布爾雪維克主義者佔多數的蘇維埃大會不奪得政權的話，布爾雪維克主義本身便處了死刑，那末，十分之八九，甚至臨時政府不致於召集，如果在已經過去的一切事情之後，我們召集有多數人預先爲我們擔保的蘇維埃大會的話，那末，我們將公開地誓言：我們要奪取政權，至遲不過十月二十五日。』

列寧很厲害地痛罵這個日子。他說，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問題，對他簡直不感到興趣。這個大會有什麼意義呢？實際上能召集嗎？在這種場合，大會本身能做什麼呢？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可是我們不可受大會的束縛。對敵人宣布暴動的日期，那是可笑的荒謬的事。最好是假託十月二十五日起事，但實際必須絕對在大會之前且與大會無關地發動暴動。本黨必須用武力來奪取政權，然後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大會的問題。我們必須立即行動。

七月間當列寧確切地預料『他們』會來打倒我們的時候，他把敵人整個的情形考慮了一下，就作

了一個結論。就是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最好是以武器來驚嚇我們，來破壞革命，然後向革命單獨進攻。因為在七月間列寧對於敵人的明敏與堅決的估價過高了，或許對其物質的可能性的估價也是這樣吧！這種過高的估價，十之八九是自覺的，而且在戰術上是十分對的；它將加倍黨的力量。但不管一切，黨並不自己盡力地與大會無關地與暗暗地奪取政權的形勢。如果對於工人的行為不是沒有影響的話，那便是一個錯誤，而且已使那衛戍軍感到異常地棘手了。兵士們知道代議院與兵士小隊，他們僅因大會而知道黨。如果暴動在大會前暗地裏發動，不與大會接觸，不被大會的權力所掩蓋，也不明顯地停止蘇維埃派政權的鬭爭的話，那末，勢必使衛戍軍已陷於危險的混亂狀態。我們也不可忘記，在彼得堡仍然存在著與當地蘇維埃並立的社會革命黨人與門雪維克派為領袖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我們只能藉蘇維埃大會來反對它。

最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形成了三派：反對藉黨來奪取政權的一派，爲了當時情勢之壓迫，不得不放棄這個中心的口號『政權歸於蘇維埃』；要求立即發動暴動的列寧，是不與蘇維埃發生關係而獨立的；最後一派認爲必須使暴動與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因而希望把暴動延期，直到第二次蘇維埃大會才發動。

『無論如何，』列寧鄭重地說，『奪取政權必須在蘇維埃大會之前，否則，他們要把你們驅逐開去，你

們就開不成什麼大會了。』最後，實際通過了一個決議，就是發動暴動，至遲不得過十月十五日。就我所記得的，關於規定的日子本身，幾乎沒有什麼討論。大家都知道這個約期，僅含有大約的性質，即所謂一種定方位的日子。臨時發生的事件，或許可以把它提早些或改遲些。但是要作討論的，只有這個日期問題，不再其他的問題了。必須要有一個規定的日子，而且是個早些的日子，那是十分明白的事。

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時，主要的辯論，當然是專心對付那些全然反對武裝暴動的同志的論爭。這裏我不得不介紹列寧在上述會議中所作的三四個演講，關於這類題目：『我們必須奪取政權麼？』『這是奪取政權的時候麼？』『如果我們奪取了政權，我們要保持它麼？』關於這點，列寧在當時及以後，曾寫過幾種小冊和論文。他在會議中所作的幾次演講，其思想當然是一貫的。可是要描寫他那種想用以感動反對者猶疑者的熱烈奮激的臨時演講之一致的精神，以及他的思想之過程，他的自信，他的勇敢，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革命的命運，就在這裏決定。到深夜會議破裂了。全都覺得有些像經過了一次外科開刀手術似的一部分出席會議的委員（我也在內）在蘇凱諾夫家裏度過了後半夜。

嗣後事件之進行，給了我們許多幫助，企圖改換彼得堡衛戍軍，以致產生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以蘇維埃的權力來作暴動的準備，並且使它與關於整個彼得堡衛戍軍的主力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一層，我們可以認為合理的。

在上述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至十月二十五日的期間，我記得與列寧只晤談過一次，而且只有這次晤談的印象是模糊的。是在什麼時候呢？一定在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間。我記得我很感興趣地要知道列寧對於我在彼得堡蘇維埃會議的演講中的『自衛』性一點，有怎樣的意見。我已證明我們正準備在十月二十二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日——作一次武裝暴動的謠傳是不確的，而且我明言我們要以堅決的反攻來對付任何侵襲，並且要用非常的手段。我記得當時列寧的神情是很平靜的，鎮定的，我敢說，是很少懷疑的。他不僅不反對我演講中公開的『自衛』的話，而且甚至認為對於消除反對派的過慮，是有效力的，同樣地，他時時搖着頭問道：『但是他們不會暗中先向我們下手麼？』『他們不會突然襲擊我們麼？』我聲明以後一切幾乎會自動地繼續進行。這次晤談時，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時候，我想史丹林（註）也在場。也許我把兩次會晤相混了。我必須一般地說，留在我記憶中的關於革命前幾天的印象是很雜亂的，致使我只能很辛苦地來把它們分別、分析和整理。

（註）史丹林係蘇俄共產黨的重要人物，『五年計劃』的力行者。性格剛強，態度冷靜，有『列寧第二』之稱。

下一次我遇見列寧，就在十月二十五日那天，在斯麥珥內。在什麼時間呢？我一些印象也沒有了，大概是傍晚的時候吧！我記得很清楚，列寧立刻焦急地向我問及我們正在和彼得堡軍事區本部談判中的關於處置衛戍軍的問題。那時各報紙上已登載了這樣一個消息：談判進行順利，即將圓滿解決。

『你贊成妥協麼？』列寧問道，並且銳利地望着我。

我對他說，我們發表這種安慰人心的消息是故意的，那祇是開始普遍攻擊的一時的戰略。

『呀，好……極……了！』列寧充滿着快樂與熱情地啞啞地說。他興奮地擦着他的手開始在房間裏往返地踱着。『好……極！』列寧特別贊賞這種戰略：籠絡敵人，使他處於有利的地位，——還有比這種戰略更妙的麼？

但在這既定的事情上，這種戰略有着十分特殊的意義，就是表示我們已經直接進入了堅決行動的境界。我就對他說，軍事工作正在很普遍地進行着，此刻我們已經占領了城中許多重要的地方。列寧已在一張昨夜印就的公告上看到——或許也是我給他看的——『凡企圖利用革命，搶劫財物者，即就地正法，決不寬貸。』初則列寧像有所思考似的，我甚至覺得他似乎對此感到不安，但後來他說：『對……的。』

他不厭足地研究關於暴動的一切瑣事。這些瑣事供給他以確實的證據，就是事情是正在積極進展中，斷然手段已實行了，現在沒有召回和退卻的可能了。我記得這個新聞給與列寧的印象很是深刻，就是因書面的命令，我已遣派一部分的帕夫洛夫斯基軍隊來保障我們的黨及蘇維埃報的露面。

『軍隊已出發了麼？』

『已出發了。』

『報紙是正在創辦麼？』

『是的，確實是的。』

列寧高興極了。在他的驚呼、大笑和磨擦雙手上，已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在那時，我承認：列寧最後因和我共同謀劃之故，對於我們不奪取政權的意見，已表示一致。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是怕敵人會阻撓我們的計劃，突然向我們襲擊。惟在此刻，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他才鎮定下來，並且終於承認事情進行之適當。我說：『他才鎮定下來。』——可是對於大部分的問題，他又神經緊張了，就是關於暴動的進一步的更具體的巨細各問題：『但請注意，我們不該作某某事麼？我們不該着手某種工作麼？我們不該停止某種工作麼？』諸如此類的問題與提議，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關係，但都起源於全然相同的熱切的內心的理解力。結果，立時抓住了關於暴動的整個問題。

我們一定不可太匆急地促入革命的事件中。當革命的狂流直向上湧，暴動的勢力自動地增漲時，同時那些反動力隨命運而動搖而潰散時，則讓步到最低限度的誘惑就迫近了。急速的勝利，像失敗一樣地，要被解除武裝。我們不敢不注意到事情之關鍵。在每一次新的勝利後，一定會有人說：一件事也沒有成功，一件事也不能保證；在最後勝利前五分鐘，事情的進行，必須要有像開始武裝行動前五分鐘時那樣的警

醒、那樣的奮發、那樣的力量；勝利後五分鐘在第一次歡呼高喊還未平息的時候，我們必須對自己說：已經征服的事情，都還不能保證，一分鐘也不可失誤。那就是列寧對於情勢的把握，他的行動與方法的方針，他的政治特性的和革命精神的官能的精髓。

在赴門雪維克的部務會議的途中，我曾經說過，在第二次大會時，特安同我們坐在走廊上一張小桌旁邊，怎樣認出改裝的列寧的情形。這個事件已被保留在一張畫圖中，就我從這張畫圖所能斷定的，沒有一點與當時的實情相符。雖然，那是一般的歷史的繪圖的命運，不僅是它的命運是如此。

我不復記得在什麼時候，但無論如何，很久以後，我對列寧說：『該把它的概略記出來，否則，人們要胡說亂道了。』

他開玩笑似地作了一個失望的姿勢說：『不管有沒有概略，人們還是要胡說亂道的……』

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第一次會議在斯麥珥內舉行。列寧沒有出席，他逗留在斯麥珥內的他的房間裏。按我所記得的，這個房間裏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一點傢具的。後來有人把毯子舖在地板上，並且在上面安放了兩個坐墊。列寧和我就在這裏躺臥休息。但是祇一回兒，我就被招呼了：『特安正在演講，你必須去作答復呢！』當我答復後回來的時候，我就靠近列寧，重復躺臥，當然，列寧不能入睡，因為實際

上沒有入睡的可能。每五分鐘或十分鐘，便有人從會場跑進我們的房間裏來，把那裏正在進行的事情向我們報告。還有使者們從城中來向我們報告：在安東諾夫·烏佛斯揚珂的領導之下，奮力圍攻冬宮，終於把它攻取了。

一定是在次日早晨，因為沒有入睡的一夜，把在前的一天分開了。列寧顯出疲倦的樣子。他微笑着說：「從非法的地位到奪得政權的變遷——是太粗暴了。」『會使人頭昏目眩呢，』他立刻用德語接着說，並且在他的面前作了一個十字架的記號。在我聽到了他這個對於取得政權的，多少是個人的評語後，他就從事於日間的工作。

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

希望喚醒德國、奧大利、匈牙利以及諸協約國的工黨，我們就開始和平談判。爲了這個原因，我們不得不盡可能地把談判拖延下去，給歐洲工人以明曉蘇維埃革命本身的重要的真相，特別是它的和平政策的機會。在談判第一次破裂以後，列寧提議派我到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去。本來對付珂珥曼男爵和霍夫曼將軍的光景是令人不能滿意的，不過像列寧所解釋，『要延攔這種談判，一定要有人來作延攔的工作的。』關於談判的一般的性質，在斯麥珥內，我們簡短地交換了一些意見。我們應否簽字這個問題，則延攔了一些時日；我們說不出事情應怎樣進行，也不知道在歐洲會有怎樣的反應，更不敢臆測將轉於怎樣的形勢。當然，我們沒有放棄這個迅速地發展革命的希望。

我們不能再作戰一層，我覺得是十分明顯的。當我首次赴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經過許多戰壕的時候，我們的同志，不拘怎樣昇級和激勵，已完全不能發動一次意義重大的示威運動，來抗議德國的過甚的要求了；所有的戰壕幾乎全都空了，——沒有一個人膽敢說出，即使有條件地，『繼續作戰』這句話。和平，任何代價下的和平……嗣後，當我從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回來的時候，我企圖用『愛國的』演講，說服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來擁護我們的代表團。他高聲說：『不可能的！全然不

可能的；我們不能回到戰壕去；我們不會被諒解；我們會失去所有的勢力。」說到再作一次革命戰爭的可能這一層，列寧和我本人的意見，並沒有絲毫的異點。

可是還有其他問題在：德國人仍能作戰麼？他們是否站在向革命開始進攻的形勢，以示停止戰爭之意麼？我們能怎樣探出德國士兵的心理狀態，怎樣來測定它呢？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對於他們發生了什麼影響呢？德國的一月罷工事件，明示破裂已經開始。可是破裂已到了怎樣的程度呢？我們一定不可把下述相關的兩點，向德國工人及德國士兵提出麼？——一方面，工人的革命宣布停止戰爭；另一方面，霍亨查勒政府（Hohenzollern government）（註）則下令向工人的革命進攻。

（註）霍亨查勒政府指德國資產階級的政府。

「當然，那是很動人心目的，」列寧答道，「這樣的發問，一定不會沒有效力的。可是危險，很危險呢！假定德國軍閥主義是強得可以，那就很有開始向我們進攻的可能——那末，我們將怎樣？我們不敢冒這個險，因為此刻我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國民會議之解散，起初很厲害地有損於我們的國際地位。開頭，德國人就深怕我們也許會與「愛國的」國民會議成立協定，以致作繼續戰爭的企圖。在這方面，一個輕率的決定，結果會破壞革命與國家的；但後來它自己就顯露出來了，並且需要德國人方面的一種新的努力，國民會議之解散，在德國人方面，認

爲我們明白表示預備在任何犧牲下停止戰事。珂珥曼的語調突然間變爲更殘忍了。國民會議之解散，會給予諸協約國的無產階級以怎樣印象呢？其答復並不是困難的：協約國的報紙形容蘇維埃組織不過是霍亨查勒政府的代理者。如今布爾雪維克黨人破壞了這個「德謨克拉西的」國民會議，以便在比利時及法國北部被德國軍隊佔領的時候，與霍亨查勒政府作卑屈的和平談判。自然地，協約國的資產階級要向工人大衆散佈流言，以完成其離間的工作，因而使協約國易於對我們作武力的干涉。誰都知道的，就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中間，也有一種強烈的謠言，說布爾雪維克黨已被德國用金錢所收買，在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所進行的事件，僅是預先指定的角色所演的一幕喜劇罷了。在法國和英國這種議論一定說得更令人相信。我的意見是如此：無論如何犧牲，在簽訂和平條約以前，我們對於德國政府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必須給歐洲的工人一個明顯的證據。正因爲這些顧慮，我抵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後，就提出「教育性的」示威運動的意見。其方式是如此：我們要停止戰事，但不簽訂和平條約。我和其他代表商議，覺得他們對於我的提議表示同情。我就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列寧。他的答復是：「如果你到這裏來，我們要再討論一下。」這個答復差不多已經明示了他不贊成我這個建議的意思；此刻，我記不清楚了，而且手頭也沒有這封信；確實我不敢斷定我究竟有沒有保留這封信。我到達斯麥珥內後，我們就作了幾次長時間的討論。

「那完全是很動人心目的，而如果霍夫曼將軍不能調動他的軍隊來抵抗我們的話，那就不能再好的了。但是我對此，僅有一點兒希望。他要遣派巴孚列安農民的精銳部隊，那末，我們將怎樣？你自己曾說過戰壕全都空了，假使他不顧一切，再發動戰事，我們又將怎樣？」

「那時我們就會被迫簽訂和約，而且人人會明白我們已沒有其他辦法了。即僅僅爲了這點，我們也得對這個誣指我們暗中與霍亨查勒政府勾結的謠傳，給予厲害的打擊。」

「自然，關於這點，還可以說出許多理由，但是到底太大膽了。因爲此刻我們的革命比其他一切更爲重要；我們一定要不惜任何犧牲，使得我們的革命確有把握。」

這些問題的主要困難以外，在黨的本身，還有許多例外的困難。在黨內，至少在領袖人物中間，有着非常不願簽訂布列斯特條件的意思。我們的報紙上所揭載的關於談判的消息煽動了，並且加強了這種感情。最明顯地表示出來的，係左派共產黨的團體。他們提出以革命的戰爭來解決這個事件。這種情勢，當然使列寧感到極大的困擾。

「如果僅在一種口頭的哀的美敦書之壓迫下，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決定簽訂德國所提出的條件，」我說，「我們就冒了分裂本黨的危險了。我們的黨需要把事態的真相揭露出來，並不亞於歐洲工人。如果我們與左派決裂的話，黨就會走入確定的路線，趨於右傾。凡反對十月革命的或爲社會主義各黨派之障

礙的同志，就會無條件地贊成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我們的工作，卻不因締結和平而完成。左派共產黨員中在十月革命時期擔任主角者有許多許多呢！」等等。

「那是完全不容爭辯的，」列寧答道，「可是此刻的問題是革命的命運問題，我們能恢復黨的平衡。但在其他一切事情以前，我們必須挽救革命，而我們只有簽訂和約，才能挽救革命。分裂較諸武力破壞革命的危險來得好些。左派同志會止息憤怒，於是——即使發生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分裂——回到黨裏來。在他方面，如果德國戰勝了我們的話，那末，我們中間就沒有了一個人能回到黨裏來。很好，我們就接受你的計劃罷。我們拒絕簽訂和約，然而德國立刻向我們進攻。那時你將怎麼辦？」

「我們就在武力下簽訂和平條約。那末，全世界的工人就都明白這個真相了。」

「但是你將不贊成用革命的戰爭來解決它麼？」

「決不。」

「明白了這點，試驗大約就不是很危險的了。我們以埃斯查尼亞和勒特維亞的犧牲為孤注。近來有幾個埃斯查尼亞同志來會我，並且告訴我，農民已怎樣盛大的開始社會主義的組織。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如果我們必須犧牲社會主義的埃斯查尼亞的話。」列寧開玩笑似地說，「但是為了一種有益的和平的原故，承允一個妥協是值得的。」

「但如果你立刻簽訂和約，那末，德國有武力干涉埃斯查尼亞和勒特維亞的可能這層，是不必一談的麼？」

「我們承認這是可能的，但無論如何，這僅是一種可能之事，然而也幾乎是一種確實之事。無論如何，我主張立刻簽訂和約；那是比較穩妥些。」

關於我的計劃，列寧最怕的是：如果德國重復向我們進攻，我們就沒有機會簽訂和約了；就是說，德國軍閥主義不會留給我們機會了。「這隻野獸突然地跳起來。」列寧時常這樣的說。在討論和平問題的會議中，列寧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反對左派，而對於我的建議，他的態度是審慎的鎮靜的。他抑住着他的壞脾氣，裝出遷就隨便的樣子，尤其是在黨公開地反對簽約的時候，及反對執中的解決辦法是簽約的過渡的時候。一個最聞名的布爾雪維克會議——參加第三次蘇維埃大會的代表會議——無疑地證明了我們的黨，剛才經過了十月革命猛烈的火爐，需要有戰鬥力來操縱國際間的地位。如果我們不會有一個執中辦法的話，大多數的代表怕已投票贊成作革命的戰爭了。

這裏再作一些補充，或許不是沒有意味的吧！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員並不立刻出來反對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至少，史碧麗杜諾華起初是個絕對主張承認和約者。「農民不需要作戰，」她聲言道：「他們將承認任何性質的和約。」「立即簽訂和約，」她在我第一次從布列斯特回來的時候對我這樣

說，『並取消糧食專賣。』因此，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就贊成這個執中辦法：停戰而不簽約，可是這是到革命的戰爭的一個階級，——『無論如何。』

德國代表團對於這種宣言怎樣答復，是誰都知道的，就是德國不會再以軍事行動來對付我們。因為這樣的決定，我們回到了莫斯科。

『他們不會欺騙我們麼？』列寧問。

我們作了一個不可確定的手勢，大約不致於那樣。

『很好，』列寧說，『果真是那樣，那就更妙了。我們已經保全了我們的面子，而我們現在又得避免戰爭。』

休戰前兩天，我們從仍逗留在布列斯特的沙摩羅將軍那裏接到了一個電報，述及據霍夫曼將軍聲稱，德國擬從二月十八日十二點鐘起，和我們作戰。因而已請他離開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列寧首先接着這個電報。我正在同他在辦公室裏，和卡爾林及其他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談話。列寧悄悄地吧電報交給我。我記得，他的面容使我立刻覺得這個電報一定含有重大的不利的消息。列寧急急地結束了和社會革命黨員的談話，以便考慮這個新的局勢。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欺騙了我們，且遷延了五天。……這隻野獸不放過任何一樣東西。我們除了簽

訂從前的條件外，什麼都不能做，如果德國仍然同意的話。」

我回答說，我們必須讓霍夫曼將軍作一次切實的打擊。

「但是，那是指放棄都寧堡，犧牲許多礮隊等的意思麼？」

「自然，這是指新的犧牲的意思。可是他們必須如此，所以德國兵纔開入蘇維埃境內作戰，他們必須如此，所以這方面德國的工人，他方面法國和英國的工人纔會明白。」

「不，」列寧回答說，「這當然不是一個都寧堡的問題。可是一刻也不能失誤的。這次試驗是失敗了。霍夫曼願意作戰，而且確能作戰。延擱是不可能的；照我算來，他們已經從我們這裏害了五天的便宜，這隻野獸跳躍得很快。」

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立即發一個電報去，表示願意簽訂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因而這個必要的電報就拍發了。

「我相信，」我和列寧在某一次私人談話時這樣說，「在政治上，這正是我辭去人民委員會的外交委員的時機。」

「爲什麼？我們不要採用議會的方法。」

「可是我的辭職會給予德國人以我們的政策的激變之印象。並且會加強他們對於我們的確實準

備簽訂並保守條約之信仰。』

『也許，』列寧深思地說，『那是一個有力的政治的議論。』

我不復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得到德國軍隊在芬蘭登陸與立即戰勝芬蘭工人的消息。我只記得，我在靠近辦公室的走廊上遇到列寧。他很是興奮，從前或此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像那樣的神情的。

『是的，』他說，『我們必須公開地作戰，即使是沒有目的的。因為在這個時候，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那是列寧接到了關於芬蘭革命失敗的電報後的第一個反應，但是過了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的時候，他說：『不，我不敢改變我們的政策。我們之參加作戰不會救助革命的芬蘭，只是一定會毀壞了我們自己。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來援助芬蘭的工人，然而不可違背和平的原則。我不知道，這樣是否會使我們得免於難。可是，無論如何，這是可以挽救危亡的惟一的方法。』

這樣果真挽救了我們的危亡。

像我們時常說到的，在我們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種協商，是不可思議的。因着這個觀念，我們對於不簽訂和約，就沒有下決心。我們只要查看奧富雪安尼可夫的小冊中列寧對於這個問題所擬製的投票

表決表，極有幫助地使我們相信，凡主張「既不作戰，又不講和」這個試驗性的辦法的黨員，對於這個問題表示「贊成」。不管我們的黨在某種條件之下，簽訂「失面子的和約」是否合理。我們切實地說：如果在一百次機會中只有二十五次，霍亨查勒政府不會決定和我們作戰，或者說，沒有和我們作戰之意，那末，我們必須作簽訂條約的嘗試，即使是有着某種危險的。

三年以後，我們冒險用刺力來試資產階級的和貴族的力量。——這次是列寧所創議的。我們被擊退了。這事與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之間的不同點在那裏呢？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在危險程度上有些不同罷了。

我記得拉特克同志曾經寫述，在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與進兵到凡爾塞的期間，列寧的戰略智力最爲顯著。如今我們都知道，這次犧牲極大的進攻波蘭，是個錯誤。不僅致使訂定列加和約，而使我們與德國斷絕關係，而且，因同一時期間的其他無數事件，予歐洲資產階級團結一致的一個強有力的刺激。如果你在我們與德國間已有着同一邊疆的假想之下，描述一九二三年的情勢，那末，列加和約對於歐洲的命運的反革命的重大意義，你就能很清楚明白了；一切事情似乎都表示着：德國事件之開展，一定會走一條十分不同的路線。那是無疑地確鑿的事，就是，波蘭革命運動本身，若沒有我們的武力協助及其失敗，結果必較順利。就我所知道的，列寧本身極注重於進攻凡爾塞事件之錯誤。然而拉特克對於列寧的戰

術的通盤計劃之評價，是十分對的。自然，在我們試了波蘭工人大衆而得不到像我們所希望的結果以後，在我們被擊退，而且不得不被擊退以後，因為波蘭事件仍然沉寂，我們進兵到凡爾塞，只是一種黨務罷了；在我們被迫簽訂列加和約以後，——就不難下這個結論：那些反對進攻的都是對的。同時，和德國並立及劃清公共邊界，其結果必定好些。一切到後來都明白了。列寧在進攻凡爾塞事件上，其思想之勇決，實令人非常驚異。危險性固大，可是目標更大。因其計劃之失敗，所發生的偶然之事，並不危及蘇維埃共和國之生存，只是削弱了它的權力罷了。爲着歐洲工人的一次示威運動的原故，就冒險來簽訂可恥的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一事是否值得，我們只能留待將來的歷史家去判斷。但事實是很明顯的，就是在示威運動後，我們不得不在壓迫之下簽訂和約。此時幸賴列寧立論之正確及其有力的驅策，終於挽救了這個局勢。

「假使德國無論如何要向我們進攻，假使他們進兵到莫斯科來呢？」有人這樣問。

「那末，我們就向東邊撤退，到烏拉斯，並且再行聲明，我們已準備簽訂和約。珂斯納茨克流域產煤頗多。我們要憑藉烏拉斯的實業和珂斯納茨克的煤產，憑藉烏拉斯的無產階級和我們所能拉攏的莫斯科及彼得堡的工人，形成一個烏拉斯·珂斯納茨克共和國。如果必要的話，我們能再向東移，越過烏拉斯山脈。我們要開到卡察喀，但是我們要團結一致。國際間的形勢將有許多次的變遷，我們可以再擴大烏拉斯」

·珂斯納茨基共和國的疆界，可以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但如果我們現在不加思索地陷於革命的戰爭，喪失了工人及我們黨的精華；那末，我們當然永遠不能回來了。』

在那時候，烏拉斯·珂斯納茨基共和國佔了列寧大部分的理論。他一再以這個問題來遏制反對派：『你們知道我們在珂斯納茨基流域有極大的煤田麼？烏拉斯的金屬與西伯利亞的小麥，我們就有一個新基礎了。』始終不知道珂斯納茨基究在何處，始終不知道該處的煤產與布爾雪維克主義及革命戰爭的將來之關係的反對者，對於列寧方面的理論，則驚訝地看着或笑着，而且以爲一半是笑話，一半是欺詐。實則，列寧決不是說笑話，只是——忠實於自己——對於情勢的一切歸局及最惡的實際的結果，都加以考慮罷了。烏拉斯·珂斯納茨基共和國的概念，對於他在加強他的和他人的深信上，本來是必要的；就是說，尙沒有喪失什麼，與懷疑的戰略是不宜的。這些思想，也永不會是對的。

誰都知道的，烏拉斯·珂斯納茨基共和國並沒有實現，也幸而沒有實現。然而我們可以說，這個沒有實現的烏拉斯·珂斯納茨基共和國拯救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 簡稱 R. S. F. S. R.）

無論如何，你如果要明瞭並評價關於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條約的策略，你必須把它和列寧的十月革命的策略連結在一起。反對十月革命和贊成簽訂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確實都是一種同樣

的投降的心理之表現。其特有之事，即在簽訂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的投降條約以後，列寧發揮了與會保證本黨十月革命勝利同樣的無窮的革命的力量。這就是這種十月革命與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條約之自然的固有的關係，這種巨大的力量與大膽的遠見之結合，以及不失去調和的意義之激勵，供給了我們品評列寧的方法與列寧的力量之準繩。

解散國民會議

十月革命後幾天，若不是幾個鐘點，列寧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問題。

『我們必須延期選舉，』他聲言，『我們必須擴大選舉權，凡年在十八歲者，皆應有選舉權。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重新編制選舉名冊。我們自己的名冊是沒有價值的，是一班已在此摧促着的知識分子。然而我們需要工人和農民。卡爾尼洛夫派和凱特德派，我們必須宣傳是在法律之外的。』

答覆是：『在此時延期是不利的，而且更將被視爲國民會議之一種破產，因爲我們自己對於臨時政府延期國民大會一層，曾經加以非難過的。』

『呀，那是笨話，』列寧回答說，『拿出重要的事實來，不要一味地空論。就臨時政府而論，國民會議是含有前進一步的意義，或者至少大概有這個意義；就蘇維埃政權而論，尤其關於現在的選舉名冊，國民會議沒有問題地是指落後一步的意義。爲什麼現在延期是不利的呢？如果國民會議是凱特德門雪維克社會革命黨所主持的——那便是有利的麼？』

『可是那時我們將比較強些，』其他的人表示異議說，『因爲現在，我們仍然太軟弱。在鄉間，他們對於蘇維埃政權幾乎一點也不知道，如果現在我們把國民會議延期的消息傳入了鄉間，就更削弱我們』

的勢力了。」與農村的關係比我們任何一個較爲深切的史佛爾特洛夫，對於延期選舉一事，反對尤烈。

列寧保持着他的態度，雖沒有任何人的擁護。他表示不滿意地搖着頭說：「這是一個錯誤，一個公然的錯誤，也許會使我們付極大的代價呢！如果它只是不把革命根本犧牲了……」

雖然，在這個決議——不延期——通過後，列寧致其全力於組織法規，就是關於國民會議開會時的各項事宜。

結果，我們必佔少數，即使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加入的話。他們名冊上的數目，與右派一樣多，且完全充滿着幻覺。

「自然，我們必須解散國民會議，」列寧說，「可是那時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將怎樣呢？」

年老的納旦遜竭力安慰我們。他來到我們這裏，「再作討論，」他開口第一句話就這樣說：「嗯，就我而論，如果真到了那個地步，就用武力解散國民會議就是了。」

「妙極了，」列寧快樂地驚嘆着，「凡是對的，必定永遠是對的。但是你們一派會贊成麼？」

「我們中間還有人在猶豫，但是我相信，結果他們會贊成的。」納旦遜答着。

那時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正在極端的激烈主義的蜜月，而且確實贊成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那樣行動的話，」納旦遜提出意見說，「那末，我們把國民會議中你們一派的和我們一派的代表，在中央執

行委員會裏聯合一起，這樣組成一個會議。」

「爲什麼呢？」列寧顯然惱恨地答道，「模倣法國革命，不是麼？解散國民會議，表示我們認可蘇維埃的方式。可是你們的辦法會使一切陷於混亂狀態：彼此都弄不清楚。」

納旦遜想用他的辦法來證明我們要致力於國民會議的一部分的力量，可是他立即放棄了這個意思。

列寧緊張地從事於會議的構成分子的問題。

「這是一個公然的錯誤，」他說，「我們已獲得了政權，而現在我們使我們自己處於被武力壓迫去重新奪取政權的這種情勢之中。」

他非常審慎地繼續進行準備工作，估計一切巨細事件，並使猶利茨基擔當痛苦的試驗——就是，使猶利茨基最感不幸的被指派爲國民會議的人民委員一事。其中之一，列寧命令一團幾乎全係工人所組成的萊德希軍隊，調到彼得格勒。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也許會懷疑，」他說，「這裏必須要有無產階級的決心。」

國民會議的布爾雪維克的代表，從俄國各地來到。在列寧的主張與史佛爾特洛夫的領導之下，都被分派到各工廠各實業機關，各軍團中去。他們便成爲一月五日「補充革命」的組織工具的重要分子。至

於社會革命黨員和代表，他們以為與人民的選舉人參加競爭，是不相合的。『人民已經選了我們，讓他們給我們辯護就是。』

必然地，這些來自各省的小百姓簡直不知道他們該做什麼；大部分只是害怕罷了。可是他們當心地準備着第一次會議的開會儀式。他們都攜帶着蠟燭，是怕布爾雪維克會剪斷電燈線的原故；也攜帶許多夾肉麵包，是怕他們會被停止供給飲食的原故。這樣，德謨克拉西用夾肉麵包、蠟燭，嚴密地武裝着，來和獨裁制參加競爭，人民對於那些自以為人民的代表，並不給予一點思想上的擁護，他們在實際上只是已經過去的革命時期的不速之客罷了。

當國民會議破產的時候，我正在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但爲了參加一個大會，第二次回到彼得格勒的時候，列寧對我談及解散國民會議的情形。『自然，在我們一方面，沒有把會議延期，是個極大的冒險。——那是很不聰明的。可是到底，這樣的措置是最妙的。以蘇維埃的權力來解散國民會議，在革命的獨裁制的名義上，是形式的德謨克拉西的整個的公開的破產，這是個好教訓。』

這樣，理論的擴展與調動萊德希軍隊事件相攜並進。那時這種思想無疑地是因列寧的意識而形成。至於他那種意識，後來在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時，在他所發揮的關於德謨克拉西的令人驚異的論題中，已有系統地陳述出來了。

形式的德謨克拉西的批評，是有着一段長的歷史的。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平凡性，我們和我們前輩已給它解釋為政治的德謨克拉西的崩潰。其後則為『社會的』德謨克拉西。可是資產階級懂得怎樣促它實現，以致純粹的德謨克拉西不復能存在。政治的歷史，經過一個冗長的時期，其間社會的德謨克拉西藉純粹的德謨克拉西的批評而存續；然而前者實際地成就了後者的責任，且雖有缺憾，仍是支持着。這種事件，歷史會時常明示：對於早日出任調停的強國所不能處置的事工，就被反對黨召來作保守的解決。因緊急地準備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情況，德謨克拉西就成為最高的標準，最後的手段，不可侵犯的聖所，那便是資產社會的最後的矯飾。這就是我們所遇到的事。在十月間致命的物質的打擊以後，資產階級擬在一月間的陰暗的奉為神聖的國民會議中復活起來。無產階級革命在簡單的公開的粗暴的解散國民會議以後，其進一步的勝利的展示，則為給形式的德謨克拉西以一個使它永不會復原的最後的打擊。爲了這個理由，列寧這樣說是不錯的：『到底，這樣的措置是最妙的。』

在社會革命黨選舉人員的全體姿態中，二月共和國第二次又趨於滅亡之途。

在我的關於二月的官僚的俄國，以及那時的門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一般的印象的背後，還現在清晰得像昨日的某個社會革命黨的代表的面影。直到今日，我還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

他來自何處。他必定是從鄉間來的。從表面上看來，他像一個年青的教師，一個從前有價值的神學生。一個扁平的鼻子，帶着眼鏡的臉，幾乎沒有一根鬚髯，顴骨高聳着。就在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出現於蘇維埃的同一會議中。饒舌的、易感的、瘦弱的、賣俏的，而特別是患病的契爾諾夫解釋他本人和其他的人加入政府的原故，以及因此而獲得之利益。我記得他有許多次說着這句昏庸的話：『你們既使我們加入政府，你們也能使我們脫離政府。』那個神學生以熱烈的崇拜的眼光，望着這個演講者。在著名的修道院裏，當一個誠信的巡禮者有幸聽到一個虔誠的牧師講道的時候，必定也會有這種感覺與表情的。他不斷地演講下去，室內呈現着厭倦的形迹，輕微的噪聲已可聽到了；可是，對於那個神學生，其崇敬的喜悅的源泉彷彿還沒有涸竭似的。

『是的，我們的革命或者寧可說他們的革命，就像這個情形。』當我初次看到並且聽到這個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的時候，我自言自語地這樣說。

契爾諾夫演講完畢以後，暴風雨似的一陣喝采。在一個角落裏，少數的布爾雪維克黨人，不滿意地在談着。當他們給與我對於門雪維克派及社會革命黨員的自衛戰的批評以友誼的贊助時，他們突然站了起來。

這個虔誠的神學生極度地受到驚嚇，感到困惱。並不是憤怒：在那時候，他尚不敢對一個已回來的亡

命者感到憤怒，可是他不能明白，對於像契爾諾夫之加入臨時政府那樣令人滿意與羨慕的事，怎麼會被人反對的。他的座位，離我祇幾步遠。在他的臉——我用作會議的晴雨表的——上，驚訝和恐怖與還未完全現露出來的尊敬交織着。這個面形如二月革命的影像，老是纏住在我的記憶裏——從各階級中得到的最好的小百姓神學生的影像；因為還有更壞的影像，就是特安和契爾諾夫的。

契爾諾夫之當國民會議的主席，不是徒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暗淡的革命的二月的俄國，仍然是半幻想的。實則，共和主義的冒險罷了。呵，在一個時期，是多麼簡單！呵，在另一個時期，則又是多麼狡猾！竟把他高舉了起來……在選舉的時候，農民藉熱誠的神學生之助，攫取了契爾諾夫派。把他們置於一個高的地位上。而契爾諾夫允承了這個委任，不是沒有種族的天惠與種族的狡猾的。

至於契爾諾夫，在這方面也是民族性的。我說「也是」是因為在四年前，我曾寫述關於列寧的民族主義。這兩個人物的比較，或者即使間接的接近，似乎是不適合的。如果這僅是他們兩人的問題，確實是錯誤的，不像的。可是這裏是個民族的「分子」及其化身和感想的問題。契爾諾夫佈現了舊知識的革命的因襲思想；在他方面，列寧則體現了它的美滿與完全的勝利。

在舊知識分子中，貴族有着他的地位，而且悔恨地流暢地空談着對於人民的義務；還有虔敬的神學生，被神燈從他的神父的小房間裏射照着，曾開了一個小窗——只是一個隙縫——看到批評思想的世

界開明的農民，動搖於社會化與個別的私有財產制之間；頭腦簡單的工人，被學生引入歧途，就脫離了他的同輩，且不與異鄉人接觸。這都是契爾諾夫派所有的，以及他的可憎厭的口才，不定的主見，和不安的平凡。蘇菲亞·比羅夫斯加（註）那時的舊知識階級的理想主義，則絲毫沒有留存在契爾諾夫派中；代替那種思想的，乃是企業家和商人的新俄的某種東西，尤其是商人的，『如果你不欺騙，你就不能出賣你的東西。』

（註）蘇菲亞·比羅夫斯加係一女恐怖黨人，曾與謀殺沙皇及其官吏的重要分子合作，擬用火藥炸毀冬宮，卒被捕絞決。

在他那時的俄國社會思想之發展中，赫爾仁（Herzen）是個重要的有力的人物。可是把他推回到半世紀以前，剝去他的天才的彩色的羽毛，變回到他自己的本來面目，再將他置於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背景前面，你就可以找出契爾諾夫派的要素了。對於契爾涅什維斯基，則很難於作同樣的分析工作，但是契爾諾夫派也已爲他包含着諷刺畫的要素，與密契洛夫斯基的關係是很直接的，因爲在密契洛夫斯基本人，其固有性格已傑出儕輩了。如對於我們的整個的發展一樣，農民分子是契爾諾夫的基礎，但是反映在幼稚的半知的鄉村的小資產階級裏，或者反映在過於成熟的激烈的知識階級裏，契爾諾夫派的極盛情形，必然是一霎那間的事。然而兵士、工人、農民，曾在二月暴動時所激發的情感，已傳遍於一年的義勇兵、神學生、大學生，與辯護士傳遍於聯絡委員會，及一切所有的狡猾分子，並且把契爾諾夫派高舉到

德謨克拉西的頂點。在底層，顯然的裂口早已形成，而德謨克拉西的頂點，則高懸在空中。爲着這個原故，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全部的契爾諾夫派致全力於這個誓言：『滯留吧，呵，時光！你是很華美的。』但時光並不滯留。兵士變成了『撒但』，農民無限制地接踵而至，卽神學生也改正思想，爲二月革命効勞。結果，契爾諾夫派垂下了多摺的外袍，不雅觀地從幻想的頂點落入實際的泥沼。

就其爲俄國無產階級與我們全部黨史的基礎而論，農民分子實爲列寧主義的基礎。得意地，在我們黨史中，不僅有着容忍與熱情，而且有着各種行動。農民不僅有着成見，而且有着識別的能力。一切活動、勇敢、憎恨權勢、蔑視怯弱的特點，總之，一切表現於社會改革的過程中與階級鬭爭的動力中的特點，在布爾雪維克主義中，都已表現了出來。這裏，農民分子被無產階級及我們黨史中最強的動力所反映，而不僅在我們這裏，列寧對於這種折光，作了一個合理的解釋。因此，在這層意義上，列寧是民族分子的領袖。契爾諾夫派也反映着同樣的民族的農民分子，但不是從頭反映出來的，——特別地不是從頭反映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這幕悲喜劇（解散國民會議）是列寧主義與契爾諾夫派主義的原則上的最後的衝突。可是僅是原則上的衝突，因爲實際上並沒有衝突，祇有『德謨克拉西』的後衛的一種微弱無力的示威運動罷了。以蠟燭與夾肉麵包當作武裝的一幕，則不計在內。傳令官的故事，已碎成斷片，賤價的勳章，已被扯了下來，誇大的道德的力量，已自己證明出可笑的懦弱無力。完了！

組織政府

彼得堡的政權，我們已經奪取了。因此，便發生了組織政府這個問題。

「我們將用什麼名字呢？」列寧高聲地提出這個問題，「不要用總長或大臣的字樣，因為那是可憎的陳舊的名稱。」

「我們可以稱爲委員，」我提議，「可是現在各種委員太多了。或者稱爲主任委員吧……不，「主任」兩字很不好聽，稱爲人民委員怎樣……」

「人民委員麼？我倒很贊成這個名稱。整個的政府用什麼名稱呢？」

「稱爲人民委員會怎樣？」

「人民委員會，」列寧重述着，「那是個很堂皇的名稱，那是含有革命的意味的。」

我很精確地記得這最後的一句話。

內幕中復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員韋克喜爾及其他人物作冗長的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我能略略供獻一點消息。我只記得列寧對於韋克喜爾的無恥的要求，異常憤怒，對於我們中間被這些要求所感動的人，也同樣地表示憤怒。可是我們仍然繼續討論，因爲，照那時的情形看來，我們不得不與韋克喜爾算一次清

賬。

因卡門尼夫同志的提議，克倫斯基政府所提倡的關於兵士處死刑的法律，就廢止了。我不復正確地記得卡門尼夫作這個提議是在什麼地方；但是大概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而且顯然正就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我記得討論這個提案時，我也在場。但是我沒有提出異議，列寧則還未曾到會，這顯然是在他抵達斯麥理內以前的事情。當他聽到了這第一次的立法的決議的時候，他憤怒到不可遏止的地步。

「簡直是發瘋，」他重復地說，「我們怎能避免槍決，而完成一種革命呢？你們以為你們如果解除了武裝，你們能與敵人解決一切麼？那末，你們有什麼鎮壓的方法呢？監禁麼？在資產階級戰爭中每個黨都希望勝利的時候，對於監禁誰加以注意呢？」

卡門尼夫就說明這只是一個廢止克倫斯基政府特別用以處置逃兵的死刑的問題罷了。可是列寧並不因此而息怒。他很明白，這個法令並不指免絕我們所有的極大的困難的意思。

「那是個錯誤，」他重復說着，「一個不可否認的弱點。『和平主義者』的幻想……」他建議立即修改法令。我們告訴他，這樣會予人以一個異常不好的印象。最後有人說：「最好是在絕無其他辦法的時候，才採用槍決的刑罰。」這個問題就討論到這裏為止。

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派的機關報，從革命後最初幾天起，就形成一種豺狼及瘋狗似的

異口同聲的合唱『諾伏依·佛倫耶』報 (Novoe Vremya) 試敲『忠義的』調子，將它的尾巴下垂於腿間。

「我們不要養馴這羣走狗麼？」列寧遇有機會時老是這樣問。「看上帝面上，那是何等樣的狄克多制呀！」

各報紙上已特別採用了『竊取被竊者』等字眼，並且把它們牽強附會於格言、詩歌和成語裏。

「如今他們不會放鬆這一竊取被竊者」的字眼了。」列寧曾經用滑稽的失望的腔調說。

「這些字眼是誰創用的？」我問，「或者說是誰發明的？」

「不，我曾經確實這樣說過。」列寧答道，「我說過就忘了，而他們卻從它訂定了一種整個的計劃。」於是，他作了一種滑稽的手勢。

凡知道列寧的一切的每一個人，必清楚知道他最強的方面之一，就是把一件事物從外形上來分別它的實質的能力。可是對於他也異常重視外形這個事實，無論如何，是不相矛盾的。因為他心中明白形式的力量，因而把形式變成實質。從臨時政府傾覆那時起，列寧就像政府那樣執行一切大小事務。我們還沒有工具；不很和農村聯絡，各種雇員正在罷工；韋克喜爾將通莫斯科的電話線割斷了；我們既乏金錢，又無軍隊。可是列寧用政府的名義，發出法令、公告和命令，絕對地操縱一切自然，他比任何人從迷信的依附到

正式的誓言，移轉得遠些。他已認識得太清楚了，就是我們的權力是在民衆及彼得格勒區所組織的新政府機關裏的。可是要把來自上層，來自支離破碎的工作，與下層的產生工作聯絡起來的形式力量，這種景況，是必要的。一個政府的景況，今日僅是一個概念，但是明日或日後便成爲權力，因此，今日必須要有有權力的行動。這種形式主義對於訓練我們自己的同志，也是必要的。在騷亂的分子之上，在最先的無產階級集團的革命的演奏之上，已逐漸地織成了一個新政府機關的線網了。

在斯麥珉內，列寧的辦公室和我的辦公室是在屋子裏相對的兩端。使我們聯絡的，或者還是說使我們分隔的走廊，是很長的，以致列寧開玩笑地提議用一輛腳踏車來聯絡交通。我們用電話傳達消息，水兵們不斷地從列寧那裏帶着重要的通告跑着。在小的紙條上，寫着兩三句有意義的句子，每句都寫得正確明白，而在最重要的字眼下，復劃線至兩三次，最末，便是一個針對着所談之事的問題。每天總有好幾次，我經過這條無盡頭的蜂房似的走廊，到列寧的辦公室去。軍事問題便是談話的中心。外交部的事務，我已經完全讓給馬爾金和沙珉肯兩同志。我自己則專作煽動性的稿子，和接見少數的客人。

德國之進攻，引起了許多最困難的問題，我們實無解決的方法。我們也沒有一些些應怎樣尋求方法的意見，更不知應怎樣想出方法來。我起的草稿：『社會主義的祖國在危險中』，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討論過。因爲是國際主義的新加入者，這個呼籲的標題使後者感到驚駭。在另一方面，列寧對於這個標題

澈底贊同。『那立刻明示從我們的休止到保衛祖國的改變，已到了一百八十度。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這草稿最後幾點之一，即是凡給予敵人以幫助者，立即處以死刑的問題。被一陣怪風吹入革命，並且吹入人民委員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斯丹勃，對於這種嚴酷的威嚇提出反對，因為他認為這種辦法將會毀壞『呼籲的動情力。』

『恰恰相反，』對列寧高聲地說，『真正的革命的動情力，正就在這裏，你以為我們不用這種最嚴厲的革命的恐怖手段能成爲勝利者麼？』

那就是列寧一遇有機會就着重恐怖，係絕對必要的時期。一切感傷、怠惰、或冷淡的象徵——雖都是薄弱地表現出來的——並不使他激怒，只是另一種象徵，就是，甚至工人階級的領袖，也還沒有充分地估計到問題的極大的困難，因爲這些問題，也必須要用同樣的極大的力量，才能解決。

『他們，』列寧談及敵人時說，『正面對着失去一切的危險。而且，他們有幾十萬曾經戰場的飽食和堅決的人，準備作任何事的官員、旗手、資產階級地主的繼承者、警察和富農，還有許多臆測我們將以仁與愛來完成革命的「革命家」。——恕我這樣說法。是麼？他們在什麼地方受訓的呢？他們懂得什麼是狄克推多制麼？如果他是個弱者的話，狄克推多制將成爲怎麼樣兒呢？』

一天之內，我們總有許多次聽到他發揮這樣的激論，而且都是準對着那些在場均有『和平主義』

嫌疑的人而發的。當列寧在場聽到他們談到革命及狄克推多制的時候，特別是在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中談到的時候，或者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或有猶預的共產黨員在場的時候，他總不肯放過機會地這樣說：『我們在那裏有狄克推多制呢？請指給我看。我們所有的是混亂，並不是狄克推多制。』

他很愛用『混亂』這兩個字。『如果我們不準備槍決一個怠工者和白色兵的話，那是何等樣的大革命呢？』只要看資產階級的走狗在報紙上怎樣詆毀我們就夠了！那裏有狄克推多制呢？祇是空談與混亂罷了……』這些言論表現出他實際的感覺，但同時這些言論含有兩重的目的：按照他的方法，列寧強使他人了解『只有非常強烈的手段才能拯救革命』這一種意識。

新政府機關的弱點，在德國開始進攻的時候，表現得最爲明顯。『昨天我們還安坐在馬鞍上，』當列寧只和我在一起的時候這樣說，『而今日我們祇緊握着鬃毛。可是這也是個教訓。這個教訓對於我們的可惡的疎忽，決不致沒有影響的。如果我們不願做奴隸，我們就得發令，實際去攻擊我們的敵人！如果……如果僅是德國人與白色軍不能傾覆我們的話，那便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了。』

『噫，』列寧曾經非常出乎意料地問我，『如果白色軍把你我都殺害了，布哈林會與史佛爾特洛夫成立諒解麼？』

『或者他們不會殺害我們的。』我開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列寧說着，而且就笑了起來。這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在斯麥珉內的某一個房間裏，本黨幹部常舉行着會議，那是一切制度中之最混亂者。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誰調度一切，誰發號施令，怎樣才是適當。這裏第一次提出了大體的軍事專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和克拉斯諾夫交戰時已有了一些經驗，當時我們任命茂拉維埃夫團長爲司令，而他又指派韋珉登在普珉可夫前指揮作戰。四個水兵，與一個士兵，被遣派去保護茂拉維埃夫，並且訓令他們不可放棄他們的手槍。這便是委員制度的濫觴。這種經驗，多少也是形成最高軍事會議的基礎。

「對於獨斷的、有經驗的軍事要員，若無嚴格的對付辦法，我們就不能逃避這個混亂狀態。」我每次在幹部會議時對列寧說。

「那顯然是不錯的，但是他們一定要叛變的。」

「我們必須指派一個委員去監視每一個軍事要員。」

「你最好是派兩個人去監視每一個人，」列寧高聲說，「而且是要兩個得力的人。可是我們不能辦到，因爲我們沒有得力的共產主義者。」

這樣開始了最高軍事會議的組織。

把政府遷到莫斯科的問題，也引起不少糾紛。好像對於曾立下十月革命的基石的彼得格勒有放棄

之勢。工人們不會懂得其故。斯麥珥內已成爲蘇維埃政權的象徵，而現在他們建議來清理它了，等等。

列寧確實大爲激怒地來答覆這些異議：『你們能以那種感傷的愚鈍來掩飾革命的命運問題麼？如果德國只一次圍攻就佔據了彼得堡，把我們都圍困在內，革命就完了。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是在莫斯科，那末，彼得堡之陷落，祇是受到厲害的局部的打擊罷了。你們不見到這點，又不理解這點，那怎麼可以呢？況且，如果我們在現狀下仍留在彼得堡的話，我們就增加了它的軍事的危險。同時引起德國來佔領彼得堡。反之，如果政府是在莫斯科，就極少有佔領彼得堡的誘惑了。佔領一個革命的空城，如果這種佔領是不能決定革命與和平的命運的，那有多大的益處呢？說斯麥珥內有着象徵的意義，那種笨話作怎樣講呢？斯麥珥內只就是斯麥珥內，因爲我們住在那裏。倘我們住在克倫林，所有的象徵意義，就都會遷移到克倫林去了。』

最後，異議是被克服了。政府就遷到了莫斯科。我在彼得堡逗留了一些時光，我記得，是爲了擔任彼得堡革命委員會主席的緣故。我到了莫斯科，在克倫林，在所謂「騎士之翼」的那房子裏，會見了列寧。這裏『混亂』即騷擾紛雜，正不亞於斯麥珥內。列寧和藹地斥責爲優先權而戰的墨斯喀維德派，而且他一步緊一步地控制着他們。

革新的，不如說往往是各部獨立的政府，在法令上發展到一種狂熱的工作。人民委員會每次會議，初

時呈現出大規模的立法的即席之作的畫景。一切必須從頭做起，必須從底層榨取。我們不能供給『前例』，因為那是歷史上從來所沒有的。就是簡單的需要，因為時期的缺乏，也感到困難。在進行種種革命的考究上，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不可思議的混亂、紛雜。大小事件都非常顯著地混雜在一起，比較不很重要的實際的問題，都引到最複雜的原則的問題。一切法令，並不是——決不是——調和的，因而列寧對於我們所創制的法令之不一致，已不止一次地，甚至公開地，說過笑話了。可是這些矛盾，從當時的實際工作看來，雖然是異樣的；結果，在革命思想的工作中消失了。即藉着法制已給人類關係的新世界指出了許多新的途徑了。

我還得提及這整個的工作的指導是列寧的責任。他不倦地擔任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每次至五、六小時之久——這些會議在初期總是天天舉行的——一個問題挨着一個問題討論着。領導辯論，用他的錶仔細地分配發言人的時間。後來則用主席時計（或稱秒鐘）來限定時間了。

大概提出的問題，都未經預先準備的。而且，像已經述及的，都決不能延擱的。常常在開始辯論之前，問題的性質，非人民委員會的委員所知，即主席也不明白。可是所有的討論，老是簡潔明白的，介紹的報告只用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光，而主席依然引領會議入於正軌。如果到會的人數很多，如果參加的人中有什麼專家與特別不熟悉的人們，那末，列寧就用他一種得意的姿勢：他把他的右手像盾牌似的遮在他的前

額從他的指縫中望着報告者，而特別是會議中的委員們，藉着與「從指縫中望着」相反的方法，他很銳利地留神地凝視着。在一張狹小的紙條上，用極小的字寫着發言人的名單（多麼經濟呀！）常常用一隻眼睛注意那貼在桌上的時刻，來提醒發言人停止發言的時候。同時，這個主席（指列寧）很迅速地以決議的形式記下他認為辯論中特別重要的結論。通常，列寧為節省時間，又把簡短的備忘錄分送給委員們，在備忘錄中，他請他們供給一些情報。這些備忘錄，在蘇維埃立法的技術上，可以代表一種極浩瀚的，極有趣味的書翰的要素，但大部分已經毀掉，因為答語是寫在備忘錄的背面的緣故，主席（列寧）當時就審慎地把牠們毀掉了。在一定的時間，列寧朗誦決議的各要點，常是故意生硬的教育學的——藉以表示着重，使之顯著，免除任何修改；然後辯論或者結束，或者進入實際的動議與補充的具體的手續。因此，列寧的「要點」便是各個法令的基礎。

在其他必要的特性中，此種工作還需要一種堅強的、創造的想像力；驟視之下，這幾個字似乎是不能容許的，然而它們正確地表示了事件的精神。人類的想像力也有許多種：建築工程師之需要想像力，正如奔放的小說家的需要一樣。最可貴的想像力的種類之一，即對於人物、現象、描寫逼真的能力，即使你從未見到過。把整個的人生經驗與所有的理論，應用並聯繫於經歷中各個停留處，它們的推廣、紊亂，以及依照一定的類推公律的完成中，因而使整個的具體的人類生活的一定狀態，更為明顯。——這就是想像力，是

立法家、政府工作人員，及革命時的領袖所不可缺少的。極堪注意的，列寧的力量，就在於他的逼真的想像的力量。

列寧的目的之正確，常是具體的，——否則，就徒有虛名了。我記得在『火花』中，列寧初次發表這樣的思想，即在複雜的政治行動的鏈索中，吾人必須時常找出當時議論中的中心鏈環，藉以把握它，並且明示整個鏈索的方位。嗣後，列寧也時常回返到這種思想，甚至回返到同一的鏈索與圈環。這種方法，彷彿經過意識進入無意識，而終於變成第二種性質。在特殊危急的時機，在一個極有責任的或危險的戰術方位之改變問題的時候，列寧便把其他一切比較不很重要的可以延期的事情，攔在一邊。這決不是指他僅抓住了中心問題的重要點而忽略一切細情的意義。實則完全相反，他十分具體地看清他認為可以延擱的問題。抓住問題的各方面，研究它的細情，甚至時常注意到次要的事情，並且找出一個着手之點，以便重新應付，並力促其解決，——他追溯、解釋、着重、統制，以及鼓勵。可是這些都次於『鏈索的圈環』，因為他對於『鏈索的圈環』認為當時議論中的斷然的要點。他不僅把一切與中心問題直接地或間接地矛盾的，事情，攔在一邊，而且把一切足以奪去他的注意，減弱他的努力的事情，也攔在一邊。在特殊危急的時機，他同樣地對於一切與他所全神注意的問題無關的事情不聞不問。祇是在發生了其他的問題，所謂無可無不可的問題的時候，他覺得像如一種危險，就本能地縮回不談。

當順利地勝過了危急的一步時，列寧老是要請求其他的事項：『可是我們已全然忘記做某事某事了……當我們專心一志於主要問題的時候，我們已有着一個錯誤了……』他們常回答說：『可是這個問題早已提出了，而且恰恰作了這個建議，祇不過那時你不要知道其底蘊罷了。』

『是真的麼？』他會這樣回答的，『我一點也不記得了。』

於是他狡猾地，略『自覺地』笑着，並且用手從上而下地做了一種特別的動作——他的特性——似乎是表示這個意思：在同一時間，吾人不能決定一切事情。這個『缺點』只是他一切力量的最大的內心流動的能力之反面罷了，而這就是這種能力使他成爲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黨員。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寫關於和平的論文中說：『對於社會主義的成功，至少幾個月的一個時期是必要的。』

如今覺得這句話是十分不能令人理解的。不是一個錯誤麼？不是指數年或數十年的意思麼？可是，這並不是錯誤；吾人大概可以找到許多其他同性質的列寧的文章。我很清楚地記得，在初期，在斯麥耳內人民委員會會議中，列寧一再地說，在半年內，社會主義就能統治。而我們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而且不僅僅是他們，都彼此抬頭疑問和驚訝，但是默然無言，這便是他的教導法從此以後，列寧要訓練每一個人去考慮一切處置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問題，並不是着眼在『目標』的前途，而

是注意於今日和明日的問題。

在這種形勢的激烈轉變中，他抓住了他那種非常特異的方法，力言其最後之手段；昨天我們說社會主義是目標；可是今日乃是如何思維，如何講論，如何行動，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在數月中可以統治之問題。那也只是指這不過是個教育學上的方法的意思麼？並非僅是那個意思。在教育學的能力以外，還得加上一些東西：列寧的壯健的理想，他的堅強的意志，在兩個時代的突然轉變中，縮短了停留處，並且使確定的目標更爲接近。他相信他所說的。而這種想像中的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的延期半年，正表示列寧的精神的機能，像他實際地把握今日的一切事工一樣。人類發展的強大的可能性的深刻而堅定之確信常是列寧的心理組織的主源；對於此種確信，吾人能夠，而且必須，付任何犧牲與痛苦的代價。

在最困難的情境之下，在最煩累的日常工作中，在委員的和其他可能的麻煩中，被資產階級戰爭圍困着，列寧極審慎地擬訂蘇維埃的憲法，小心翼翼地使政府機關最小的實際需要，與無產階級在農民社會獨裁的原則問題相調和。

憲法委員會因某種理由，決定修改列寧的『生產階級權利宣言』使之與憲法的主文相吻合。當我從前線回抵莫斯科的時候，我在憲法委員會送來的文件中，接到修改過的『宣言』大綱，或者說，至少有一部分是經修改過的。我在列寧的辦公室裏，曾經親見過這個宣言稿，在那裏，只有他和史佛爾特洛夫。他

們正在作蘇維埃會議的準備工作。

「可是爲什麼要把宣言修改呢？」我問憲法委員會委員長史佛爾特洛夫。

列寧很感興趣地抬着頭。

「嗯，因爲憲法委員會剛才發覺到這個「宣言」中有着與憲法衝突之點，以及不確當的措詞。」傑珂夫·密凱珥洛夫契答覆着。

「照我的意見，那是胡鬧，」我答道，「這個宣言既經通過，而且已成爲歷史上的文件了。——把它修改是什麼意見呢？」

「那是很不錯的，」列寧接着說，「我也以爲他們過慮這個問題是完全非必要的。讓青年長髮披亂地過活罷；任憑他如何，他仍是個革命的子孫呀……他差不多不會好些，如果你把他送到理髮匠那裏去的話。」

史佛爾特洛夫想「盡本分地」維持他所主持的憲法委員會的決意，可是不久他就同意於我們了。我認清，列寧已有多次反對過憲法委員會的主張，顯然地，他不願對於他所手訂的『生產階級權利宣言』的修訂而有所抗爭。雖然如此，他樂意於一個在最後關頭才出現的『第三者』的擁護。我們三人決定不修改這個『宣言』，而這個青年（指列寧）就沒有去打擾理髮匠。

研究蘇維埃立法的發展，使其主要的動機和轉向點，關於革命本身的路線，顯著出來，確為一種極重要的工作，因為這對於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影響，能，而且一定有，最大的實際的重要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說，收集蘇維埃的法令，對於列寧全集，並不是一部分不重要的工作。

捷克·斯拉伐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

一九一八年的前期重重地壓迫着我們。在那時，吾人都有着一切盡是失誤與急就的感覺，沒有緊緊地把握着一切，也沒有自己支持着一切。在一方面，沒有十月革命，國家早就腐敗了，那是很明顯的。可是在他方面，在一九一八年之春，有人不自覺地問及這個問題：這個涸竭的、動搖的、絕望的國家的生命力，是否可以延續到新政府統治的時候？手頭沒有糧食，又沒有軍隊，政府機關正在構成中。反動的陰謀正在各處蔓延着。捷克·斯拉伐克軍隊，像一種自主的權力，駐紮在我們境內。我們幾乎一點也不能與他們對抗。

在一九一八年的特別困難的時候，列寧曾對我說：『今天有一批工人代表來看我。（不幸得很，我不記得他們來看列寧的原故——原著者）因着我所說的話，他們中間有一個說，「列寧同志，我們覺得你也是站在資本家方面的。」你知道，我聽到這樣的話，這是第一次。我承認我呆住了，而不知道怎樣答覆。如果那不是含有惡意的，不是門雪維克的話，那末，便是不安穩的徵兆了。』

當列寧談到這事的時候，他的煩惱與驚恐之態，甚於日後聽到從前方傳來的卡什安陷落，或立即進逼彼得堡的消息的時候。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卡什安及彼得堡，我們可以失陷，我們也能收復。可是工人的信任，確是本黨的基本要素。

『我有這樣的感覺，』於是我對列寧說，『我們的國家已經過了非常嚴重的疾病時期，現在就需要較好的滋養、休息和看護，藉以生存而至於復元；現在即使是輕輕的一擊，就能把它打倒的。』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列寧答道，『一種可怕的貧血症呀！現在再受到任何打擊都是危險的。』

雖然如此，歷史脅迫着捷克·斯拉伐克派來作這危險的一擊。捷克·斯拉伐克的軍隊無阻撓地直入混亂的俄國東南部，與社會革命黨員及其他較白色的英雄聯合一起。雖然布爾雪維克在各處都已握有政權，但是國內的機構，依然很是鬆弛。那是不足奇的。實際上，十月革命僅僅完成於彼得堡及莫斯科。在大多數的省城裏，十月革命以及二月革命只是藉電報來完成的。電報時來時去，因為在京城裏已經這樣盛行了。弛緩的社會環境，過去的政治者方面之缺乏抵抗力，在革命的一方面說，其結果也必成爲一個不很堅實的團體。捷克·斯拉伐克的軍隊之侵入，變更了形勢，起初是反對我們，可是最後卻贊助我們了。白軍已護得軍事的結晶體，爲欲與其精神一致之故，就開始使紅軍切實地革命地結晶化。吾人可以說伏爾加區域之完成十月革命，只是在捷克·斯拉伐克軍出現以後的事。可是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在七月三日列寧把我喊到軍事委員會去。

『你知道已發生了什麼事麼？』他低聲地問。在他那是表示興奮的意思。

『不，什麼事情呢？』

『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已向密爾白克擲了一個炸彈。據說他受傷頗重。請到克倫林來，我們得討論一下。』

幾分鐘後，我就在列寧的辦公室裏了。他把主要的情形告訴了我，並且時時用電話打聽新消息。

『確乎是動聽的故事，』我說，並且熟想着這種不能視為尋常的消息，『我們不能不滿意於一種單調的生活。』

『哈，』列寧不安地笑着，『那是資產階級的慣常的畸形的放逸……』——他諷刺地用『放逸』這兩個字——那正像恩格斯描寫為『狂放的小資產階級』的姿態。

還有，匆急地用電話談話，與人民外交委員會，全俄非常委員會，以及其他各種機關的扼要的發問與答覆。在緊急關頭，列寧老是同時做着兩面的工作。以馬克斯主義者而論，他充實了他的歷史上的經驗，並且感到興趣地估計這種新示威運動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激烈主義的『放逸』的價值，然而同時以革命領袖而論，他不倦地展長消息的線索，統制實際的步驟。報載全俄非常委員會的軍隊，發生兵變的消息。

『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彷彿是櫻核，我們竟注定要滑跌似的……』

『我正已想到這點，』列寧答道，『動搖的資產階級的命運就在這點上；他們像櫻核來幫助白色衛戍軍……如今在任何代價下，我們必須轉移德國軍隊給柏林的報告的性質。武力干涉的動機是十分足

夠了，特別當你想及密爾白克會繼續報告，說我們是軟弱無力，只要一擊就夠了……」不久以後，史佛爾特洛夫進來了，他像平日一樣的態度。

『如今，』當他笑着向我問候的時候他說，『如今，我們必須再把人民委員會改爲革命委員會。』其時列寧又接到許多消息。我不記得，是此時還是日後，得着密爾白克逝世的消息。我們應到大使館去，表示我們的『哀悼之忱。』我記得，決定派列寧、史佛爾特洛夫和乞德契林（註）前去。問題是我是否也應同往，匆匆地討論了一下以後，我終於得免此行。

（註）乞德契林（G. Tchitcherin）係俄國名學者。出身貴族，任蘇維埃人民外交委員長。精敏絕倫，守法奉公，凡冗繁事務，皆親自處理之。

『到那邊我們該說什麼話呢？』列寧搖着頭說，『我曾與拉狄克談過這點。我想說「哀悼」，可是我必得說「弔唁」』（註）』

（註）『哀悼』和『弔唁』兩字原係德語 Mitleid 和 Beileid 兩字。

他微笑着穿上外衣，並且毅然地對史佛爾特洛夫說：『我們去吧。』他的臉色變成石樣的灰白。乘車到霍亨查勒使館，向密爾白克伯爵之逝世致弔唁之詞，對於列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照一種內心的經驗看來，也許是他一生最感棘手的事件之一吧。

在這樣時機，吾人可以學習認識人。史佛爾特洛夫確乎是無匹的——信實的、勇敢的、堅決的、謹覺的——布爾雪維克的最好的典型人物。在這些困難的時日中，列寧習知了史佛爾特洛夫，因而很看重他。列寧時常把史佛爾特洛夫請來，向他建議這個或那個迅速的辦法，而得到的答覆大都是：「早已辦了！」意見是說，列寧所建議的辦法，早已被注意到了。我們對於這句話，時常開玩笑地說：「史佛爾特洛夫也許又思說『早已辦了！』」

「起初我們反對他加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曾對我這樣說過，「我們能多麼不正確地評斷一個人呀！關於這點，我們曾爭論過多次；可是在大會中，我們從下層得到了糾正，以致結果全對了。」

左派社會革命黨員之轉移，使我們失去了許多政治同志和同盟者，可是結果並沒有削弱我們的勢力，反而加強了我們的力量。本黨更堅固地團結一致。在各機關和軍隊中，共產主義集團的勢力增強了，政府的政策愈形穩定了。

無疑地，捷克·斯拉伐克派之轉移，也有助於這點，因為這事使本黨從簽訂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約那時起所有的不振的情態中促醒過來。本黨向東線動員的時期開始了。列寧和我遣散了，仍然屬於左派社會革命黨員的第一軍。這裏已堪注意到將來「政治分部」的組織，雖然多少是不明確的，其時從伏爾加傳來的消息更是不利。茂拉維也夫之叛變及左派社會革命黨員之轉移，致使當時東線又陷於混

亂狀態，突然間危險加甚了。可是那時因此而實現了一種激烈的變化。

「我們必須動員各人各物，把他們送到前線去，」列寧說，「我們必須從「幕」後選拔一切能作戰的軍隊，急速把他們調到伏爾加。」

我記得，那些抵抗西部被德國佔領區域的軍隊，築有堡壘。此種堡壘外濠的壁頂冠石，我們習常稱爲「幕。」

「德國將怎樣呢？」有人問列寧道。

「德軍不會移動的，他們有其他事情要幹，並且他們自鳴得意地以爲我們將與捷克·斯拉伐克派同歸於盡哩。」

這個計劃是被採用了，並且把原料供給未來的第五軍。於是我赴伏爾加之行，也決定了。我忙於接洽一輛火車，因爲在那時，這並不是簡單的事。列寧對於一切，都表示同意，常寫簡短的字條給我，並且不斷地打電話給我。

「你有一輛堅固的汽車麼？在克倫林汽車間裏揀一輛吧。」

半小時以後，他又說，「你帶着一位航空員麼？無論如何，你得帶一位航空員的。」

「軍隊中有許多航空人員哩，」我答道，「在必需的時候，我會用他們的。」

再過了半小時，他說：『可是我的意思是：你乘火車時，必須要有一位航空員的。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呀。』等等。

雜色的、湊集的部隊，大都是舊軍隊中失散的兵士所組成的。他們在初次與捷克·斯拉伐克軍隊交鋒的時候，就非常慘悲地逃散了。

『要防止缺乏抵抗力的危險，我們絕對需要共產主義者的強有力的突擊部隊，尤其是適於作戰的人，』我出發赴東線之前對列寧說，『我們必須強迫他們作戰。如果我們等到農民醒悟過來的時候，也許是太遲了。』

『自然哩，那是不錯的。』他答着，『我只怕，即使那些突擊部隊，也不會表現必要的堅決的意志。俄國人大都是慈悲心腸的。革命的斷然的恐怖手段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的。可是我們必須試一試。』

狙擊列寧和暗殺猶利茨基的消息傳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在斯韋耶斯契斯克。在這些悲慘的時日中，革命遭受了一種內在的變化。其『溫厚』被毀滅了。鋼般的黨，受到了它的最後的鍛鍊。堅決和——在必要時——殘忍由此而生了。在前線，政治部與突擊隊及裁判所聯合地努力於發展青年軍的勢力。

變化是突然地明顯了。我們奪回了卡什安及辛皮爾斯克。在卡什安，我從傷已痊癒的列寧那裏，接到了關於第一次在伏爾加勝利的急報。

不久以後，當我到了莫斯科，我就和史佛爾特洛夫到高爾基（註）那裏去訪問列寧。其時列寧已很快地康復了。但還沒有回莫斯科去工作。我們覺得他的精神很好，他立刻問及軍隊的組織情景，共產主義者的重任，以及加緊訓練等事。而且快樂地一再說着：『是的，那是好的，那是很好的。軍隊之堅決，立刻可以明示有效於整個國家之加緊訓練與增重責任……』

（註）高爾基（Gorki）係俄國文學家，名聞於世。初爲人道主義者，嗣加入俄國共產黨，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最後在黨的指導之下，專心致力於革命文學的寫作。

到秋季，大革命果真發生了，在春季所表現的那種蒼白無力，不復留着痕迹了。已有某種東西來代替了，且已長得較強了。可以注意的是：那時並不是呼吸的新的中止挽救了革命，可是，恰恰相反，卻是一種新的劇烈的危險放出了潛伏在無產階級裏的革命力的波濤。

當我和史佛爾特洛夫登上汽車的時候，列寧安靜地快樂地站在露臺上。我記得，見到他像這樣安靜的態度，只有在十月二十五日那天，當他在斯麥珥內聽到了第一次關於暴動的軍事消息的時候。

對於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我們已政略上地把他們清理了。伏爾加已變爲晴朗了。列寧的傷口已痊復了；人們的革命精神也增強了。

列寧在講臺上

十月革命以後，攝影者和活動電影攝製者屢次替列寧攝影。他的聲音也留在留聲機的唱片上了。他的演講被記錄，被印刷出來了。因此，列寧所有的成分都現存於世了。可是祇是他的成分罷了。其生動的人格，則存在於這些成分的不可比擬的以及不斷的動力的結合之中。

當我心中試以新的眼耳來視聽在講臺上的列寧的時候，正像我第一次所感到的印象一般，我看見一個強壯和藹的中等身材的形貌，聽到一種流利的、急速的、與連續的聲音——非常驚人，幾乎是沒有間斷的——而且開始時沒有特別加重的語勢。

開頭所講的幾句話常是普通的，語調是一種試驗性的，整個的體態還沒有得到它的平衡，姿勢也都是一些不完整的，注視是向着裏面的；臉色陰沉，甚至有些窘狀。他的心是在探索引起聽衆注意的詞句。這引入式的時間之久暫，依聽衆、題目及演講者（指列寧）的心境而定。可是突然間，他講到中心的意義。題目是明顯了。這個演講者彎曲了他身體的上部，並把他的中指緊插在背心的邊裏。因着這兩種動作，他的頭和手就向前突出了。就他的短小而壯健的身體而論，他的頭部並不覺得怎樣大，可說是相稱而合度的。可是他的眉毛和光露的拱形的前額，則動人而有力。他的手臂非常活動，但並沒有太過的和神經的表示。手

闊大，指短，『平民』一般有力。有着與整個體態同樣的自持的男性溫厚的特點。吾人見到，當這個演講者因發覺一個敵對的策略，或對他已順利設下了一種圈套而激怒的時候，演講得最好。於是列寧的雙眼從深凹的眼眶裏向前凝視，正像在一九一九年所攝的一張優美的照片上有意味地表現着的那種神氣。即使是一個無關係的聽講者，當他看到這種臉相，等着要看將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也是受驚嚇的。在這種緊張的思想集中的當兒，他的雙頰發紅而溫和，骨子裏你卻可以探出他對於人們關係和情勢的銳敏的知識。長着紅灰色鬍鬚的臉的下部，幾乎是隱覆着的。聲音失去了它的硬性，變成柔和，而且多次是狡獪地暗指什麼的。

可是此後，這個演講者就介紹一種反對者的或有的異論，或是一句敵人論文中的惡意的引句。在他發表敵對的意見以前，他先說明異論之無根據、膚淺，或荒謬。他將他的手指移開背心，把身子緩緩地向後伸直，並向後退走幾步，彷彿作攻擊準備，半諷刺地、半假裝失望地聳着他那壯健的肩膀，又把雙手連手指廣闊地伸展。他的反對者的指斥、嘲笑或狠狠，按反對者與事件的情形——老是先於他的論駁，彷彿聽講者預先知道所意料的什麼證據，和他的心理狀態將用什麼語調似的。然後開始他的邏輯的攻擊。左手或重新插入背心裏，或時常插在袴袋裏。右手則隨着他的思想的邏輯而移動，且與之調和。必要時，左手也助着作勢。這個演講者向聽衆傾斜着，走到講臺的邊上，向前彎着身子，隨着圓熟的姿勢，用勁地傾吐着他自

己的詞句，意思就是說他已講到了中心的思想——全篇演講的主要點了。

如果在聽衆中有着反對者的話，就時時發出批評的敵意的呼喊。十之八九，都是置諸不理的。這個演講者說着他所認爲必要的話，他向那些對於他所說的是必要的人演說，而且說到這點，正因爲他認爲這是必要的。他不願被臨時的反駁，來打斷他的演講。匆急作戰不適用於他的集中注意。在敵人的反駁以後，他的聲音就變爲更硬了，他的演講更簡潔動聽，他那連續的思想更銳敏，他的手勢更粗猛了。他只注意於一種應合他一般的思想的進程，與有助於他更迅速地作必要的結論的敵對的呼聲。可是他那時的答覆，簡單非常；往往是十分出乎意料的。正是人們會期望過他掩飾之點，他無情地把它洩露了出來。在革命初期，對於危害德謨克拉西的告發，正極盛一時的時候，門雪維克已不止一次地有過這種經驗了。

『我們的報紙被查禁了。』

『自然！可是不幸地還未曾全被查禁。不久，完全要被查禁了。』（猛烈的喝采）『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對於這種可恥的資產階級的販賣鴉片，將澈底地禁絕。』（猛烈喝采）

這個演講者趾高氣揚地，把雙手插在他的衣袋裏。這裏並沒有一點外觀的痕迹，聲音沒有修辭上的變調的表示，整個的體態，即他的頭部連同緊閉着的上下脣，額骨的姿態，以及他那略微沙啞的聲音，表示出對於他的公正忠實之堅決的自信。『如果你們要同盟罷工的話，好，我們願負責管理這事。』

當這個演講者攻擊他自己的同志中的某人而不是一個敵人的時候，吾人在他的舉動和語調上可以看得出來。即使最猛烈的攻擊，大概祇要使人『服理』罷了。他的聲音時常在一種高銳的語調時改變；這種情形之發生，每在——因他的熱忱——他說服他的一個自己的同志，使他發怔並且證明到這個問題的反對者不會用過思想。對於他的異論的理由毫無價值的時候。當發揮這些抗辯的時候，他的聲音有時達於假聲，乃突然中止；因此之故，就是最忿怒的冗長演講，也裝出一種溫和的態度。

這個演講者把他的整串的思想，直思索到盡頭，到最後的實際的歸結，可是祇是整串的思想，而不是表演和形式。惟大部分特別簡短的、適合的、有力的用語，以及那時成爲黨國政治生活的『不合文法的政變』的習語，則不在此例。措辭法大概是不柔韌的，一句進一句地，或一句一句地倒裝着、連接着。這樣一種結構，對於速記者及以後的編輯者，實爲一種難忍的痛苦；可是強有力的思想，卻從這些不柔韌的句子裏強行通過了。

可是這個演講者真是一個廣受訓練的馬克斯主義者，一個行政的理論家，及一個學識淵博的偉人麼？不像——至少有些時候彷彿一個非常的獨裁者在演講——一個用他自己的思想已達到了一切的歸結，用他自己的腦筋，自己的方法，而沒有科學的工具，沒有科學的術語，已第一次創造出一切，及現在用他自己的方法表現出來的人麼？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爲這個演講者不僅爲自己，而且爲大衆；已把他的思

想考慮過了，已把他整串的思想在經驗中濾清過了；使得他的陳述，在他第一次接觸一個問題的時候，受他自己曾經用過的所有的理論的工具之束縛。

尤其進者，這個演講者時時把他的思想之梯太急地舉高，而且立即跳過兩三步，常是這種情形；如果他覺得結論已非常明顯，而且實際已近了，同時他要盡可能快地把他的聽衆引到這個結論的話。可是他立即發覺到聽衆不注意他，與聽衆的聯絡已中斷了，於是他立刻抑制着自己，向下一跳，再重新上來，但是用一種寧靜而較緩和的步態。就是他的聲音，也是不同了。免除一切過甚的用勁，是故用一種強使服理的力量。他的演講的結構，當然受到這種向後一跳的影響。可是演講是爲它的結構而作的麼？一篇強使行動的演講還有其他有價值的邏輯麼？

而且當這個演講者已有二次講到了他的結論，而且沒有例外地吸住着他的聽衆的時候，吾人可以發覺到在會場裏因集合的思想之滿意的努力而生的感激的愉快之情。其時祇須把結論兩三次釘住，使之牢固，並且給予一個簡單明晰如畫的說明，使之更易於印入腦中，然後你才能給你自己及其他人們一個呼吸的時間，才能玩笑。因此，在這個時候，集合的思想，更能吸取其新獲得物了。

列寧的演講的幽默，正像他的其他創作一樣簡單，如果這裏你真能說及創作的話。在列寧的演講裏，並沒有自己滿意的故作的談諧，也沒有雙關戲語。可是大衆易曉的有力的笑話，按字的真義說，則博得好

評。如果政治形勢不是過於驚人的，如果大多數的聽衆是『他自己的』，那末，他就願多講笑話。聽衆感激地聽聆聰明的、質朴的、滑稽的言語，一種溫厚的、無情的特性，因為似乎這裏不僅是一個好字句的問題，而且背後還有什麼東西隱伏着似的，並且都用以達到同一的目標。

當這個演講者說笑話的時候，他那臉的下部更有力地突出，尤其是能引入發笑的嘴巴。他那前額的縐紋較爲輕淺，雙眼也不復閃爍了，只是愉快地放着光。他那無忌憚的心胸是得到了快樂與友情的慰藉了。

列寧的講詞中的主要特色，像在他的全部著述裏一樣，是目標的明顯，他並不造成他的講詞，只是引領講詞，達於確定的實體的結論。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接近他的聽衆：他說明理由，使人信服，使人發怔，戲講笑話，再說服，與再解釋，使他的講詞團結一致的，不是一種拘泥的方式，而是今日形成的一種明顯的目標；好像一根木刺，刺入他的聽衆的意識裏。他的幽默，也次於這點。他的笑謔，是功利主義的。一句激烈的習語有着它的實際的重要意義：有些人它煽動，其他的它拘束。因此產生了許多適當的字語，久爲國家的共有的財產（註）雖然如此，在這個演講者應用這種習語之前，他必先描寫一些曲折的線索，藉以恰恰找到那正確的論點。當他已找到了的時候，他就使用他的釘子，用他的眼睛來估量，用他的鎚子在釘頭上猛烈地一擊，一次，兩次，十次直到把釘子釘緊，以致很難於把釘子拔出，如果釘子是不復需要的話。於是列寧

再用詼諧的言語從左右鈍擊那釘子，使之鬆出，直到他已把它拔出，投於保藏所的舊鐵器之中——使所有慣用那釘子的人們，發生無限之感歎。

(註)托羅茨基在這裏引用了許多列寧所造的幾不能翻譯的字。如：Pereyichka 一字，意思就是呼吸中止，指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原因；Smytchka 一字，意思就是國家與土地聯絡；Kombichvanivo 一字，意思就是個別的共產主義者的驕矜等等——英譯者。

然後演講迫近了它的結尾，個別的論點都確立了，結論也堅穩地作成了。這個演講者便像一個精力盡的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的工人一般。他時時用他的手揩摸他那淌着汗珠的禿頭。他的聲音像營火將滅似地已低沉了。他快要結束了，可是你要期待一個上昇的終結來完成這篇演講，而沒有這種終結，表面上，就不能離開講臺的那種情形，那必使你徒勞無益。他人都不能那樣，惟列寧能之。並沒有修辭上的使他結束的東西：他完成了工作，立下了論點。『如果我們明白這層，如果我們這樣做，那麼，我們必定會勝利；』並不是一種不尋常的結論。或者，『吾人必須爲那事而奮鬥，不尚空談，祇重實行。』或者時常更簡單地說：『這便是我要對你們說的一切話，』不再說其他的話了。這種結論，完全與列寧的口才的本質以及列寧自己的本性相符合，決不是用以緩和他的聽衆的。反之，就在這樣一種『沒有結果』、『暗淡的』結論以後，聽衆又抓住了——好像帶着道意識的火焰似的——列寧在他的演講中已給與他們的一切。於是聽

衆暴風雨似地突然說出了感激的熱烈的讚語。

可是列寧早已收集了他的演講稿，很快地離開了講臺，以逃避不可避免的糾纏。他的頭縮在兩肩之間，他的下頷下垂，他的雙眼被雙眉所隱蔽着，他的鬍鬚，在煩惱地繃縮着的上唇上忿怒地直豎着。轟然的鼓掌聲起來了，一陣一陣地喊着……『列寧……領袖……伊里基……萬歲。』於是在電燈的照耀中，這個無比的領袖突出地站着，週圍被巨大的熱情的呼聲包圍着。當騷亂似乎已達於最高點的時候，突然間，經過混亂、喧囂和鼓掌。像暴風雨中的號笛聲，一種青年的緊張而熱情的呼聲喊了出來：『伊里基萬歲！』而從最深的休戚相關的愛心與熱情的戰慄的深淵中，發出普遍的呼喊，使各拱門轟鳴着：『列寧萬歲！』

庸俗之人與革命黨員

在獻給列寧的一本書中，我看到一篇英國作家韋爾士 (H. G. Wells) 所寫的文章，題目爲「克倫林的幻想者」。有一段編輯者會這樣說：「就是像韋爾士這樣前進的人，也還未曾懂得正在俄國演進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有人難免要想：這並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把韋爾士的文章收集在一本獻給革命領袖的書冊裏。可是這不是值得批評的；至少我個人會把韋爾士的文章讀過幾頁，未嘗不感到興趣，因爲按其下文，很顯然地，作者確乎是坦白直率的。

韋爾士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歷歷如在我的眼前。那時正是一九二〇年到二一年的飢寒交迫的冬天。在這春天行將帶來的困難的氛圍氣中，有着一種不安的前兆。飢餓的莫斯科深深地埋在積雪之中。我們的政策正在劇變的前夜。我很清楚地記得列寧與韋爾士談話後所得的印象。

「他是一個多麼平凡之人呀！他是一個俗物呀！」他重覆地說着，把雙手高舉在桌上，笑着又嘆着氣，正像他因別人而感到一種內心的恥辱時所表現的特有的表情。

「呀，一個多麼庸俗之人，」他重新開始他的談話。我們的談話舉行於政治部會議以前，而且是主要地祇談及韋爾士的這種重述着的簡短的特性的表徵，可是那已很夠了。我承認我已略略讀過韋爾士的

著作，而從未見過他本人。可是這個特地來到這裏觀察共產主義者的試驗的英國貴賓，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註）作幻想的烏托邦的論文的美文學家，——我能很清晰地描寫出他的形像。而列寧的驚嘆，尤其是他的腔調，供給了我其餘之物。

（註）費邊主義者（Fabian）即係費邊社（Fabian Society）社員。按該社爲一八八三年錫德尼·衛勃（Sidney Webb）蕭伯訥（Bernard Shaw）等所創立之社會主義思想之團體。

不負責地收集在這部列寧的書裏的韋爾士的文章，不僅曾使我憶起了列寧的驚嘆，而且曾使之充滿了生動的意義。因爲如果在韋爾士的文章中殆無一點列寧的證跡的話，那麼，韋爾士本人，正如他之所以爲他，已是含容在其中了。

我們且先把韋爾士介紹自己時的怨言來談一談吧；請你只要把這點想一下，他必須奔走很久，才得與列寧會面，那是使他（韋爾士）非常地激怒的。列寧曾邀請過韋爾士麼？列寧曾約定接見他麼？列寧有一刻餘暇的時間麼？反之，在那些艱苦困難的時日中，他每一刻時光都是很忙的；要得到一刻空間的時光來接見韋爾士，怕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一個外國人，也不難於明白這點的。可是整個的困難，乃是在韋爾士，以一個有教養的外國人，和——因他所有的『社會主義』——一個傳統的帝國主義型的保守的英國人，完全充滿着這樣一種思想，就是說，他的訪問正是他給予這個野蠻的國度及其統治者以極大的榮

譽。韋爾士的文章，從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發散出這種不正當的傲慢的氣息。

像我們所能意料得到的，對於列寧的特性之描寫，是用顯露的筆法開頭的。請想到這點，列寧「並不是一個文人。」事實上，如果不是專門的文人，誰能決定這個問題呢？韋爾士「出現於莫斯科的有着他的（列寧）簽名的短小而怪樣的冊子，充滿着關於歐西工人的心理之謬誤的意見……對於實際的列寧的思想的特徵，且略作一些說明。」這個高貴的紳士當然不知道列寧曾寫過許多關於土地均分問題，關於理論的經濟學、社會學及哲學的偉大而基本的書冊。韋爾士只知道「短小而怪樣的冊子，」而且就在這裏，他說「它們祇有列寧的簽名罷了，」意思就是說，他暗示着那是別人所寫的。於是實際的「列寧的思想的特徵」就現出來了，並不是在他所寫的無數卷的書中現出來的，卻是在那位來自大不列顛的異常開明的貴賓允予參加的那一小時的談話中現出來的。

從韋爾士那裏，你至少可以期望一種有趣味的關於列寧的外觀的印象的描寫，而因為有一點觀察得很不錯的特點的緣故，我們已準備寬恕他一切費邊派的荒謬的言語。可是在這篇文章裏，一些也沒有述及。「列寧有着一副悅人的、淺黑的、常作不同的表情的面目，和一種生動的笑……列寧並不怎樣像他的照像。」「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略作一點手勢。」在這種平凡的描寫上，韋爾士並不與資本家的報紙的助理訪員有所不同。又，他發覺列寧的前額使他想起阿什爾·巴耳孚爾（註）的長形的、頗不相稱的頭。

總之，列寧是一個『小人兒』；『當他坐在他的椅子邊緣上的時候，他的腳幾乎碰不着地。』

(註) 阿什爾·巴耳孚爾 (Arthur Balfour) 係英國政治家與論文家。

就阿什爾·巴耳孚爾的頭而論，我們沒有什麼要說到這個有價值的東西，而樂於相信這個頭是長形的。可是在其他一切上，那是多麼不正確呀！列寧是淺褐中略帶紅色的，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淺黑色的。他是中等身材，或許略微矮一點；可是他給予一個『小人兒』和兩腳幾乎碰不着地的印象，那只能說是韋爾士個人的意見，因為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文明的加利佛人 (Gulliver) 來到了北部共產主義的利利泊人 (Lilliputians) 的國土。

韋爾士又述及，當談話中止的時候，列寧有着用手掩住眼睛的習慣，『或許那是由於他的視力有些毛病的緣故吧，』這位天才的文人說。我們知道這些姿勢，很明顯地，當列寧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在一塊的時候，他才有這種姿勢；用他的手像盾牌似的遮在他的前額，他很快地從指縫中望着來客。所謂列寧的視力的『毛病』就是他那樣細看他的訪客，察出他的誇大的自滿，他的偏狹，他的文明的傲慢，以及他的文明的無識，而當他已攝取了這個形象的時候，就長搖着他的頭說：『多麼庸俗之人呀！一個多麼畸形的渺小的平凡之人呀！』

勞士斯坦同志也出席這次會議的，而韋爾士順序地發現到他的出席，乃是『俄國國事現狀之特徵。』

勞士斯坦因依照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命令，因為他那絕對的、直率的和他的狂氣的厚顏控制了列寧對於這種無價值的觀察，吾人能說什麼呢？當韋爾士進入克倫林的時候，他意識中帶着完全模糊的國際資產階級的知識，在列寧的辦公室裏，用他的銳利的眼光——那當然是沒有「毛病」的——看出他預先在「泰晤士」報或從其他尊貴的矜持的閒談資料中所探索的東西。

可是這種談話實在是什麼東西所組成的呢？關於這點，我們從韋爾士那裏得到十分失望的陳腐之談，可以證明列寧的思想，對於另一個我們在他方面毫無理由去懷疑其均稱的頭腦的反映，是多麼的弱多麼的壞。

韋爾士光臨到這裏，自信「他要和一個信服馬克斯主義者的理論家辯論，可是實際的情形並不是那樣。」那並不使我們驚訝。我們早已知道列寧的思想的「真」並不現示在他那三十多年政治的和文學的活動裏，而是表現於他與英國的庸俗之人的談話中。

「我曾聽說，」韋爾士繼續說，「列寧好忠告他人，可是他並不會忠告我。」其實，吾人怎能忠告一個充滿着這種自我意識的紳士呢？而況所謂「列寧好忠告他人」這句話又不是真確的。確實，列寧懂得，怎樣說深含教訓的意味的話。可是他祇在他以為他的談話朋友已準備要學知什麼的時候，才那樣說。在這種場合，他既不空費時光，又不徒勞心力。可是當這位高貴的加利佛光臨到這個「小人兒」的辦公室的

時候，列寧在兩、三分鐘以後，必定會發生一種堅決的自信，有些像在但丁的地獄（Dante's hell）入口處的題辭：『一切絕望了！』

談話轉到了大城市的問題。韋爾士初次在俄國的時候已這樣決定——像他所聲稱的——即一個城市的外觀，以商店和市場的營業爲定。他和他的談話朋友同有這種見地。列寧『補充說』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一個城市，其範圍將縮得相當地小；韋爾士對列寧『指稱』城市之革新乃是一種巨大的事工，許多彼得堡的高大的建築物，將僅留歷史的紀念碑那樣的意義。列寧也同意於韋爾士的這種不可比擬的陳腐之談。『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後者接着說，『就是他樂於和一個懂得被他的許多青年同志所遺忘的集產主義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的人談話。』那便是量度韋爾士的 Niveau 的最好的器計。他熟思這種發現，即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許多人口集中的大城，將會消滅；許多現今的資本家的建築物，將僅留歷史的紀念碑這樣的意義。那是他異常透察的一種成績。可憐的共產主義者（『無聊的階級鬭爭的盲信者』韋爾士這樣形容他們）怎能作這種發現呢？而況這種發現，早已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舊計劃中，用通俗的註解給釋明了，更不必提及古典的烏托邦派早已知道這點了。

我希望現在都會明白，爲什麼韋爾士在他的談話的過程中，『不特別注意』那種他常聽到的列寧的笑。列寧並不是有意要笑。甚至我怕他口中所發出的，是和笑聲完全不同的一種的聲音。可是他那柔軟

的、靈巧的手幫了他許多必要的忙。因為他的手常恰好知道一種慢客的呵欠，因而忙於來掩住他的眼，使之不見訪客的激怒之狀。像我們早已聽到過的，列寧並不忠告韋爾士，以及我們許多完全了解的理由。因此，韋爾士較有力地忠告列寧了。他把很新的思想帶給列寧，即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之故，「不僅需要改善生活的物質方面，而且要革新全人民的心理。」他對列寧指稱，「俄羅斯人都是天生就的個人主義及貿易者。」他對他明說，共產主義行得「太急了，」在它還未穩立以前，就在消滅下去了等等。老是那一套意見。

「那便把我們引到了主要的論點，」韋爾士說，「引到了進化的集產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異點。我們的觀點之不同，就在這裏。」在進化的集產主義下，我們有費邊派的自由主義的計劃，慈善事業，社會法制，以及關於一個較佳的將來的禮拜日演講。韋爾士本人把他的進化的集產主義的本質，簡潔地陳述如下：「我相信，用一種確定的，爲全社會的教育制度。那末，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就能文明化了，而且能改成一種集體制度。」然而韋爾士沒有說明，誰實際地來施行「這種確定的教育制度。」對誰實施這種教育制度？是前額高聳的貴族對英國的無產階級呢？或是反過來說，英國的無產階級把這種教育灌注在貴族的頭腦中呢？呀，不，除了那點以外，一切都應如是。這些費邊主義者，有知識的無自私的思想的人，紳士們和太太們，韋爾士先生和絲諾黛夫人，在那裏是爲了什麼目的呢？如果他們不是把藏在他們自己腦袋裏

的東西，確定地、緩慢地利用着，來教化資本主義的社會，並依着很合理的、快樂的連大不列顛王朝也一點不注意的次第，把這種社會改爲一個集體社會的話。

這一切都是韋爾士所論斷的，同時這一切都是列寧所傾聽的。「對於我，」韋爾士親切地說，「得與這個不尋常的小人兒談話，真是一件散心樂事（！）」

對於列寧呢？——呵，伊里基受罪頗久呢！他大概讓幾個很表意的、有力的俄國字眼，從他的心裏擠了出來。他不會用英語把它們大聲地譯出來，顯然地，不僅是因為他的英文字彙還未曾達到這樣的程度，而且更是因為客氣的原故。伊里基是很客氣的，可是最後他不復能長此客氣地默然了。「他不得不，」韋爾士報告着，「答復我，並且聲稱，今日的資本主義是不可救治地貪婪與破壞的。而這點又是不能教的。」列寧引證了許多在麥南斯（Morais）這書中的事實：資本主義曾破壞了英國的國有船塢，曾阻擾了煤礦的相當的利益等等。列寧懂得事實和計算的專門語。

「我承認，」韋爾士突然地作結論說，「和他辯論，我覺得是很困難的。」那是什麼意義呢？難道是進化的集產主義開始向馬克斯主義的邏輯的一種投降麼？不，「一切絕望了。」初看這句話，似乎是意外的，實則，決不是偶然的，只是屬於那種制度，因而含有費邊派的、進化的教育的性質罷了。那是專爲英國的資本家、銀行家、貴族以及他們的大臣而發的。韋爾士對他們說：注意，你們的行爲很壞、很腐敗、很自私，因而

和克倫林的幻想者討論的時候，使我很難於證明我的進化的集產主義的原理之正確。把這點再想一遍，每天完成費邊派的洗滌事務，成爲文明的人，走入進步之路。如此，韋爾士的爲難的承認，並不是自我批評的開始，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那種教育工作之持續。至於那種由帝國主義戰爭及凡爾賽和約所產生的社會，卻是很完全的、很道德化的以及很費邊主義化的。

韋爾士帶着謙遜的同情說：『列寧對於他的理由之信仰是無限的。』對於這句話，實無可以批評之處。對他的理由沒有信仰這種情形不是在列寧身上所能找到的。凡是對的，必定永遠是對的。這種信仰，在那封鎖的致命的時日中，給予他以耐心，來和每一個甚至間接地能把俄國與西方聯絡起來的外國人談話。那便是列寧和韋爾士的談話。在另一方面，他和來看他的英國工人們談話，則十二分地不同。和他們，他有着生動的談話，這裏他訓教他學得；反之，他和韋爾士的晤談，則含有半拘束的外交的性質。『我們的談話無決定地結束了，』這個作者說。換句話說：這次進化的集產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比賽，不分勝負地結束了。韋爾士回到大不列顛去，而列寧則仍留在克倫林；韋爾士給資產階級大衆寫了許多令人輕視的文章，而列寧則搖着頭說：『那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呀！唉，唉，一個多麼庸俗之人呀！』

你也許要問：爲什麼如今，幾乎已隔了四年，我細論這篇毫無意義的韋爾士的文章。實因我發見在一

本獻給列寧之死的書中的好評，覺得不夠。正在我病體復元的時候，在蘇喀姆寫了這幾句話，也不足以證明其是。不，我還有許多重要的理由在。最近韋爾士的黨握着英國的政權，有進化的集產主義的開明的代表爲之領導。我覺得——我相信不是全無理由的——韋爾士獻給列寧的文章，將顯示給我們以英國工黨的領袖分子的精神，或許比其他許多東西來得好些；究竟韋爾士不是他們中間最壞的。這些人已多麼可怕地越過了他們的資產階級成見下的重負呀！他的專橫，英國資產階級偉大的歷史的重任之最近的反映，不容他們置身於他人的生活之中。——新思想中，他們頭腦中的歷史的過程中，以偏狹的慣例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立場，帶着資產階級的輿論。這些紳士們把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成見擴展於全世界。結果所察覺到的不過他們自己罷了。

列寧在歐洲各國都住過，他精通各國語言。他讀、學習，並深刻地研究它們。他把它比較，並使之普通化。就是他站在一個大革命的國家的領袖的地位的時候，他也不放過機會勤慎地留神地去徵求意見，搜羅知識和經驗，他永不厭倦於沿行全世界的生活。他自在的講，讀德文、法文和英文，以及讀意大利文。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間，工作不勝煩忙，然在政治部會議時，他還是靜心研究捷克文法，以期直接知道捷克·斯拉伐克工人運動的情形；我們時常「眼見」他從事於此。遇到困難時，他時常笑出來，接着就道歉。和他比較起來，韋爾士含有那種表面上受過教育的偏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性。只看見什麼，而沒有領會其意。並

且相信他們更沒有什麼要學了，因為他們以為他們所有的遺傳的成見已足夠了。麥唐納先生，一個較深沉陰鬱的，同典型的異種的清教徒，這樣鎮靜資產階級的輿論說：我們曾與莫斯科作過戰，而且已征服了莫斯科。

征服了莫斯科麼？是的，實際上，他們是可憐的『小人兒』，雖然他們已長大了。今日，在一切都已過去以後，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關於他們自己的明日。自由黨和保守黨的領袖立刻解決了握着政權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腐儒們；他們和他們妥協，而且聰明地準備他們的沒落。不僅是他們的行政長官的沒落，而且是他們政治的沒落。同時他們準備——雖然這不完全是一個常識的問題——英國的馬克斯主義奪取政權。是的，實在的，馬克斯主義者，『這些階級鬭爭的無聊的盲信者』關於英國的社會革命，也是依循着馬克斯所訂定的法則的。

因其特有的機智——像一條香腸那樣粗大——韋爾士曾威嚇着要用一把剪刀來修剪馬克斯的『學識』的髮鬚，使他英國化、尊貴化、和費邊主義化。可是這個計劃，一些沒有實現，而且將來也不會實現的。馬克斯將仍是馬克斯，正像列寧仍是列寧一樣；雖經韋爾士用一把鈍刀辛勞地給他修剃了整整一個鐘點。我們敢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在倫敦，例如在契拉法格爾街，將有兩個銅像並排地矗立着：卡爾·馬克斯和維拉特米爾·伊里基·列寧。英國的無產階級將對他們的孩子們說：『勞工黨的小人兒沒有把這

兩個巨人的髮鬚修剃，那是多麼好的一回事呀！

希望在這個我所努力活着要親見的日子，我閉上我的眼睛一會兒，清清楚楚地看見列寧的姿態，在韋爾士曾經見他的那把椅子上。而且在這次會晤後一天——或許正就是那天——聽到他從心中發出的帶着嘆息的話：『他是個小資產階級呀！他是個庸俗之人呀！』

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

列寧的民族主義 (註)

列寧的國際主義是毋須再介紹的。其顯著點便是在世界大戰初期間和第二國際盛行着的冒牌國際主義的不能和解的破裂。「社會主義」的在公職的領袖們，以老世界主義者的精神，從議會的講臺，發揮出抽象的理論，使祖國的利益與人類的利益相調和。實際上，就我們所知道的，結果藉無產階級維護了貪得強奪的祖國。

(註)本章曾載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八十六期真理報。

列寧的國際主義決不是一種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調和的空談，而是一種國際的革命行動。居有所謂文明人的地球的領土，被視爲一個合理的戰鬪之場。各個民族與階級就在這個戰場上，彼此作着巨大的抗戰。簡直沒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能被力促成爲一種民族的體制。顯明的與不顯明的線索，將這個問題和地球各處種種現象相聯結。因列寧洞察國際的成因與動力，故其思想較大多數人更不受民族的成見的拘束。

馬克斯的意見即是哲學家會聲稱世界是圓滿的，並相信他的工事便是改造世界，可是他——天才的預言家——沒有在活着時視見這個改造的世界。舊世界之改革，現在正是極盛的時候，而列寧便是它

的第一個工人，他的國際主義就是對於歷史的大事件之一種實際的體會，並且是對於它們以國際的標準，爲國際的目的的進程之一種實際的適應。俄羅斯及其命運僅是這種偉大的歷史的終於決定人類命運的鬪爭中之一分子而已。

列寧的國際主義是毋須介紹的。同時，列寧本人是極端的民族的。他是深植於新俄的歷史之中，使歷史成爲他自己的；給歷史以它的最豐滿的表現，因而達於國際行動與國際勢力的最高點。

起初列寧是『民族的』特徵，似乎會令人驚奇的。然而根本地思索一下，這卻是自然之事。要能指導一種在歷史上無先例的，像如今在俄國所發生的革命，極明顯地需要一種與民衆生活的主要力量的不可分解的、有機的聯繫，一種從最深的基礎上所發生的聯繫。

列寧使他自己與俄國無產階級，一個年青的階級，成爲一體。在政治上，這個階級比列寧本人幾乎不怎樣年老些，同時又是深深地民族的階級。因爲俄國的整個過去的發展，均與這個階級有密切的關係。俄國的完全的將來，操諸於這個階級。俄羅斯民族，將與這個階級同存亡。沒有常規和慣例，沒有虛僞和因襲，且思想之堅決，行動之勇敢，一種決不致頹廢到需要理解的勇氣，表現了俄國無產階級的特性，同時也表現了列寧的特性。

實際上已使俄國在國際的革命中成爲最重要的強國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本質，預先已由俄國民族

史的歷程，由最專制的國家的野蠻殘忍，特權階級的卑鄙，資本主義在瑣碎交易中之狂熱的發展，俄國資產階級及其思想之墮落，他們的政治之腐敗所調製成了；我們的『平民』既不知道一種改革，也不知道一種大革命，而且也不會知道的。所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問題，就含有一種較廣博的性質。我們的過去的歷史，既不知道有一個路德，也不知道有一個湯姆士·孟什爾；既不知道有一個密拉波，也不知道有一個但頓，也不知道有一個羅伯斯比爾。就爲了這個理由，俄國無產階級有了它的列寧。凡慣例上所沒有的，在革命的能力中卻得着了。

列寧使自己反映着俄國工人階級，不僅在工人階級的政治的現在，而且也在其最近的粗野的過去。這個人物，不消說得他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不僅外表上像一個農民，而且他也有強烈地暗示出一個農民的人物。朝着斯麥理內，矗立着其他一個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的石像：馬克斯穿着一襲黑色大禮服站在臺座上。當然，這是一件小事，可是要想像列寧穿着一襲黑色大禮服，那是十分不可能的。在幾張畫像裏，馬克斯則寬露出穿着一件襯衫的胸部，上面懸着一片單眼鏡。

那個馬克斯是不傾向於賣弄風情的，凡一切有着一種馬克斯精神的觀念的人，都明白的。可是馬克斯生長於一個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生活在一種不同的環境中，正像德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人物一樣，他們的根不向後生植於農村中，而是生植於中世紀的同業公會和複雜的城市文化裏。

馬克斯的豐美的風姿，混合着力量與溫柔，憤怒與諷刺，粗俗與文雅，也迷惑了自改革時起或竟早些時一切過去德國社會主義的文學之文學層及倫理層。列寧的文學的和演講的體裁，正像他整個的天性一樣，是非常簡單的，苦修的。可是這種堅強的苦修，並沒有一點關於它的道德訓誨的黑影。這可是一種主義，不是想出的方式，而且確實不是矯飾，卻祇是爲行動的內在力量集中之外形上的表現。就大體而論，這是一種節儉的農民似的真。

整個的馬克斯是包含在『共產黨宣言』中，在他的『批評』的序文中，在『資本論』中。即使他不是第一國際的創立者，他始終仍然是他之爲他。在他方面，列寧則立刻擴大到革命行動。以一個學者而論，他的著作祇是指一種爲行動之準備。如果在過去，他從未出版過一本書的話，他在歷史上仍然會現出現在的他：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第三國際的創立者。

要能放棄列寧所應作之事業，一種明晰的學者風的法式——唯物的辯證法——是必要的；雖屬必要，但還不足夠。這裏需要那種我們稱爲直覺的、神祕的創造力：立即正確地把握着假像，從非根本中，不要中區辨出根本的重要的想像。一幅畫圖中的不足部分，適當地衡量他人的，尤其是敵人的思想，把這一切成爲一個聯合的整體，（那時其『公式』即出現於心中）及給予打擊等之能力，這便是及於行動的直覺。在另一方面，這種直覺與我們所謂『洞察』符合一致。

當列寧閉着他的左眼，藉無線電收音機聽着一個帝國主義史的領袖的國會演講，或期望中的外交報告，隱諱殘忍性的謊談，和政治的口號的時候，他酷似一個不能強使贊成的極傲慢的俄國農夫（Moujik）。這是高力量的農民的機敏，幾乎上昇及於天才，飾以一個學者風的頭腦的最近所獲得之物。

這個年青的俄國無產階級能完成僅是他所完成的。他把農民的廣大的荒地開墾到深處，我們整個的民族的過去，已準備了這個事實。可是正因為無產階級在大事件的進程中掌握了政權，我們的革命才突然地、激烈地克服了民族的偏狹與地方的落後；蘇俄不僅成爲共產主義國際的逃亡藪，而且也是共產主義國際的計劃與策略的活的化身。

藉尙未經科學發現的所謂未知的途徑，即人格須要由其表現出來的途徑，列寧已從民族主義中取得了在人類歷史上爲最大的革命行動的，他所需要的一切。正因為這種久已有着國際理論的社會主義初次發覺列寧爲其民族的化身，按字的真義說，他就成爲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

列寧遇刺（註）

同志們我所聽到的，我所解釋的，兄弟般的致意是這樣：在這些艱苦困難的時日中，我們都覺得彼此需要像兄弟一樣的更密切的團結，對於蘇維埃組織也須如此，並且需要在共產主義旗幟之下，永久團結一致。在這些不安的時日中，當我們的旗手，而且我們也有完全的權利可以說，無產階級的國際的旗手，躺在他的病床上，和可怖的死之惡魔交戰着的時候，我們彼此之間比勝利的時候更爲密切……

（註）本章原爲托羅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中的演講詞。

列寧遇刺的消息傳到我這裏和其他許多同志的時候，是在斯維耶史克的卡桑前線。在那裏槍彈突如其來，右邊幾槍，左邊幾槍，頭上幾槍。但是這種新的打擊，乃是埋伏在後面的打擊。它反革命地展開了新的前線。在此刻對於我們這是最不幸的、最可怕的：列寧的生命與死神掙扎着的前線。我們意料中的無論這前線或那前線的失敗——我願你們堅決地相信我們急迫的勝利——這種失敗，爲着俄國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沒有一單個部分會是很困難、很悲慘，以致成爲一種經過我們領袖的心胸的前線的戰爭之致命的表示。

吾人只要想一想，就能了解這個人物從工人階級的一切敵人中所已喚起的，和將要喚起的集中的

仇恨，因為當大自然創造了這唯一的人物爲一個革命思想的及工人階級的、不屈的力量的化身的時候，已產生了一部傑作。這個人物便是維拉特米爾·伊里基·列寧。在工人的領袖們的紀念館——革命戰士的紀念館——裏陳列着許多不同的人像和物件。像其他許多爲革命工作已在那裏有三十年之久的同志一樣，我曾在各國遇到過許多種工人的領袖，工人階級的革命的代表，可是對於列寧同志其人呢，我們已爲我們的時代，創作了一個血和鐵的像。

在我們後面便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所謂和平發展的時代。在那個時代，矛盾逐漸地增積；在那個時代，歐洲渡過了所謂武裝和平時期，而流血慘案幾乎僅發生於各殖民地。在那個時代，貪婪的首都把較落後的民衆撕成碎片。歐洲享受到所謂社會主義的軍國主義的和平。在這個時代，形成了歐洲工人運動的最著名的領袖。在他們中間，我們見到奧古斯特·巴白爾這位顯赫的人物，這位偉大的去世者。他反映着工人階級的緩慢發展的時代，帶着勇敢的精神與鐵一般的力量，對於各種運動的極端的審慎，一種基礎的實際的試驗，等待與準備的策略，都是他所特有的。他反映着工人階級的權力之逐漸增積的過程——他的思想一步前進一步，正像在國際反動時期德國工人階級漸漸地從下升起而得脫離黑暗與成見。他那精神上的像逐漸生長，發展成爲更堅強更偉大，但這一切都是以等待與準備爲基礎的。因此，奧古斯特·巴白爾在他的思想上、方法上乃是一個較早的已成過去的時代的最優秀的人物。

我們的時代是另一種物質所織成的。在這個時代，舊日增積的矛盾可怕地爆發了出來。在這個時代，他們揭開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面幕。在這個時代，一切國際資本主義的基礎，被民衆的可怖的暗殺擊成粉碎。這個時代顯示了各階級的對抗，而且把純利和利潤名義下的幾百萬破產的實情，擺在民衆的面前。更爲了這個時代，歐西的歷史會遺忘了、忽略了，或者說沒有產生其領袖——那不是徒然的：因爲在大戰前夕，一切領袖都感快樂於歐洲工人在昨日而不是今日所反映出來的最大的信任……

因爲這個可怖的動亂與血戰的新時代的開始，就超過了早期領袖們的力量；這使歷史樂於——那不是機遇——產生一個俄國絕無僅有的人物，一個反映我們整個恐怖而偉大的時代的人物。我再說一次，這並不是機遇。一八四七年在落後的德國產生了馬克斯這樣的人物，思想之國所有戰士中之最偉大者。他指出了到新歷史之途徑。那時德國是個落後的國家，可是歷史決定：德國的知識階級，會經過革命的發展，他們的最重要的控制他們整個思想的代表，會與資產階級社會破裂。自己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方面，而且擬訂工人運動的計劃，以作工人階級的發展之理論。

凡馬克斯在那時代所預言的，我們的時代就須實現出來。可是她需要新的領袖；這種新的領袖必須是我們的時代的偉大精神之使者；因爲在我們的時代，工人階級已自己提高到歷史事業之頂點，並且看清那時代必須經過的邊界，如果人類要生存而不像腐屍那樣地倒落在歷史的寬廣的大道上的話。爲着

這個時代，俄國歷史產生了一位新領袖。舊革命的知識分子所有的優點，如克己的精神，勇敢與憎恨壓迫的精神，一切都集中在這個人物身上。雖然當他年青的時候，因為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勾結的緣故，已與知識界難於調和地破裂了，而與工人階級的發展的思想和實際化爲一體。藉着俄國青年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人物利用着國際工人運動的富豐的經驗，使其意識形態變爲實際的行動，於是非常偉大地上昇到政治的水平線。那便是列寧這個人物，我們的革命時代的最偉大的人物。

同志們，我知道，你們也知道，工人的命運並不靠單獨的人物的；那不是指我們的運動史上和工人階級的發展史上的人物是無足輕重的意思。一個人不能照着模型和形像，使工人階級成爲新型，也不能意識地向無產階級指出這條或那條發展的途徑，可是他能扶助工人完成他們的工事，領導他們更快地達到他們的目標。批評家曾指出卡爾·馬克斯所預言的革命，將較實際的情形更爲迫近。他們以全權答覆批評家說，因爲馬克斯站在一座高山上，距離彷彿短些。

有許多人也會不止一次地批評過列寧——我是其中的一個——因爲他不注意到許多不很顯著的事件，及意外的瑣事。我必須說，在『尋常的』緩慢的發展時的一個政治領袖，這也許是個缺點，可是這是新時代的領袖列寧同志最大的長處。一切偶然的外表的、次要的都略去了。祇有各階級的基本的不能相容的衝突，則仍留存於可怕的資產階級戰爭中。以他的革命的眼光來看將來，抓住主要的根本的重要

的。——那是列寧特有的最高度的天賦之才能。任何人有幸，像我在那個時期一樣很近地觀察列寧的工
作，決不會以熱情來注意——我再重述『熱情』兩字——這種銳敏的洞察的頭腦的天賦，一切外表的
偶然的膚淺的都已拋棄，藉以觀察行動的主要途徑與方法。工人們知道重視那些指出前進的路線的領
袖們，並且毫無猶豫地遵循着；即使在無產階級的成見暫時阻撓他們的時候。在這種有力的思想的天賦
外，列寧又天稟一種堅決的意志。這兩種特徵之結合，便產生了這個真實的革命領袖。他是由勇敢的、冷酷
的頭腦及堅強不屈的意志所形成的。

我們一切所說到、所聽到、所看到的關於列寧的決議，都不取計聞的形式，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呀。然而
我們幾乎要那樣了。——我們深信，在這接近的前線，就在克倫林，生命將要戰勝，列寧即將回到我們的隊
伍。

同志們，當我說到在他那勇敢的思想 and 革命的意志裏，他將與工人階級成爲一體的時候，或者有人
要說，在這些艱難的時日中，就是在俄國工人階級在最前線盡力與捷克·斯拉伐克軍、白軍、英法的傭兵，
交戰的時候，我們的領袖——我們的領袖帶着正是這些白軍、捷克·斯拉伐克軍、英法的傭兵的代辦者
所加給的創傷在作戰，那是一種內心的象徵，幾乎是一種意識的歷史的目的。這裏存着一種內部的結合
和一種深刻的歷史的象徵。而當我們都深信在我們與捷克·斯拉伐克軍、英法軍、白軍的戰線上，我們每

日每時堅強起來的時候，就特別是如此。——我能以一個剛從戰場上歸來的目擊者的資格，說這樣的話。——是的，我們每天堅強起來，明日我們將比今日還要強些，而後日我們更要比明日強些；在我看來，我能對你們說卡桑、辛比爾斯克、沙麥拉、烏法及其他暫被佔據的城市，就要還給我們的蘇維埃了。這個日子是不遠了，那是毫無疑義的。——同樣地，我們希望列寧同志，會很快地恢復他的健康。

可是，就在現在，他的影像，這個受傷的、暫離前線的領袖的鼓舞的影像，清楚地站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知道，他從來沒有一刻時光離開我們的隊伍，因為，就在他被反革命的槍彈擊倒的時候，他促醒我們全體，召喚我們，而且鞭策我們前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單個同志，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單個誠實的工人，會在叛逆的打擊列寧的消息之影響下，讓他的手下垂着的。我卻看見過許多緊握着拳頭，正在找開槍的人，我也看見過成千成萬的嘴唇，無情地在默誓對無產階級的敵人之仇恨。我不必說明，在前線的有階級意識的戰士怎樣反應，當他們得知列寧身中兩彈倒在那裏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說，列寧的性格缺少金屬；可是現在，金屬不復如前地祇在他的精神裏，而且也在他的身體裏；因此，他對於俄國工人階級更是親熱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說話和心跳，是否會傳到列寧的病牀，可是，我無疑地相信，他全都覺得的。我無疑地相信，甚至在熱度最高的時候，他也知道我們的心怎樣雙重地、三重地跳躍着。現在我們比往常更清楚地

認識：我們都是同一的共產主義蘇維埃的分子。當我們的時代中最偉大的人物生命在死的危險關頭時，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從不會站在第二條或第三條戰線上。任何一個笨人，能把列寧的頭擊成粉碎，可是要重新創造這個頭，那在大自然方面，也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可是不，他將立刻再起來，和我們共同思考，共同工作，共同作戰。我們對於我們所愛戴的領袖這樣許願作爲報答：凡有一點智力存留在我們中間，而我們的心熱烈地在跳動的時候，我們必仍矢忠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我們將與工人階級的敵人作戰，直到流最後一滴血，直到我們的最後一息。

列寧病中（註）

同志們，本年已把我們的黨關於思想之澄清與意志的堅決作了某一種試驗。這個試驗是困難的，因為它的決定，是在於重壓在全體黨員及最廣大的工人社會的意識裏的一種事實。——說得更正確些，壓在我國的工人及全世界大部分工人的意識裏的一種事實。我且談一談列寧的病狀，當三月初，他的病勢愈趨惡劣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部開會討論，關於列寧同志健康狀態之變化，我們該對黨國說什麼話。同志們，我相信，你們都能想像得到，當我們須對黨國作這第一次的嚴重的驚人的報告的時候，在這次政治部會議中，我們的心境是怎樣。自然，那時我們仍然是政治家，沒有一人會因這事而指斥我們。我們不僅顧慮到列寧同志的健康——自然，我們關心於他的脈搏、他的心跳、和他的體溫。——而且也想到他的心跳的次數，對於工人和黨的脈搏將有怎樣的影響。帶着焦慮，可是也帶着對於黨的力量深信，我們說，一到危險顯著的時候，我們須即報告黨國。沒有一個人疑懼我們的敵人會自己鼓動起來，利用這個消息以煽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發散可怕的謠言，等等。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有一刻的疑懼，我們必須把一切進行的情形立即報告黨，因為我們增加每個黨員的責任。我們偉大的擁有五十萬黨員的黨，是一個具有豐富經驗的大團體，可是在這五十萬人中，列寧佔着一個無匹的地位。過去的歷史知道，沒有一個人會發生

這樣的影響，不僅對於他自己的國家命運，而且也對於人類的命運；她（歷史——譯者）沒有用以衡量列寧的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標準。因此，他已長久離開工作，他的病勢不佳這種事實，將引起深深的政治的恐慌。

（註）本章原爲托羅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第七次全俄黨員大會中的報告。

自然，自然，我們絕對知道工人階級將要戰勝。我們唱着：『沒有較高的人救助我們。』——也『沒有一個官救助我們。』那是不錯的，可是僅在最後的歷史的意義上說，就是說，就最後工人必會勝利而論，如果沒有馬克斯，沒有列寧的話。工界在馬克斯和列寧兩大人物的思想之泉湧所造成的環境，實爲革命大利。馬克斯是法律綱要的預言家，列寧則是最偉大的試驗的實行家。他不僅像馬克斯那樣地訓練無產階級的理想政治，而且也在最困難的形勢中訓練各界及人民執行法律，並且他實行調遣和戰勝一切。這一年中有一個時期，我們沒有列寧，不得不作實際的工作在理想的基礎上。我們最近已從他那裏得到了暗示和指導。——關於農民問題，政治機關，以及國籍問題，都將多年繼續下去的。

現在我們不得不報告他的健康愈趨惡劣的情形。我們以合理的焦急的態度，問我們自己，那些中立的民衆、農民和紅軍，將作怎樣的結論；因爲農民相信列寧是我們的政府機關中的第一流人物。除其他一切外，列寧是一個工人，與農民相互關係間的政治機關中偉大的道德的支柱。難道農民不會想到——我

們中間有許多人間過這個問題——在列寧長期間的離開工作中，他的政策將經過一種改變嗎？黨、工人、大衆及全國，將怎樣反應呢？……當第一次驚人的報告出現的時候，黨團結一體，生長並且達到一個較高的道德的平面。同志們，自然，黨包含着活潑的人。人都有過失和缺點的，就是在共產黨員中，有着許多『有人性的，全都過有人性的。』像德國人所說的，有着團體的及個人的衝突，嚴重的及偶然的，而且將常是那樣的，因為沒有一個偉大的黨沒有這種現象的。可是道德的力量，即一個黨的政治的比重，是以在這種悲慘的經驗中達於頂點的東西來定其意義的：統一的意志、紀律或偶然的與個人的、有人性的，全都過有人性的。而且這裏，同志們，我相信，我們能絕對可靠地推斷我們的結論：當黨見到我們將長時期地失去列寧的指導的時候，它團結一致，並將那危害其思想之澄清，其意志之統一，及其作戰之能力的一切拋卻了。

在我乘車越卡爾可夫之前，我和我們的莫斯科衛戍司令，尼古拉·伊伐諾維諾·茂拉羅夫談話。你們都知道，他是個年老的黨同志。我問他紅軍對於列寧害病的情形，取怎樣的態度。茂拉羅夫說：『起初這個消息將如一個霹靂；他們將向後倒下，然後他們將更深切地想念列寧。』是的，同志們，中立的紅軍今就其自己的地位已深深地想到人格在歷史上的任務。想到我們，舊時代的人，像小學生、大學生，或年青工人在書本中，在牢獄裏，在流放時所學得的東西評量而且討論，就是『英雄』對『大衆』的關係，主觀的因子與客觀的情形等等。如今，在一九二三年，我們的青年紅軍有十萬頭腦已具體地想到這個問題，並且和

他們相似地，全俄羅斯的，全烏克蘭的，及其他各種農民，有一千萬頭腦已想到列寧的人格在歷史上的任務了。

我們的政治機關報，我們的人民委員，我們的團體書記，怎樣答覆呢？他們的答覆是：列寧是個天才，會產生於一個世紀裏的天才，而世界史只知道兩個作工界領袖的天才：馬克斯與列寧。即使是最強的，最有紀律的黨的命令，不能產一個天才，可是黨能儘可能地以加倍其集體的努力，來補充天才，當他不在的時候。那便是人格和階級的理論。我們的政治機關報，以通俗的文體，把這種理論獻給中立的紅軍。這種理論是對的：列寧目下不在工作，所以我們必須像兄弟一樣加倍工作，加倍謹慎地注意着危險，加倍努力地護衛着革命，加倍堅執地利用進一步的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從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到中立的紅軍，都要這樣做。

同志們，我們的工作是很煩累的、瑣碎的，即使是按大計劃的綱領進行的；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平凡的」簿記哩、統計哩、生產稅哩、五穀出口稅哩，我們按部就班地做着這一切事工。可是沒有使黨退化到瑣事的危險麼？而我們不能再容許這種甚於我們所能容許的退化，即使是他們的統一行動之無足輕重的侵害；因為即使現今的時候延長到很久，可是總不能延長到永遠，或許不相當的久長。大規模地一次革命的爆發，就像一次歐洲革命的開始，也許發生得較我們大都所猜測的來得快些。如果從列寧的無數的策

略的教訓中，我們願意特別清晰地記得一些東西的話，姑以爲他所稱作『大變革中之政策』吧！今日在防寨中，而明日則在第三國會的座位上，今日召喚世界革命，召喚國際十月革命，而明日則和庫爾孟及查爾寧議和，簽訂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辱國的和約。形勢是變了，或者說，我們相信形勢是變了；進兵到西方後，便是『到華爾沙』！情勢強迫我們改變我們的方法；我們必得簽訂里加和約，你們都知道的，正是同樣恥辱的一種和約。……於是再持久地工作着，依次地經濟哩、限制幹部人員哩、統制哩，必須要用五個或三個電話接線生麼？如果三個已夠了的話，就不要用五個，因爲那樣，農民就須多交付幾斗米，每天幹着瑣事，可是請注意，在羅爾，革命的火焰閃發了；現在會覺得我們是頹廢的麼？

不，同志們，我們不是頹廢的。我們改變我們的方法，工作的方法。——可是黨的革命的自衛本能，乃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學習簿記，同時，我們銳利地注意東西各方，以及不使我們吃驚的事件。藉着無產階級基礎之健全與擴大，我們的力量增加了……我們要與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我們要對新經濟政策派讓步，可是我們不容新經濟政策派及小資產階級入黨。不，我們要用硫酸和熾熱的鐵把他們燒滅在黨裏。在第十二次大會中，就是在十月革命後沒有列寧參加的第一次大會中，並在我們黨史上一次沒有他參加的大會中，我們將彼此談到，我們必須用削尖的鉛筆，把主要的命令寫在或刻在我們的意識裏：不可使之生硬。——熟思突變之手腕，運用部隊而不使其分裂，與暫時的及永久的戰友妥協，可是不要讓

他們入黨。你們要永遠是你們，世界革命的前衛！當動亂的聲音從西方傳到這裏，而且將有反響的時候，任
何一切都使我們煩累，如簿記哩、統計哩、新經濟政策哩，我們要毅然決然地答覆：我們全身是革命者。我們
過去是如此，我們現在仍然如此，我們將永遠如此。

列寧逝世

列寧逝世了，我們已失去了列寧。支配動脈工作的黑暗的定律已把他的生命毀壞了。藥劑已表示無能來完成熱情地希望着的東西，幾百萬顆人心所要求的東西。

有多少人，不躊躇地，願意犧牲他們自己的血，直到最後的一滴，來恢復這偉大的領袖，列寧——獨一無比的不能代替的伊里基——的動脈工作，可是科學表示無能時，神蹟也不顯現。如今列寧是不在了。這句話，像巨石落入海中似的，打擊着我們的意識。這是可信的麼？這是想得到的麼？

全世界工人的意識不能抓住這個事實；因為敵人依然很強，前途遠長，而歷史上最偉大的工作尚未完成；因為世界工人階級極需要列寧，在世界歷史上，怕沒有一個人會像他那樣地被人需要的。

第二次病魔之侵襲，較第一次尤為厲害，延長到十多個月。按照醫生傷心的說法，動脈仍不斷地「輕跳着」。這是一種有關列寧的生命的可怕的輕跳。病勢轉好，尚有希望，幾乎能完全復元。可是也會發生不幸的結果的。我們全都希望他康復，可是不意發生了悲慘的終局。腦部的呼吸中心不起作用了，這個偉大的天才的心也窒息了。

列寧是不在了，黨成爲孤兒了，工人階級成爲孤兒了。這正是我們的領導師和領袖逝世的消息所引

起的感覺。

我們將怎樣前進呢？我們將怎樣找途徑呢？我們不致於走入歧途麼？因為，同志們，列寧不再和我們同在。

列寧不在了，可是列寧主義永在。列寧不朽的精神，他的學說，他的工作，他的方法，他的模範，存在我們中間，存在他所創立的黨中，存在他曾為首領，曾作指揮的第一工人政府中。

我們的心中，現在充滿了悲哀的情緒。謝謝歷史偉大的賜予，因為我們全體，都是生來與列寧同時代的人；與他一同工作，從他那裏，受過教益。我們的黨，實際上，便是列寧主義，我們的黨，便是工人的集體的領袖。在我們每一個人中間，存在着小部分列寧，那是我們每一個人中的最好的部分。

我們將怎樣繼續進行呢？手中提着列寧主義的明燈。我們將找到途徑麼？——用集體的心力，用黨的集體的意志，我們就能找到！

而明日、後日、一星期後、一月以後，我們要問，列寧真死了麼？因為他之死，將長使我們覺得是一種難信的、一種不可能的、一種可怕的大自然之專斷。

但願我們所感到的，每當我們想到列寧不在時，刺傷我們的心的苦痛，是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種訓戒，一種警告，一種哀訴：你們的責任是增加了。尊重曾經訓練你們的領袖！

在傷心、悲哀和痛苦中，我們把我們的隊伍，和我們的心，團結一致；我們更緊密地團結一致，作新的
爭之準備。同志們，兄弟們，列寧不再和我們同在了。再會吧，伊里基！再會吧，領袖！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於鐵夫里斯站。